

目录

[理想國譯叢序 7](#_Toc55384687)

[導讀 異端之必要 8](#_Toc55384688)

[一 向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趨近 12](#_Toc55384689)

[二 關于轉向 15](#_Toc55384690)

[三 鎖國 21](#_Toc55384691)

[四 關于國體 26](#_Toc55384692)

[五 大亞細亞 31](#_Toc55384693)

[六 非轉向的形式 36](#_Toc55384694)

[七 日本之中的朝鮮 42](#_Toc55384695)

[八 以“非斯大林化”為目標 47](#_Toc55384696)

[九 玉碎的思想 54](#_Toc55384697)

[十 戰爭時期的日常生活 60](#_Toc553846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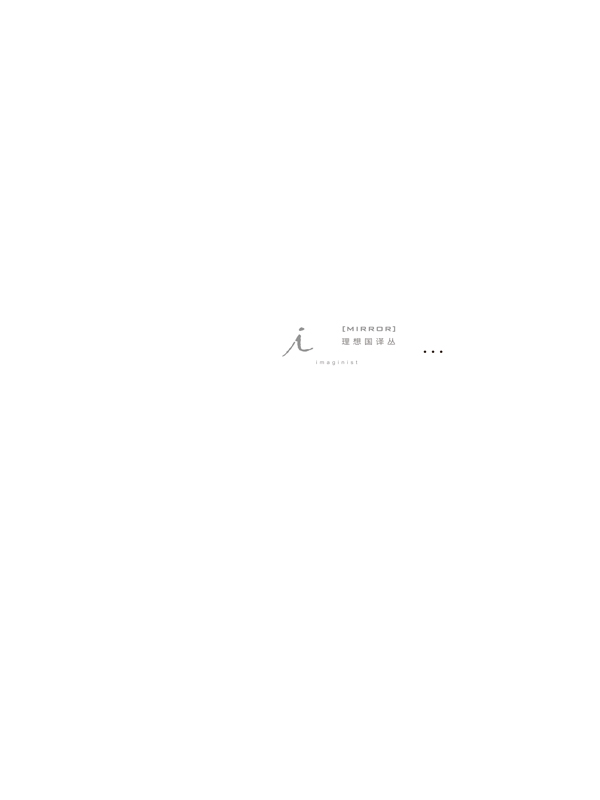
[十一 原子彈的犧牲者 66](#_Toc553846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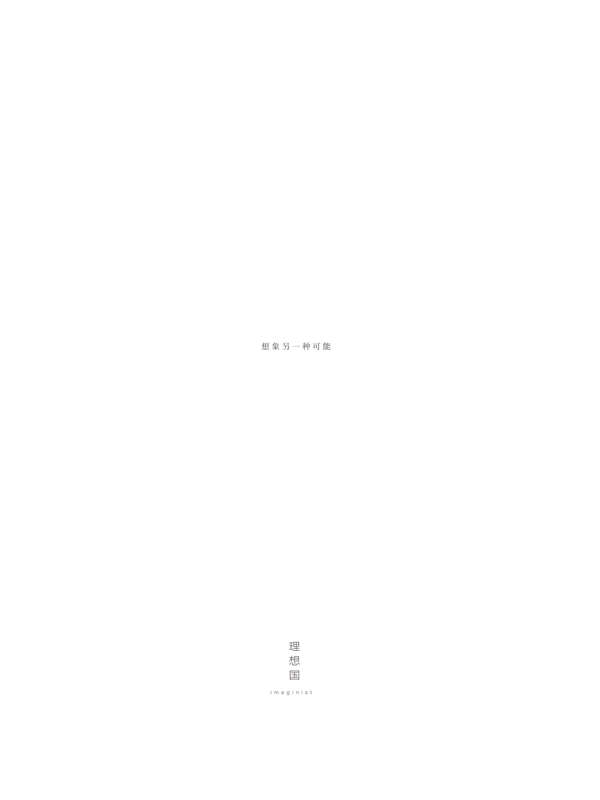
[十二 戰爭的終結 72](#_Toc55384700)

[十三 回顧 78](#_Toc55384701)

[后記 84](#_Toc55384702)

[參考書目 85](#_Toc55384703)





【日】鶴見俊輔　著

邱振瑞 譯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

北京日報出版社

•北京市東城區東單三條8-16號東方廣場東配樓四層•

SENJIKI NIHON NO SEISHINSHI, 1931—1945  
 By Shunsuke Tsurumi  
 © 1982, 2001, 2015 by Taro Tsurum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82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9  
 by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Bei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出版外國圖書合同登記號：01-2019-5046  
 本書中文簡體字譯稿版權由臺灣行人出版社授權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邱振瑞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 / （日）鶴見俊輔著；邱振瑞譯. ——北京：北京日報出版社，2019.9

（理想國譯叢）

ISBN 978-7-5477-3456-8

Ⅰ. ①戰… Ⅱ. ①鶴… ②邱… Ⅲ. ①思想史－研究-日本-1931-1945 Ⅳ. ①B313.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9）第177162號

責任編輯：許慶元

特邀編輯：梅心怡

裝幀設計：陸智昌

內文制作：李丹華

出版發行：北京日報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東城區東單三條8-16號東方廣場東配樓四層

網址：http://www.scpph.com

郵編：100005

電話：發行部：（010）65255876 總編室：（010）65252135

印刷：山東臨沂新華印刷物流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經銷：各地新華書店

版次：2019年9月第1版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開本：965毫米 × 635毫米 1/16

印張：15

字數：166千字

定價：65.00元

本書由“滿屋書香”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讀什么書或者想獲得更多免費電子書請加小編微信：sisijuan2012或QQ：151680600 小編也可以結交一些喜歡讀書的朋友。或者關注小編個人微信公眾號名稱：滿屋書香。 公眾號中可以獲得書香君所有分享的免費電子書！

# 理想國譯叢序

“如果沒有翻譯，”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曾寫道，“我們無異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語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應說：“翻譯不僅僅是言詞之事，它讓整個文化變得可以理解。”

這兩句話或許比任何復雜的闡述都更清晰地定義了理想國譯叢的初衷。自從嚴復與林琴南締造中國近代翻譯傳統以來，譯介就被兩種趨勢支配。它是開放的，中國必須向外部學習；它又有某種封閉性，被一種強烈的功利主義所影響。嚴復期望赫伯特·斯賓塞、孟德斯鳩的思想能幫助中國獲得富強之道，林琴南則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變國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與故事，必須以我們期待的視角來呈現。

在很大程度上，這套譯叢仍延續著這個傳統。此刻的中國與一個世紀前不同，但她仍面臨諸多嶄新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他人的經驗來幫助我們應對難題，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是面對復雜與高速變化的時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保持一種非功利的興趣：對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本身充滿興趣，真誠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經驗。

# 導讀 異端之必要

許知遠

一

最后一次談及鶴見俊輔，是在一家過分擁擠的意大利餐廳里。這是紐約4月的一個傍晚，我與坂本龍一斜對而坐。

比起工作室內的不無拘謹，此刻的坂本情緒亢奮，不無孩子氣式的調皮。比起談論我不在行、他或許也感到厭倦的音樂話題，日本的思想傳統更激起彼此的興趣。

他說，要是碰到吉田松陰，就會猛擊他一拳——正是這位長州藩士最先提出入侵朝鮮與中國；他還說，與夏目漱石最有共鳴，因為他也身處東西文明之間。

在一張餐巾紙上，我寫下了幾個日本知識分子的名字，丸山真男、加藤周一以及鶴見俊輔。在我有限的理解中，他們是戰后日本社會的關鍵人物，他們的思想與行動塑造了一代人的成長。出生于1950年的坂本龍一雖以作曲家享譽世界，他的青年時代卻恰好與戰后的思想自由、社會介入、反叛意識緊密相連。在一則廣為流傳的故事中，英俊少年坂本龍一，坐在抗議的人群中，彈奏一首德彪西。看到餐巾紙上的這些名字，坂本更為激動，他回憶起父親的文人朋友，以及自己的青春。

對丸山與加藤，我尚讀過一些著作。對鶴見俊輔，我的印象則來自于剛剛讀過的訪談錄《戰爭留下了什么》。在其中，他談論自己的童年、所經的太平洋戰事、創辦的雜志、對戰后政治與思想世界的介入、學生運動，以及他著名的“轉向”研究——一代日本知識人在戰爭中如何放棄自己的立場，投身于軍國主義。

他直率、頑童般的個性，一下子征服了我。他說自己是個典型的不良少年，十二三歲就逃學、喝得爛醉，混跡于東京的風月場所，多次想自殺，有一次吞下了一百五十粒安眠藥，幸虧警察制止及時。

這自我傷害的沖動源于家庭。他外祖父后藤新平，曾出任臺灣的民政長官、滿鐵總裁與東京市長，是明治、大正年代著名的政治人物，參與了日本陡然的對外擴張。母親是位控制狂，以一種令人窒息的方式愛著兒子，甚至因偷吃華夫餅而體罰他。她期望將兒子培養成一位“絕對正確”的男人。父親鶴見祐輔正是這樣的“正確”男人。他以一高第一名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接著成為一名自由派作家與政客，以成為總理大臣為己任。他把自己的雄心傳遞給兒子，為他起名俊輔，正是取自第一任總理大臣伊藤俊輔（即伊藤博文）。

鶴見俊輔是這個貴族之家的反叛者。十五歲拍攝的照片上，他理著寸頭，滿臉的桀驁不馴。這是1937年的東京，日本正全面卷入與中國的沖突。為了將他從自虐的境遇中解脫出來，父親送他前往美國。憑借勤奮與天資，他進入哈佛攻讀哲學，老師包括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等著名人物。盡管受實證主義訓練，他卻對懷特海（A.N.Whitehead）的一句話記憶尤深，“Exactness is a fake”（精確是虛假的）。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他因日本身份以及對無政府主義著作的偏愛，被送進拘留所，在馬桶上完成學位論文。1942年，他被遣返回日本后，發現這已變成了一個陌生的國家。從前的自由主義和社會批判力量幾近消失，人人生活在被監控的恐懼中，似乎日本自身而非美國才是敵國。

他隨后被派往爪哇，為海軍翻譯敵臺新聞。在這熱帶島嶼的軍營里，思想自由幾乎是不可能的，周圍人皆沉浸在日本必勝、干掉“鬼畜美英”的情緒中。他每日緊繃嘴唇，一個多余的字都不講，只有在獨自閱讀宗教作品或收聽印度的廣播時，才稍感安慰。他發現印度的BBC廣播節目內容尤其好，后來得知它的制作人是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恐懼滲透入他的肢體動作中，被長官問話時，為了掩飾內心的真實想法，鶴見的手不由自主地在褲子蹭來蹭去，將白褲蹭成黑色。

他躲過了死亡。返回日本不久，在收音機里聽到天皇宣布終戰的消息時，他記得熱海車站中，候車室的人“都不說話，誰都什么也不說……就只是坐著”。

美軍的到來，并沒有將鶴見從孤立中解救出來，他反而陷入雙重的羞愧。他既內疚于沒有在戰爭時期做出公開反抗和遭到逮捕，也內疚于自己曾跟著美軍返國又會說英語。隨著占領軍的到來而萌生的屈辱，讓他盡管英語流利，又有不少哈佛的同學在駐軍工作，卻始終沒有加入這股新潮流。

1946年初夏，他找到了表達自我的方式。他參與創辦了一份只有三十二頁、純粹出于興趣的雜志——《思想的科學》。這本雜志所提出的“多元主義”正契合新的時代精神——正是一元的權力與價值系統，將日本拖向了毀滅。創辦者中的丸山真男、都留重人皆是正在崛起的年輕思想家。也是借由這本雜志，二十四歲的鶴見俊輔展露出他的獨特的思想方式。

在接下來的三十年中，鶴見俊輔成為了動蕩、卻也充滿活力的政治與思想生活中，最令人難忘的角色之一。《思想的科學》引介美國哲學、思想啟蒙，前往各地組織讀書會，征集年輕作者。鶴見還公開抗議政府的舉措，辭去教授職位，更組織“越平聯”，抗議越南戰爭、營救美國逃兵。

這些行動也代表著他的思維方式，把各種事物、現象，都作為思想的日常形態加以考察。比起抽象、絕對的觀念，他更信任個人經驗，盡管這經驗可能是片面的。他的家庭、他父親的選擇、他的戰時體驗，都成為他研究的出發點。

他最重要的“轉向”研究也是如此。1959年至1961年間，他與合作者完成了三卷本《轉向》，追溯并討論為何在戰時日本，知識分子們，不論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自由派，還是宗教人士，皆在國家權力的強制下，半強迫、半自愿地轉變了思想。

“轉向”肇始于1933年5月，東大新人會的發起者，也是當時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佐野學與鍋山貞親，撤回了他們之前的主張，包括廢除天皇制、賦予包含殖民地在內的各民族的自治權，也不再反對“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反而宣稱要從蘇聯的桎梏中解脫出來，尊重天皇代表的文化價值。與歐洲不同，自由主義、人道主義、實證主義對日本的影響一直微弱，馬克思主義是對現實最有力的批判武器。它的失敗，意味著批判力量的放棄，而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更是毫無抵抗力，社會旋即滑向法西斯主義。

鶴見俊輔想要探究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他說，這項研究是他對父親經驗的回應。他的父親是著名的自由主義者，說一口漂亮的英語，但戰事一起，他立即投身于軍國主義，沒有做出任何抗議，美軍到來后，他又期望能擔任首相，并在最終出任了厚生大臣。在鶴見眼中，父親正是日本的縮影——充滿明確的外部目標，內在卻極為空洞。

二

我想象了“親子丼”的香氣。雞蛋包裹著雞肉的蓋飯，在審訊室中一定散發著無法抵御的誘惑。這是戰前的日本警察對付激進大學生的方法，在嚴刑拷問后，警察局局長會自掏腰包，叫來這道流行的料理，在你吃飯時，不談政治思想，只說些“你的母親很擔心你”的話。這些年輕人很少不為此打動，承認思想的錯誤。

在《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上，我讀到這個小小插曲，它是生動、難忘的歷史細節。鶴見俊輔絕大部分作品尚未進入中文世界，包括著名的三卷本《轉向》。因此這本兩百多頁的演講集，或許是個理解鶴見俊輔的便捷入門，你可以一窺他的問題意識與思想方式。它其中充滿了“親子丼”式的細節。

“從現在開始，我要談論的主題是，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精神史”，鶴見以這句話開始了演講。這是1979年秋天的蒙特利爾，他為麥吉爾大學的年輕學者講述戰時日本。盡管只有十個學生，這持續了七個月的講座，給五十七歲的鶴見一個重新審視自己多年研究的機會。使用英文而非日文授課，更為這種審視增添了新維度。

十五年戰爭，鶴見俊輔富有創建性地提出了這一概念。按照西方世界的眼光，日本人的戰爭直到1941年的珍珠港事變才開始，而按照中國的視角，它其實從1931年就已發生。而按照鶴見的個人經驗，尚在讀小學的他記得，政府用“滿洲事變”“上海事變”“日支事變”這些聲明，令人覺得它們都是孤立的事件，但事實上，它們是連續的戰爭狀態。

這十五年，因為其極端性，也是理解日本的最佳切片。一個因為明治維新而成為東方楷模的國家，一個在大正時期展現出世界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國家，如何突然變成了一個反西方、高度專制的國家？那個以禮貌、美感聞名的民族，如何突然變成了殺戮機器？這一段時光，是日本歷史中的偶發事件，還是具有某種必然性？

這些日本問題，就像希特勒時代的德國，或是墨索里尼時代的意大利一樣，不僅與本國相關，更具有普遍的意義。專制，這種政治生活之癌，是如何一點點侵蝕一個健康肌體，而人們又是怎樣喪失抵抗能力的。與德國、意大利不同，日本從未有過一個魅力四射的獨裁者，一個總是掩藏于幕后的天皇與一群技術官僚，導致了這一切的發生。他們似乎既全能又無能：他們可以動用各種強制力量，消除異己聲音，但在明知必敗的情況下，卻無力結束戰爭，只能被動地跟隨形勢。

在這本小冊子中，鶴見俊輔對這種矛盾性做了一次妙趣橫生、富有洞見的導覽，它與歷史、現實、未來都緊密相關。

他提及了地理位置給予日本人的雙重感受。住在四面環海、被神護佑的土地上，日本人有種特別的安全感；但他們又覺得自己被隔離在世界更普遍的文明之外，而有某種自卑感，經常陷入強烈的求知沖動。即使黑船來航后，這種鎖國傾向也未真正改變。外來的思想、語言，似乎難以真正改造這個民族。

這種矛盾性也表現在對“國體”的理解。早在幕末時，吉田松蔭就與山縣大華展開一場爭辯。前者相信，日本的國體以萬世一系的天皇為中心展開，具有絕對的獨特性；后者則認為，每個民族都有同樣的推進力量，日本并不特殊。這場爭辯貫穿了之后的歲月，日本第一部憲法也體現出這種矛盾，在這個框架中，天皇擁有不受制約的權力。20世紀30年代，美濃部達吉遭到批判，象征著普世說的失敗。

教育也是如此，在小學與士兵的教育中，采用以天皇神話為中心的世界觀，而高等教育則以歐洲為模板，相信天皇的權威要被限制在憲法之內。前者是“顯教”，后者則是“密教”。在鶴見俊輔看來，明治時代的締造者們設計了一套方案，希望“顯教”與“密教”共存，彼此制衡，但最后顯教部分吞沒了密教部分。

面對復雜的國內矛盾，日本政府沒有進行相應的社會改革，反而開始軍事擴張。鶴見俊輔也描述了日本對于中國、朝鮮、緬甸、印度尼西亞的態度。日本具有“大亞細亞主義”的傳統，期望締造亞洲聯盟，聲稱要將亞洲各國從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救出來。但這些國家很快就發現，作為殖民者的日本，甚至更為殘酷。其中的朝鮮受害尤深，在日本心里，全世界的民族中，朝鮮永遠處于最低的位置。

令鶴見俊輔欣慰的是，戰時日本不僅有“轉向”與狂熱，也有日常的反抗。家庭主婦不理會政府的配給管制，想盡辦法從黑市獲得食物，養活家人。男人的離去令她們更獨立，對于政治宣傳也有天然的免疫力。燈臺社的少量信徒，堅持自己的信仰，在法庭上留下這樣的證詞：“現在，跟隨我的只剩下四個人，加上我一共五人。這是一場一億人對五人的戰爭。到底是一億人獲勝，還是五人所說的神諭贏得勝利？不久就能獲得證明。我確信這一點。而且我們處之泰然，毫無所懼，何必多言。”即使神風特攻隊中，也有青年在窒息的氛圍中展現獨立的思想，意識到日本必將失敗，自己的死亡是無意義的，并把自己的想法寫下，寄給哥哥。很可惜，他們都在孤立中死去。

這些例證使鶴見寄望于普通人，他們仍擁有日本村落中的自治與寬容精神。這是日本重要的自由傳統，只要對方是村中的居民，就不會被排斥。在鶴見眼中，“通過生活方式互動所得的正直感，遠比知識分子操弄的意識形態更具重要的精神意義”。他在戰后積極參與的市民運動，也正是來源于明治以前的村治傳統。

這本小冊子有一個明確的標題，它要探究戰爭時期日本社會的精神狀況。它的結構略微松散，你常抓不到核心。不過，它反而給予一種特別的開放性，將我引導至很多方向，開啟了新的好奇心。其中很多例證，比如昭和研究會的尾崎秀實、關于朝鮮的小說，都打開了你理解戰時日本的新視角。它從十五年戰爭出發，通向日本的過去與未來，更通往亞洲與世界。倘若你不把它當作嚴密的分析、論述，而是作為一個妙趣橫生的導覽，你會發現一張歷史與意義之網。

鶴見俊輔在麥吉爾大學演講時，戰爭已結束三十年，在世界眼中，日本不再是那個被原子彈摧毀的國家，而是咄咄逼人的經濟強權，一些人宣稱“作為世界第一的日本”。這個日本仍不可理解。人們曾難以理解沖向美國艦隊的神風敢死隊，如今則好奇于日本商社如何制定戰略，穿著統一西裝的職員們又為何可以不眠不休地工作。不管外表看起來多么西方化，日本仍是個謎。

當我在2019年讀到這本書時，日本的形象再度發生變化。經歷了泡沫經濟的崩潰，剛剛結束的平成年代與才開啟的令和年代，給予日本一種平靜、美麗的新形象。但在很多地方，日本仍是個謎。

在此刻，回顧十五年戰爭的意義何在？鶴見俊輔記得，他的哈佛同學充滿饑渴地想了解戰時的日本經驗，因為他認定這對美國也至關重要。事實的確如此，敏感的日本人一定可以在麥卡錫主義中辨認出似曾相識的因素。日本的故事，不僅僅屬于日本。歷史也從來不僅是歷史，它仍強有力地影響著現在。

“領導者對日本與假想敵國在軍力和經濟力上的差距，一直提供給國民相反的資訊，導致自己也因此陷入自我欺騙的境地。對國家的領導者而言，要從對國民的持續欺騙中，保持自我的清醒，是非常困難的。”當你讀到這種語句，你也會清晰地意識到，它不僅是戰時日本的寫照，也是所有權力高度壟斷社會的癥結。它出現過，也可能再度出現。

# 一 向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趨近

1979年9月13日

從現在開始，我要談論的主題是，1931年至1945年的日1本精神史。在進入主題之前，我先說明幾點隨想。

首先，是語言方面。由于以下談及的事物大都發生在日本，所分析的思想，原本也以日語表述。現在，由于身處在這使用另一種語言的國度（加拿大）[[1]](#_1_1)，我打算揚棄對日語的依賴，試著敷衍論述。我想在這里建立一個我們之間的共通規則，亦即只用英語理解我們的研究對象。然而，我選定的這種方法，旋即令我，乃至我們陷入一個困境之中。怎么說呢？我抱有一個信念，這信念雖說在邏輯上難以成立，但卻可以得到統計上的支持。那就是，說英語的日本人不值得信任。1945年至1952年美軍占領日本期間，我曾就此再三向遇見的美國人說明。因此，對我來說，我希望各位在我試圖談論日本之際，對我所說出的話，都能稍打折扣，再予思考。隨著美軍占領日本時代的遠去，1945年日本戰敗的記憶也逐漸淡遠，英語侵入日語之中，因此現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充斥著源于英語的語匯。在報紙的廣告中，我時常可以看見類似“シックなドレスのファッションショー”[[2]](#_2_1)的語匯。這句廣告詞中，源于日語的單字只有“な”和“の”兩個連接詞而已。

再舉一例，有位美籍學者研究日語多年之后來到日本，某天在圖書館閱讀日本的綜合雜志時，他碰到一個無論如何翻查字典、任憑想象仍不得其解的語詞。他抄下那句語詞，請教日本的學者。原來就是這個“ヒット·アンド·ラン”[[3]](#_3_1)片假名讓他百思不解。由于這些語匯的使用，已超出原本的語意，若非日本人實在很難了解。現今，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外來語俯拾即是，因而我還是堅信先前我所說的“信念”，是有某種根據的。

在我看來，借用歐化語言的表述，未必意味著思考本身的歐化。但由于在短期間內，從歐洲語言中借用如此之多的語匯，就某種意義而言，現代的日本人可說也變得難以了解自己。確實，就某個層面而言，我們已經失去自覺自身思維方式的思路。

其次，我想強調的是，我希望這門課成為一個開端，借此讓我們理解戰爭期間日本發生了什么，日本之外的地方又發生了什么，以及非戰爭期間的時代，日本和日本以外的地區發生過什么樣的狀況。在日本，“轉向”一詞，最早出現在20世紀20年代，到了30年代之后已被廣泛使用。這個字眼并非源于歐美的語匯，它是在日本戰爭期間的政治氛圍中，所衍生出來的語詞之一，而這個概念也對十五年戰爭期間，日本的知識和文化的走向有重大影響。這一語詞的形成，除了能以世界精神史的范疇來討論之外，亦可從其中發現日本獨具的特征；因而從其形成的模式中，我們有可能從中梳理出一些端緒，借此理解日本以外、世界其他各國的趨勢，及其與“轉向”事件的關系。亦即通過這個理論模式，可以讓我們理解到，對當今世界局勢的努力，有實踐的可行性。[[4]](#_4_1)

第三，在文化史和精神史的研究方法中，那些被當成脫離標準范式的現象，反而更能表現出該社會的文化特征。1931年至1945年日本所發生的事情，不能視為明治初年以來，近代日本史中的一個偶發事件而加以抹殺。[[5]](#_5_1)仔細探討的話，它既告訴我們諸多值得積極繼承的事物，又揭示許多我們應該否定的東西。我們是經由錯誤成長，并且是經由自覺到我們所犯的錯誤中，包含的真理與價值而成長。

第四，以歷史的區分而言，我們在此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肇始，設定于1931年中日戰爭[[6]](#_6_1)的爆發。1931年日本的陸軍領導者在中國的滿洲開啟戰端，并進而在這個地區建立日軍的傀儡政權。這種方法對整個世界而言，實乃前所未見。因而后來也導致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國的希特勒都加以仿效。因此我們可視1931年始于中國東北地區的中日戰爭，為一個全新趨勢的開始，影響著整個世界。如此，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歷史，對全世界而言，雖說不過是地方史，但已然成為20世紀日本史與世界史連接的一個環節。[[7]](#_7_1)

第五，我也想談談19世紀日本向西方開放門戶之后，流傳于西方各國的日本情趣。當時，寫過日本的有巴茲爾·張伯倫（Basil Hall Chamberlain，1850-1935）、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1850-1904），以及伯納德·利奇（Bernard Leach，1887-1979）等。雖說此外還有許多人，但其中我對陶藝家利奇最感興趣。他是少數對日本不失青年時代之熱情，對日本文化不表失望的人物之一。至少，他跟同為英國人的張伯倫和小泉八云相較，對比強烈。這其中似乎包含幾個理由：理由之一，在于利奇很早就對中國文化和朝鮮文化抱持一份親密感，亦即他在親近日本文化的同時，也對中國文化和朝鮮文化抱有一份親密感。因此，他很早便擁有自己獨特的視角，將日本文化視同中國文化、朝鮮文化，加以吸收掌握。正因如此，日本文化對利奇而言，才不至于突然從某個時期開始，由原本的清純，轉變成丑陋、可厭。

由朝鮮審視日本，我們可以看到日本令人厭惡的一面；從中國看日本，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淺薄的一面。來自其他的外國研究者，大都從自己停留在日本時的經驗來研究日本，所以當他們把目光投向中國或朝鮮時，難免對日本文化感到失望。當然，倘若外國人對日本的興趣僅僅是出于異國情調，他的愛好與觀點必然維持在其出生國所受的各種文化熏陶。在這樣的情況下與日本文化的接觸，只是在其原本的各種價值觀上，蒙上一層日本文化的外衣，整個內涵依然沒有改變。這樣一來，難免會在某個時期對日本文化突然感到失望，或不得不做出重大修正。然而，如果認為接觸另外一個國家的文化極為重要，同時有意把這異國文化的異質價值納入自己原有的文化價值體系中，抱持這種信念的人，其接觸日本文化的方法，便是將日本文化與朝鮮文化、中國文化以及其他亞洲各國的文化并置，同時放入視野中。如此，應較能掌握日本文化的真貌吧。這個理解日本的方案，是在空間的架構下，將日本與朝鮮、中國結合，一起思考；倘若要再加上與此相對的時間架構，那為了理解現在的日本，掌握日本在1931年至1945年漫長爭戰中的歷史背景，就變得至關重要了。

我想先從缺點方面，清楚表明我對主題的趨近方法。在這7門課程中，無論是資料或詮釋上都存在著各種缺陷，請各位特別留意。

我先談談資料的問題。研究現代史，要達到搜集所有必備資料加以驗證的嚴密基準，可說是相當困難。相較之下，古老時代的歷史似乎較有嚴密的基準，因為重要的文獻大都已經散佚。如果是中世紀史，它在研究上似乎比現代史容易達到完美的境地吧。但僅憑這樣就說中世紀史的研究對照于中世紀的實際狀況已臻于完美如實之境，那又令人存疑。若單就留存于世的資料而言，或許我們可以讀盡現存的所有文獻；而根據這些資料寫成的記述，其顛撲難破之處，更是現代史研究所難望其項背的。然而，現代史研究，包括文化史和精神史，甚至連想要達到字字難以推翻的自我滿足的境界，都是困難的。

至于資料的詮釋方式，也無法輕易地就能達成共識。如何詮釋現代的事件，常因我們平時抱持的偏見而有所歧異。我們必須尊重和正視這種無可避免的諸多詮釋。在這門課程中，我們盡可能地對所見的必要事實做一番粗略的鳥瞰，如果與實際報道有所不同，也要忠實地把這些差異記錄下來。而且也必須指出，單靠被報道出的事并不足恃，因為未被報道的事也包含許多重要的事實。我們也不該忘記，這些未被報道的重要事實，也許今后將會出現，但也可能未被揭示出來。

我也希望借由這樣的努力，增進我們積極討論的機會。我們得以清楚地認識到，無論是材料或解釋方法本身都存在著諸多缺陷，更要認清互為矛盾的解釋往往是建立在極可疑而又不充分的材料上。現在，我們打算以此方法來描繪現代史的畫卷，并衷心期待這個努力能激發出更多踴躍的討論。

[[1]](#_1) 作者于1979年至1980年間，在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講學，以英語講授日本近現代史。本書由其授課講稿改寫而成。——編注

[[2]](#_2) 意為“時髦服裝秀”，由chick、dress和fashion show幾個詞組成。——本書腳注如未特別標示皆為譯注。

[[3]](#_3) hit and run，打帶跑。

[[4]](#_4) 即“九一八事變”。

[[5]](#_5)為了方便授課，我省略掉參考文獻的出處，現在以“注”的形式補充一些。我探討“轉向”的文章得助于“思想的科學研究會”編的《共同研究·轉向》上、中、下（1959-1962）甚多。此書的改訂增補版（1978）由共同研究的成員自行修正觀點并評定新資料。對增補版提出批判的是出席我這門課程的學生，他先用英文撰寫，后來用日文發表。從這批判中，我受益良多（見辻信一，《轉向論的新地平線》上、下，《思想的科學》1981年5、6月號）。這種批判是從筆者居住的加拿大亞洲少數民族間的轉向經驗中所得，鮮明地展現出轉向研究可能存在的各種觀點。在“思想的科學研究會”的共同研究之前，已有本多秋五的《轉向文學論》（1957）；與共同研究同時進行的論述中，對我們最具沖擊的有吉本隆明的《轉向論》（收于《藝術的抵抗與挫折》，1959）。

[[6]](#_6)有關1931年至1945年的戰爭時代，到底是日本近代史上不太重要的時期，抑或是理解近代日本的重要時期，已成為現代日本論的爭議點之一。關注的焦點不同，所走的路線自然不同。1963年，我當時任職的同志社大學曾邀請美國大使賴紹華（Edwin O.Reischauer）舉行討論會，針對賴紹華主張盡量不要把1931年至1945年看成是日本軍國主義時代的觀點，我曾提出若干異議。由此看來，美國統治階層的觀點和日本統治階層的觀點，在這一點上幾乎一致。當時出席的有：奧蒂斯·卡里（Otis Cary）、賴紹華、豬木正道、坂田吉雄、鶴見俊輔等。會議記錄《日本的民主主義——過去·現在·將來》，刊載于《日美論壇》1963年6月號。

[[7]](#_7)在我的童年時代，戰爭的信息紛沓雜來，比如“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七七事變”、大東亞戰爭等等，從主觀上掌握信息容易造成戰斗行為是零散進行的錯覺。我是在戰后才覺得（這種印象）有點奇怪，因此，我認為把它當成有其連續性的戰斗行為比較接近事實（不是我意識上的事實）。如此大言不慚，又盡舉些小事論證，實在有點惶恐。不過，當時大為暢銷的遠山茂樹、今井清一、藤原彰合寫的《昭和史》（1955）的書腰上，標出“短短三十年，我們經歷兩次戰爭！”的警語。我認為這樣看待昭和史并不妥當，于是寫了一篇文章《日本知識人的美國觀》（刊于《中央公論》1956年7月號），批判這本《昭和史》的書腰文字（不是批判內容），希望在現代史中把1931年至1945年的戰爭界定為一個整體來看待。我想出“十五年戰爭”這個名稱，得自于西格蒙德·諾伊曼（Sigmund Neumann，1904-1962）著《現代史——指向未來的路標》（1946）這本書的啟示。這本書用“三十年戰爭”一詞，來指稱兩次世界大戰間的整個時期。后來逐漸有人開始使用“十五年戰爭”一詞。正如家永三郎在《太平洋戰爭》（1968）序言中所述，他就是采取“十五年戰爭”這種劃分法的。至于我為什么使用“十五年戰爭”一詞，我在《日本知識分子的美國觀》一文已經表明，亦即把太平洋戰爭或大東亞戰爭看成是對美國的戰爭并不恰當，因為這種戰爭觀點無法掌握這次戰爭的結構，而且這樣會使日本人淡化戰爭的責任。根據目前調查，最早使用“十五年戰爭”一詞是在《知識分子的戰爭責任》（刊于《中央公論》1956年1月號）這篇文章，解釋其創詞來源的是拙作《日本知識分子的美國觀》。

# 二 關于轉向

1979年9月20日

首先，我說明一下“轉向”的背景。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對日本而言是個嶄新時代的開端。自1867年明治新政府成立以來，約莫四十年間，日本國民都生活在必須攀登“文明階梯”——如果說真有這種東西的話——的使命感之中。這類虛構之物，相信只要身為“國民”，不管身處何國，都可感受其存在；并且，我們可以說這類虛構之物，長期以來，在國民的想象力中不斷地發揮作用。因此可以這樣說，從明治時代開始，“文明階梯”這一虛構物，對日本國民的想象力始終發揮著重大的作用。

日本對俄的戰爭，乃在沒有敗北的狀況下結束；其在政治、軍事上的一大事業成就，可說是凌駕拿破侖和希特勒。由此我們可以推論，這項大事業的背后必定多士濟濟，有具備國家領導能力的人在掌舵。

日本自廢除鎖國政策大開門戶之后，德川幕府的封建制度便被推翻，在新的國家政策推行以來，培育出與過去截然不同的新觀點，即不以封建制度下的身份來判斷人的價值。參與推翻德川政權運動的青年們，創造出一種默契，亦即在跨出藩國界線、脫離藩屬之后，彼此都平等相待，視彼此為志同道合之士。這些依自己意志斬斷與藩政府關系的武士們，把做了同樣決斷的武士視為同志。這些“脫藩浪士”們之間所展現的同志關系，影響力極大，甚至令那些愿為同樣目的獻身，但選擇留在藩內沒有脫藩的武士們，彼此之間也產生了類似的氛圍。

在反德川政府的運動中，被捕殺的人不計其數。在運動進行時，沒人能夠預測誰可以活下來成為新政府的領導者。運動的倡導者在權力實際轉移之前，幾乎都為理想捐軀了。例如，吉田寅次郎、橋本左內、坂本龍馬、高杉晉作等人。其后，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被視為實現這些先烈的構想、成功地推翻德川幕府并建立新政府的重要人物，也先后在明治維新后十年間相繼死亡。西鄉隆盛發動叛亂兵敗自殺，大久保利通遭到暗殺，木戶孝允則是抑郁而終。明治維新之初的重要領導者中，只有巖倉具視一人長壽，挺過維新之初兵荒馬亂的年代，成為當時活躍于日本政壇的重要政治家。但除了他以外，幾乎所有的主要領導者，都在明治維新后十年內相繼凋零。也因此，在進入明治時代之后，這些志士們短期間依然保留著一種敏銳的自覺，清楚地意識到，參與推翻幕府運動中的精英分子都已不在人世。

這份謙虛的自覺，和為免淪為西方各國的殖民地、協力守護日本的共同意識相結合，賦予幸存的日本后繼領導者，某種勤勉質樸的特質。他們拼命學習趕上西方文明的方法，即使在日俄戰爭方興未艾之際，日本的國家領導者對國家面臨的處境仍未喪失冷靜的判斷力。他們清楚知道，必須趁日本的國力和英、美國民的同情心尚未耗盡之前，盡快結束對俄戰爭。他們并未被打敗俄國的幻覺所欺騙。正因為領導者們都有這種共同的自覺，陸、海軍的最高司令官才贊同內閣盡速簽訂和約，即使這和約只能為日本帶來些許的表面利益。這些領導者不怕違背日俄交戰之時，所醞釀出的輿論動向而做出決斷。在此，我不以明治維新為起點，而談及幕末到日俄戰爭這段時間領導階層的氣氛，主要是想凸顯明治時代的領導階層，與承繼其后的大正、昭和時代領導階層的對比。而剛剛所列舉日俄戰爭期間，日本的政治及軍事領導階層的各種特征，在昭和時代的十五年戰爭開始前，便已消失無蹤。

日俄戰爭結束后，還活在世上并成為新政府領導者的維新志士，認為已經趕上西方的先進國家，原本緊繃的神經因而緩和下來。他們自視為“華族”[[1]](#_1_3)，自封為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作為慶賀。日俄戰爭期間的陸軍次官，能受封男爵；按這標準，軍司令官能受封子爵，陸軍大臣則能受封為伯爵。然而，有資格受封最高位階的人卻都已經死了。明治初期以來功勛彪炳的領導者，雖有少數幾人在這時肉身猶存，但他們的狀況，猶如杰柯博士原本的身體中住著另一個海德先生一樣[[2]](#_2_3)，體內住著不同的人格。他們往后就是不斷努力地宣揚明治維新的豐功偉業，在反復的陳述中，他們在這個故事中扮演的角色也就愈顯得偉大。從實用觀點來看，這個方法對他們攀升貴族階級的階梯幫助甚大。

1945年日本戰敗后，曾有所謂短暫的后悔時期。在這短暫的后悔時期結束時，日本的輿論出現了要求一一恢復往昔制度的呼聲。這些要求幾乎涵蓋了每項往昔的制度，但明治以來持續至戰敗為止的華族制度，卻是少數的例外。據我印象所及，戰后的三四年間，報紙上從未出現過要求恢復華族制度的社論或讀者的投書。[[3]](#_3_3)明治時代以后，制定的身份制度沒發揮多少作用；至少在這一點上，整個戰后時期的輿論是完全一致的。

相反，明治中期制定了與此稍有不同的身份制度，也就是基于學校入學考試制定的身份制度。盡管近來持續有學生進行抗議，這項制度現在仍然受到國民普遍的支持。這項入學考試制度，原本是模仿中國的考試制度，在日本創設出來的。但是，明治時代以前，這項入學考試制度并沒有開放給所有階層的人。考試制度和學校教育結合，而且開放給社會上所有階層，是明治時代以后才有的。也因為這個理由，現在的日本仍舊廣泛信奉考試制度，以及據此運作而來的學校制度。

明治時代以前，初等教育已有相當程度的普及。據說，明治初期，男性的識字率約為40% ~45%，女性則為45%，而且這些人也具有算術等實用知識。這是德川時代的教育遺留給明治時代的資產。這種教育是和民眾的日常生活相結合，并非與選拔考試的教育制度結合。[[4]](#_4_3)

明治以后，新政府所采行的教育制度，并不打算將明治以前的教育制度加以延長，而是改采以歐美制度為藍本所創設的新教育制度。他們設置東京帝國大學作為最高學府，只要能通過不斷的選拔考試，任何國民都有希望能進入就讀。這制度也成了刺激全體國民的向學心，讓日本追上西方文明的有效手段。

誠如羅納德·多爾（Ronald Philip Dore）在《學歷社會——新文明病》[[5]](#_5_3)中所述，日本政府早在1880年就已經使用考試制度選拔公務人員。當時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任職公務人員不需經過考試，并且保證一開始就能擔任較高的職位。這樣的制度對產業也造成影響。1910年以前，非政府的絕大多數的私人企業，都已養成只從大學畢業生中錄用新進人員的習慣，報社也跟著建立這個慣例。就這一點而言，日本比產業革命發祥地的英國還更先進。

多爾還舉出一個例證，1955年《日本紳士錄》里所登錄的人士中，有70%是大學畢業或專科學歷。而在英國同類的名人錄里，1958年企業界董事中只有21%具有大學學歷。英國前兩百名主要公司的負責人當中，只有24%為大學畢業或專科畢業。

日俄戰爭結束之后，日本的政府官僚、產業界及新聞媒體等各個領域的領導階層，仍然是由大學畢業生所占據，當中又以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為中心。這種現象并未因為始于1931年的十五年戰爭失敗而有所改變，也沒有因為其后美軍占領日本而改變。

為了理解“東大新人會”的重要性，必須了解上述的現象。1917年發生的俄國革命，帶給日本大學生極大的影響。翌年的7月23日，日本抗議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米價上漲，因而造成“米騷動”。[[6]](#_6_3)暴動始于距離日本首都很遠的鄉下，再擴展至大都市。這場暴動并非由政治人物策動的，而是始于地方人士自發性的抗議行動。因為日本人自己體認到“米騷動”是群眾力量的展現，意味著日本開始進入新的時代。

因為日本有艱難的入學考試制度，所以能夠通過公立高等學校入學考試的青年（從公立高中畢業后，進入帝國大學并不困難），都覺得已經取得進入帝國大學的資格，不久后將成為日本未來的領導人。十八歲左右就能達到如此成就，說來或許有點夸張，實際上卻是如此。通過舊制高中考試的十八歲日本少年，覺得整個人生中最困難的競爭部分已經結束了，接下來六年的學校生活可以用來描繪日本未來的藍圖。俄國革命和“米騷動”，對置身在這段期間的年輕人（高中生、大學生）的構思能力影響極大。

就在這時候，被視為日本民主思想的代表——東京大學法學院政治學教授吉野作造，接到要他與右翼運動領導者同臺辯論的挑戰書[[7]](#_7_3)。此時的吉野似乎身陷于危險的處境中。然而，公開演說的當天，會場聚集的聽眾多半是大學生，他們都明顯地支持吉野的論點，使暴民們無法威脅吉野教授的安全。吉野教授的學生們覺得日本已經出現新的歷史浪潮。

演講會舉行后半個月左右，正逢俄國十月革命后一年又一個月，亦即1918年12月，東京大學法學院的學生赤松克麿、宮崎龍介和石渡春雄創立了“東大新人會”。組織綱領是由赤松起草，內容如下：

一、吾人配合世界文化之勢——人類解放的新趨勢，并努力促進之。

二、吾人致力從事現代日本之合理改造運動。

這項運動從東京大學擴展到其他大學，甚至擴及即將于兩三年后成為帝國大學學生的高等學校里。[[8]](#_8_1)

學生運動很快地就超越了他們老師所主張的溫和的民主主義原則。吉野作造認為，民主主義的原則是一種規范，所有社會文化的習慣中都含有這種規范，因此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發揮作用。不只在所謂的文明國家，縱使在不算是文明國度的國家也能發揮作用。由此看來，吉野教授的觀點和東大新人會成員的觀點并不相同。

在當時的日本，吉野教授正致力于廢除國會的貴族院與天皇的統帥權。如果這個目的能夠實現，那么派駐在殖民地的陸軍部隊指揮官們，就無法獲得未經選舉而出任國會議員的人士支持，借機擅自發動未經宣戰的戰爭了。

吉野作造溫和而實際的目標，在學生運動以意識形態為本位的基準看來，未免太過溫和而無意義。東大新人會的成員們與社會主義政黨的工會結合起來，后來，有部分成員成為共產黨員。這群新人會的成員對于20世紀20年代，組織共同陣線阻止軍國主義的議題并不感興趣。吉野辭去東京大學教授的職位后，全心投入翻印再版對明治文化的形成具有影響的重要記錄的事業。

不久，新人會的創始人和創始成員背離了社會主義運動，轉而趨向國家社會主義。新人會創始人赤松克麿，1922年加入日本共產黨，其后又脫離共產黨，1930年出任社會民眾黨的總書記。此后，他開始闡述天皇的責任，認為天皇的責任就是保護國民的利益。這種觀點導引他把“九一八事變”[[9]](#_9_1)的發生，和建立“滿洲國”的舉動正當化。他已經在替日本尋找可以和定為國策的侵略中國政策并存的民主化與社會主義化的道路了。

另一位新人會的創始人宮崎龍介，在太平洋戰爭發生前的時期，即以內閣總理大臣近衛文麿公爵的密使身份進行活動，勸說中國國民黨與日本合作。

新人會創始成員之一的麻生久，曾以30年代社會大眾黨重要領導人的身份，推動工會的領導人與傾向國家社會主義的改革派軍官結合。在其他創始成員之中，以佐野學（1892-1953）最為重要。他二十七歲時，以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生的身份參加東大新人會。1933年，他四十一歲，擔任日本共產黨的委員長，同時也是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與同為中央委員會委員的鍋山貞親，在獄中發表“轉向”的共同聲明。[[10]](#_10_1)

佐野學與鍋山貞親撤回他們之前所有的主張：廢除天皇制、賦予包括被殖民的各民族在內所有民族的自治權等；并且，他們也撤回了原本所有論點的總結——反對日本政府的“九一八事變”政策。他們改口說，要從蘇聯的桎梏中解放自己，對天皇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價值表示尊敬，以發展日本的社會主義。

他們的共同聲明立刻引起極大的反響。共同聲明發表于1933年6月7日，其后一個月之中，所有未決犯中有30%與共產黨有關（1370人中有415人），34%的已決犯（393人中的133人）改變了政治立場。[[11]](#_11_1)三年內，有74%的已決犯（438名中的324名）聲明“轉向”；另外，堅守不“轉向”立場的，則有26%（438名中的114名）。[[12]](#_12_1)

共同聲明有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日本共產黨的最高負責人佐野學，并沒有提出退黨申請，即起草否定以往立場的聲明。此一共同聲明的特征，在伴隨著共同聲明發表而來的混亂與憤怒中，并沒有引起注意，但是它卻能表現出東大新人會所隱含的邏輯，也完全契合十八歲少年心性的框架。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正如剛通過最困難的入學考試而當上人民的領導者那樣，并且是用民主又公平的方法被選拔出來的。他們有一種信念，只要是依據這個方法所選出來的領導者，即使在心中政治上的意見有所轉變，仍然能繼續擔任領導者。從結果來說，追隨者表現出來的反應，也顯示他們接受領導者所默認的前提。

佐野與鍋山的共同聲明發表后，“轉向”一詞變成那個時代的流行語。這個詞匯被一般民眾納入日常生活用語之中。不過，這句話在被如此廣泛使用之前，還有一段歷史。幸存的明治社會主義者山川均，在《前衛》雜志發表一篇題為《無產階級運動的方向轉換》的文章，闡述前衛分子必須回到無產階級的群眾中。山川的看法是說，前衛分子必須對人民群眾為日常生活中部分要求與特殊要求所展現的斗爭，表示更高的敬意。相對地，在德國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后回到日本的年輕教授福本和夫，則批判山川的理論是折中主義——山川倡議的方向轉換本身就應該被轉換。按照福本的理論，共產主義者應該自覺本身的思考方法，并使之轉向，以此對同時代的社會能有所行動。于是“方向轉換”被縮寫而產生“轉向”一詞，意指人要自覺其自身思索的過程，并給予符合自身思想水準的新方向。也就是說，在這個意義下，“轉向”之前的思想是一種順從社會習慣行動的惰性思想。[[13]](#_13_1)

在學生間成為流行語的“轉向”一詞，后來被依《治安維持法》設置、對危險言行進行調查的思想警察所采用。《治安維持法》在1928年修正公布。思想警察為改變激進派大學生的觀念下了功夫，還出版如何技巧協助“轉向”的手冊。轉向并不能只靠逮捕入獄和加以拷問。根據池田克檢察官所寫的手冊，警察局局長應該從拘留所將被捕者叫到局長室，讓他們坐在局長的椅子，然后要自掏腰包叫來外送的親子丼。所謂的“親子丼”，就是雞蛋包裹雞肉的蓋飯，這樣可以讓人聯想到親子的關系。手冊上還說，吃飯的時候，盡可能不要談論政治思想之類的事，只能說些“你的母親很擔心你”之類的話；而且不能多談父親，否則反而會造成學生對權威的反抗意識。“轉向誘導術手冊”就是這樣進行的。被置身在這種技巧下受到誘導的青年，雖然以前依循福本和夫定義的轉向之路前進，但現在卻不能像以前那樣體現自己所信奉的政治理想，而覺得作為他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已然崩潰，于是朝著思想警察所定義的另一個路徑轉向了。[[14]](#_14_1)

“轉向”的另一個條件，是日本民眾對“九一八事變”的熱烈頌揚。因為他們全心奉獻的對象——人民，卻支持與他們本身信仰相悖的目標。此時，他們有一種孤立于人民、周遭親友和家人的感覺，這種孤立感使他們決定轉向。[[15]](#_15_1)1942年警方做出的統計，刊載于1943年政府內部秘密的刊物上。統計上顯示，轉向者所自述的轉向動機可區分為以下幾類：出于信仰的占2.21%，發現理論矛盾的占11.68%，因為被拘禁而后悔的占14.41%，因家庭因素的占26.92%，因國民自覺的占31.90%。[[16]](#_16_1)

這就是20世紀30年代以后，“轉向”一詞被納入日本日常用語，并廣泛使用的整個歷史經緯。主要的意義在于，在國家權力之下造成思想的轉變是可能發生的。這個現象有兩個層面：其一是國家強制力的運用；其二是個人或團體在面對壓力時，他或他們自己所選擇的反應。對這種現象來說，強制力的作用和自發性，是兩個不可或缺的層面。依據這種具有引導性的記述的定義，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不囿于價值的判斷，詳述日本在1931年至1945年間，所發生的轉向現象。[[17]](#_17_1)

此一“轉向”的概念，有必要從一系列的同類詞中加以區別。首先，我認為“轉向”一詞，大致意為在國家的強制下所產生的思想變化。這時所展現的強制力，就是國家的強制力。另有所謂的“悔悟”，這是指源于個人選擇與決斷所產生的思想變化。再來有所謂“意識形態的變化”，這名稱是在研究與“轉向”為同一現象時，將關心的主軸置于研究意識形態變化方式為主的術語。還有所謂的“脫離”，這術語將同一事件視為相同的現象，但主要用于研究個人與黨派的關系中。

研究“轉向”時，那些從穩健的自由主義轉為狂熱的法西斯主義者，有時候很難引起注意。從我的觀點看來，這種變化在日本戰時思想史的研究上，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應該視為“轉向”加以研究。今天我所提到的都是與共產黨有關的人士，因為討論那些人的經歷，脈絡比較清晰而容易了解。有關來自其他思想的轉向事例，以后再進行討論。

至于“背叛”——這個詞帶有明顯的貶損意味。有人向警察密告自己以前的同志時，就用這個字眼，這種場合或許可以稱作背叛。然而，如果我們將1931年至1945年日本所發生的轉向現象，一律都以“背叛”的惡名統稱的話，我們就會喪失從謬誤中發掘真理的機會。我認為研究“轉向”的價值在于，錯誤中包含的真實部分，比真實中包含的真實對我們更為重要；當然，前提是真實中真的存有真實的話。如果我們能對錯誤中包含的真實，更用心地加以深入定義，我們就能具備通過錯誤探尋真理的方向感，如此便更能掌握真實的真正核心。

我不斷地問自己下面的問題：在漫長的人生中，有人能不經歷“轉向”的嗎？導引這些人“轉向”的條件是什么？他們如何將他們的“轉向”正當化？經歷過戰爭后，回顧“轉向”的時候，他們是怎么思考的？

在我看來，這些問題在我們研究1931年至1945年間的日本時，是極為重要的。

[[1]](#_1_2) “華族”為日本于1869年授予以往的公爵、諸侯的族稱。依1884年的《華族令》規定，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爵，對國家有貢獻者也予以列入，成為有特權的社會身份。此令于1947年廢除。

[[2]](#_2_2) 兩人都是19世紀英國小說家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作品《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Jekyll and Mr.Hyde）中的主角。

[[3]](#_3_2) 本書正文與注釋中出現的書目，其原文和出版信息皆條列于書末的參考書目中，正文與注釋中不再注記。——編注

[[4]](#_4_2) 日本以米價暴漲為導火線而發生的民眾暴動。1918年始于富山縣的魚津而漫及全國，民眾襲擊投機米商，政府出動軍隊予以鎮壓。

[[5]](#_5_2) 吉野作造曾發表論文肯定民眾運動和擁護言論自由。1918年《大阪朝日新報》針對出兵西伯利亞和“米騷動”，多次批評政府。8月26日的晚報頭條中使用了“白虹貫日”一語，被政府視為鼓動內亂，因此對報社多人進行起訴、免職等處分（白虹事件）。右翼團體浪人會暴力襲擊《大阪朝日新報》的社長，吉野對此發出批評，浪人會因而要求吉野于11月23日舉行公開演說。——編注

[[6]](#_6_2) 日本稱“九一八事變”為“滿洲事變”。——編注

[[7]](#_7_2)有關戰后日本人對于華族制度一致的輿論，筆者得自于葦津珍彥（見葦津氏，《尊王攘夷是？》，收入鶴見俊輔編《傳承戰后史2》，1969）。葦津珍彥的《時光的流逝》（1981），收錄葦津氏自戰敗以來在《神社新報》續寫的時論。其中一篇談及華族制度，他總結戰后七年間的輿論這樣寫道：“作為明治憲法的支柱，而在社會條件中被消解的著名事例之一，就是華族制度。明治憲法的議會制度是建立在貴、眾兩院的制度上；沒有華族制度的前提，貴族院就無法成立。然而，在戰后得知所謂‘斜陽族’〔譯者按：語出太宰治的小說《斜陽》，指沒落的上流階層〕真相的國民們，終究不會同意華族制的復辟。其他種種社會條件的變化也難使它復活。縱使修訂憲法時堅決強調明治憲法優點的人，現在也不再主張應恢復原來的條文，頂多只想恢復其優點，以制定出新構想的制度。”（《講和生效后的困難問題，憲法全面改定論的預期》，1952年4月7日號）。

[[8]](#_8)羅納德·多爾（1925-2018），《學歷社會——新文明病》（原著：1976；日譯本：1978）。有關明治以前的論述，有多爾的前著《江戶時代的教育》（原著：1965；日譯本：1970）。

[[9]](#_9)關于東大新人會，是出自1969年1月19日，約90人的舊東大新人會成員，集合參加紀念新人會創立五十周年聚會時的發言記錄（石堂清倫、豎山利忠編，《東京帝大新人會的記錄》，1976）。另有美籍歷史學家亨利·德威特·史密斯（Henry Dewitt Smith）發表的《資料的叢林——追蹤新人會》（《勞動資料》1968年1月號），文中論及“思想的科學研究會”編《共同研究·轉向》所收錄筆者的論文《后期新人會員》，他的調查指出，我在文中列出的55人中，至少有14人不是新人會的成員，兩人身份不詳。史氏根據這調查寫成《亨利·德威特·史密斯二世：日本第一位激進分子》一書，于1972年出版。后出版日譯本：《新人會的研究——日本學生運動的源流》（1978）。

[[10]](#_10)對于佐野學和鍋山貞親等的共同聲明已“把自己的轉向視同為黨的轉向，在領導上顯露出這種病態”，藤田省三作如下表示：“他們開始活動時，身兼1927年綱領的支持者，以及負責實行該綱領的領導者的身份；但他們在轉向之后，還試圖要領導黨政，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們個人的轉向是他們自己的自由，可是轉向的方式及形態應該受他們所處的公共立場所制約。他們應該在轉向的同時辭去他們領導人的地位。至少必須在事后提出退黨聲明，然后才能提出天皇制社會主義運動的綱領。”（藤田省三，《以昭和十五年為中心的轉向情況》，《共同研究·轉向》中卷，1960）

[[11]](#_11)內務省警保局編，《昭和九年關于社會運動的狀況》，1935。

[[12]](#_12)池田克，《左翼犯罪的備忘錄》，收入中央公論社編，《防范科學全集》第6卷《思想犯篇》（1936）。

[[13]](#_13)“轉向”一詞的誕生，出自藤田省三，《以昭和八年為中心的轉向情況》，收入《共同研究·轉向》上卷（1959）。

[[14]](#_14)池田克、毛利基合著，《思想犯篇》，《防范科學全集》第6卷（1936）。池田克（1893-1977）于東大法學院畢業后，1917年歷任候補司法官、司法省刑事局長，在1946年7月被〔盟軍〕解除最高法院檢察次長職之前，為思想檢察官系統中的核心官僚，十分活躍。戰后開業擔任執業律師。1954年11月被任命為最高法院法官，至1963年退職（《現代人物事典》，1977）。

[[15]](#_15)轉向的主因是因為大眾的孤立。吉本隆明的轉向論中有精辟的分析，見吉本隆明的《轉向論》（1959）。

[[16]](#_16)司法省保護局，《關于思想犯保護對象的諸調查》，《司法保護資料》33，1943年3月。

[[17]](#_17)本多秋五，《書評——“思想的科學研究會”編〈共同研究·轉向〉上》，《思想》1959年7月號。該書評指出，“思想的科學研究會”的轉向研究因為擺脫以往對轉向負面評價的判斷，因而獲得了新的視野；同時也指出正因為這種觀照方式而失去觀察力。辻信一的《轉向論的新地平線》，含有對身體的自我意識（亞洲人第二代、第三代的）觀點。同樣從身體論來討論轉向，指出“思想的科學研究會”共同研究的缺失的有松本健一的《轉向論的基礎是什么——關于鶴見理論與吉本理論》（《現代之眼》1981年3月號）。這篇文章把轉向論置于市川浩、津村喬、菅孝行等提出的脈絡中。該期《現代之眼》刊有菅孝行、松本健一、岡庭昇、中島誠、飯田桃、笠井潔、高橋敏夫等人參加的研討會討論記錄《現代轉向論是可能的嗎？》。

# 三 鎖國

1979年9月27日

兩三天前，我在書店購買了加拿大的地圖。這和我平常看慣的日本地圖非常不同，因此頗為訝異。這張加拿大地圖是由一家名曰國際地理（Geographic International）的公司所出版，大概是加拿大到處都買得到的普通地圖，所以對你們加拿大人一點也不稀奇吧。

我對這張地圖感到訝異的是，地圖的主要部分——占最大篇幅印出的部分，并沒有展現加拿大的整個版圖，連東北地區加拿大領土在何處結束也沒有標示出來。對這種可以放在口袋里帶著走的地圖來說，或許加拿大真的太大了。如果有個加拿大人也和日本人的想法一樣，他在出版加拿大的地圖時，我想他會依照比例尺的比例制作出容納整個加拿大的地圖。

這張加拿大地圖的另一個特色是，在下方，也就是南方部分清楚地標示出邊界。這種邊界線的概念是日本人所沒有的，因為日本人從未有越過邊界的體驗。

日本人始終抱有一種感覺，認為自己一直住在并且也能繼續住在自己金甌無缺的土地上。在這塊固若金湯的土地上，日本人往往覺得若要走出國境之外就必須抱定決心，只要身處日本便不用害怕會突然遭到外國人的攻擊。這是日本人的一般體驗且心照不宣的前提之一，只是很少在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思考方式中顯現出來。我們可以把日本人思考方式的此一層面稱為“鎖國性”。

除了從先天上視為國土的土地，獲得安心感的保證之外；從文化上來說，日本人始終認為，日本被遠遠隔離在世界較先進和較普遍的文化之外。這種意識形成一種自卑感，深植在日本人內心的潛意識中。這也是能激起日本人好奇心與學習力的原因，使日本人擁有一股吸收外界新知的沖動。

日本處于較日本文化普及的中國文化之邊陲地帶，中國文化是經由朝鮮流傳到日本。另一種源于印度的跨國文化，則是經由中國流傳到日本。最后，1543年，葡萄牙海難船員把火繩槍帶到日本的種子島，源于歐洲的另一種普遍性的文化始傳進日本。

這種情況也反映在街頭賣藝的世界里。平安時代以來，我們有太夫、才藏這種一搭一唱表演歌舞和對白的傳統。每年年初，這樣的一組藝人便造訪宮廷，預言新的一年會帶來各種好運。接著他們就去拜訪老顧主，表演同樣的技藝。隨著時代的推移，這種表演變得帶有滑稽的性質，持續至今。日俄戰爭后，大眾社會已在日本產生，新的大眾文化也應運而生，太夫、才藏這種“萬歲師”[[1]](#_1_5)的組合便躍上舞臺，經由唱片、廣播、電視等媒體成為現今最受歡迎的娛樂節目之一。我們可以把這種民藝視為各自擁有不同之復合人格的“太夫”和“才藏”間，長達一千多年來的漫長對話。

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有文字記載以前。根據折口信夫開拓的民俗學式的日本文學的研究指出：日本娛樂表演的最初形態，始于招待貴賓舉行酒宴時的余興。[[2]](#_2_5)在這種宴會上表演的即興技藝，是以遠方來的貴客和沒有受過文化洗禮、不諳儀節的土地神相會為本，不斷推衍而成。其中有沖突、對立，最后以遠來做客的神明勝過土地神而告終。這種情節與當時中央政府和地方豪族間的關系相呼應。倘若再配合中央政府派任的地方知事，擅于中國式的文章或擁有中國的古典教養，我們就可以在這種對話中，看見中央文化與當地本土文化的交會。在日本，形式完整的文化難以避免的是外來文化；非固定形式的日常文化則為本土文化。在兩者交會的場面中，能言善道者是外來文化的代表；沉默寡言者是本土文化的代表一。還有種表現，即說話流暢的是身著宮廷式服裝、儀態端正的人物；沉默卻偶爾出聲應和的則是穿著本土服裝的人。不久一，個戴著愁眉苦臉的面具的男人出場了，那原本是扮演土地神角色的人所戴的。愁眉苦臉的面具很快就換上火男面具。[[3]](#_3_5)說到火男面具或許大家一時難以理解，我曾經在英國的旅游書中，看到一個英國男子在最會變臉的比賽中勝出的照片。他先把所有的假牙取下來，然后讓自己的臉有如橡皮般柔軟，再做出愁眉苦臉的表情。這張照片讓人想起日本宗教儀式中跳舞的人戴的火男面具。

以邏輯的一貫性試圖說服他者的人，大都是根據外來文化的脈絡進行；向對方訴諸心性氣氛的人則依本土文化的脈絡進行，以達到說服的目的。粗略地說，這種二分法已經在日本的精神史與文化史中存在一千多年了。

跳過一千年，回到我們現在的主題——戰爭時期日本的思想史吧。伊藤整是優秀的知性主義派作家，在20世紀30年代，受到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等西歐心理主義文學影響，以身兼詩人、小說家和評論家而聞名。他跟被捕后遭拷問致死的無產階級文學代表性小說家——小林多喜二念同一所學校。個性謹慎的伊藤整始終小心地避免與左翼政治扯上關系。他受到喬伊斯及馬歇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影響，運用意識流的形式寫下具有新心理主義技巧的小說，這個寫作實驗在中日戰爭期間持續進行著。但是日本和美國爆發戰爭時，他在1941年12月，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我的知識階級——為了不讓這感動消退》的雜文，翌年又在同一家報紙發表題為《戰爭的文學》的評論。[[4]](#_4_5)

《我的知識階級——為了不讓這感動消退》一文，描述他擔任英語教師時期，在日本模仿英國人和美國人而耗費了半生，為內心郁積的自卑感找尋出口，至今才得以驅逐這種自卑感云云。在《戰爭的文學》一文中，他主張不存在所謂的個人，只有美國人或日本人，文學應該描寫所謂的日本人或美國人，也就是描寫這兩國的國民。戰爭結束后，伊藤慢慢從戰后的挫敗感中恢復自我，也自覺到在戰爭期間自己文學作品所展現出的愚蠢面向，1958年寫出的《泛濫》為其巔峰大作。《泛濫》反映出主角隨著社會地位的上升，而改變想法的存在狀態，宛若是一種對照戰后時代的“轉向小說”。

戰爭結束后，伊藤將D.H.勞倫斯（D.H.Lawrence）的小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翻譯成日文，卻因為翻譯這本書而招致被判猥褻罪。雖然最后被判決有罪，但在審判的斗爭中，他成功地編織出一種表演理論——亦即人們可以借由能被當代人接受的形式，來批判現存的秩序。他用向往無秩序的生命，和欲使整個社會成員置于政黨中央委員會命令下的組織，這兩者對照性的圖式來分析文學的生態。他心懷這樣的想法，努力撰寫明治以后的《日本文壇史》，但未能完成這部巨著就去世了。[[5]](#_5_5)

通過伊藤整的一生與著作，我們既可以見到自由主義轉向的事例之一，也可以在戰后時代從轉向回復的過程中，看到自古以來的街頭技藝的復蘇。

有關日本人時而明顯、時而隱蔽，并在心中持續發酵一千多年的文化自卑感，在此暫時打住。如果我們的目光更明確地移向政治的領域，就會遇到源于國家的孤立——鎖國性的問題。

在日本漫長的歷史中，也曾遭受過外國勢力的侵略。那就是發生在1274年和1281年的蒙古侵略。在長達一千年的期間內，日本遭受到外國侵略只有兩次：一是蒙古攻登九州之役，另一次是1945年聯軍的登陸沖繩之戰。也就是說，一千年來只發生過這兩個戰例。對波蘭民族和德意志民族的歷史而言，在民眾記憶深處或潛意識中，至今仍殘存著害怕外國人越境侵略的恐懼；與此相比，日本人除了在十五年戰爭后期之外，被外國人侵略的恐懼并沒有那么強烈。

四周環海和四周被畫上國界線的陸地情形完全不同。四面環海，意味著即使自己不努力促成民族的統一，也可以得到大自然的賜予。住在四周環海的島民，使用相同的語言，借由同類形態的符號體系結合在一起，使生活在這島上的住民們有一種全是遠親的感覺。鎖國政策雖然實施于1639年，卻也為少數荷蘭人、中國人和朝鮮人留下往來的通路。但是，鎖國令更強化了此后二百年間，日本人早已存在的自我封閉性。1854年形成的開國并未去除這種自我封閉的特質，這種特質也成為至今日本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而留傳下來。這種現象經常出現在著名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者小泉信三的戰時日記中。《海軍主計上尉小泉信吉》（1966）這本日記，是他在其子小泉信吉戰死后，為了紀念兒子的生涯于戰后出版的。他自己經常引用這本日記。太平洋戰爭方興未艾之際，小泉信三寫下這場戰爭所帶來的災厄。在書中，他用戰歿者的軍階身份——海軍上將山本五十六，以及許多海軍軍官和士兵等，加以區別敘述。由此看來，即使在私人日記中，小泉信三的想象力也沒有超越日本人的局限。這種現象若跟小泉信三年輕時留學英、美，以身為具有國際視野的經濟學者而聞名的事實綜合觀之，就更值得注意了。日本戰敗后，他成了皇太子[[6]](#_6_5)教育上的輔佐者，提議皇太子與平民的企業家之女聯姻，借此把皇室包裝得符合戰后的民主時代。這場婚禮借由電視的轉播讓更多人民得以參與，拉近皇室與日本一般市民的家庭生活氣氛。由于導演這場傳媒廣為報道的婚禮，小泉信三帶給日本人極大的影響，其影響力甚至超越戰后所有的意見領袖。他將日本的皇室連接到歐美的舞臺。然而一，旦被投入戰爭的危機中，就連在戰前和戰后都能具有國際視野的日本人，也失去了超然獨立的形象。[[7]](#_7_5)

在加藤周一與賴克（Michael R.Reich）和利夫頓（Robert Jay Lifton）合著的《日本人的死生觀》（1977）中，以眾所周知的“四十七士”[[8]](#_8_3)歷史事件為例，解析日本文化的特質。這個發生在1702年，47名浪士為主公報仇雪恨而殺死貴族的故事，在此后三百年間無數次被搬上舞臺，或在說書場演述，或寫成小說，時至今日還被拍成電影。根據加藤的“診斷”，這個武士集團的領導者充滿卓越的知性，也為實現最初擬訂的舊主復仇計劃獻上他所有的想象力。該集團的目標在行動伊始就已固定，集團本身的知性僅用于如何保持集團的團結，以及如何朝著最初設定的目標進行，根本不曾用來修正最初的目標。[[9]](#_9_3)

“四十七士”的故事能持續三百年仍然受到歡迎，是因為它合乎日本人所向往的理想。和“四十七士”一樣，明治以后的日本人也配合政府揭橥的理想，為攀登文明階梯做出努力。

換句話說，盡管日本人置身在其經歷的最后一場戰爭中，他們也不會去批判戰爭的目的，只知道盡最大努力朝著目標前進。縱使這場戰爭失敗之后，他們仍會重新制定目標，再次朝著政府掛在自己面前的“繁榮經濟的目標”繼續努力。日本人的知性即使陷入戰爭的泥沼中，也不會用來修正既定的目標。

這出重述“四十七士”行為的戲劇名曰《忠臣藏》。加藤周一所稱的“忠臣藏癥候群”，就是源于鎖國性這種普遍的日本文化特征。

鎖國性這種日本文化的特征，也對轉向過程帶來影響，甚至可以說轉向過程本身大都是來自于鎖國性這種文化特征。站在國家立場執行誘導轉向任務的名古屋地方法院檢察官長部謹吾，在1937年發表一篇長達四百五十頁的報告書。他在這部著作中總結地說，自己在執行“轉向”任務之前，是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者，現在卻經由誘導獄中的左翼激進主義者轉向，使身為檢察官的他得以確立真正日本人的立場。他又說，自己過去的思想尺度在此都必須更改。這位檢察官雖然強制使因批判國家而被逮捕入獄的人“轉向”，但他自己也在這個過程中完成“轉向”。這種現象部分原因出于，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左翼運動的領導者多半為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學生或畢業生，亦即與檢察官有相同的成長背景——起訴者和被起訴的人吃的是同一鍋飯！他們有學生時代的共同語言，可通過共同的語言交換思想。[[10]](#_10_3)

嚴刑拷問的行徑確實存在，也有人因此致死。然而，與同時代的鄰國中國相比，日本對于公開宣示轉向者所施以的刑罰并不算嚴厲。包括檢察官在內，所有官僚均在陸軍的壓力下，在憲法上逐步地完成轉向。也就是由美濃部達吉依據自由主義倡議的“天皇機關說”[[11]](#_11_3)，轉為美濃部以前的法學者所主張的“天皇主權說”。

或許，誘導“轉向”可以視為日本統治階層，運用狡猾智慧的例證之一。若只是這個現象，則可以視為統治階層溫情的表征；同時，我們也可以站在明治時代前，日本傳統的延長線上來解釋。

守田志郎在《日本的村莊》（1978）一書中，分析日本中部的村落生活時，注意到一個現象：即每個村民為了擴張耕地，有時會欺騙附近的住民，但卻不會將對手逐出村莊。[[12]](#_12_3)在村落中，即使有人抱持怪異的思想，多數的村民也會遏制自己不傷害他的身體。村落生活的這種現象，不僅顯示出多數派的溫和，也顯示出少數派努力重修舊好的可能性。從這村落的傳統中可以看到，即使在戰爭期間仍有提出異議的方法。雖然在整個戰爭期間幾乎沒有出現叛亂或反抗的事例，但在生活的所有層面上卻可發現抗議的事例。

日本文化包含的鎖國性，是東大新人會試圖以海外引進的言論思想，來改造日本當時所面臨的強勁對手。

1935年中野重治發表小說《村中的家》，對自身反省“轉向”具有什么意義，有極為生動的描述。小說的主角在獄中簽署轉向聲明被釋放后，回到位于日本沿海農村的父親家中。父親是個農民，不像兒子是大學畢業生，他面帶苦澀地接納自己的兒子。父親說：“聽到你被捕的消息，我還以為你已經死了。不過，你還是活著回來了。既然你無法為自己任性選擇的信念而死，就應該不要再寫了。”主角這樣回答父親：“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我還是要繼續寫下去。”雖然遭到拷問和監禁，主角仍沒有因為屈服而出賣所屬的組織和同志友人。雖然他對檢察官發誓今后不再從事政治活動，但并沒有撤回自己的思想立場。他能做的僅只是這樣而已。

對主角的父親來說，這樣做還不夠。父親認為，自己的兒子身為一名領導者，卻讓眾多追隨者遭到挫折，照理說應該繼續堅守原本的行動方針或者死去，才能報答那些曾響應兒子號召、不斷忍受苦惱的眾多年輕人。這與兒子政治上信奉的馬克思主義完全無關而是從一，個身為農民的父親立場來看的，是一個正直人應有的態度。這種正直感是維系鄉村生活的動力，可是只靠這種正直感有時還是不夠的。因為僅憑父親的正直感，終究是無法推敲思量出兒子慎重的政治計算，做兒子的試圖對日益高漲的軍國主義退一步筑起一道抵抗線。

中野重治持續寫作不輟，因為作品被視為是擾亂治安，而再度被捕。在太平洋戰爭時期，他遭到報紙雜志的全面封殺，只能上班維生。但是他在戰爭時期僅能少數發表的作品，已經跟日本一般市民抗議極端軍國主義的掙扎苦悶結合起來。戰爭結束時，中野重治再次加入日本共產黨，這是以拒絕轉向而留在獄中的少數人為中心，重新建立的共產黨。然而，面對繼承戰時政府的敗戰后政府，此時中野重治實質上并沒有拋棄戰爭時期，立足于保守本土傳統中不斷抗議的態度。敗戰后的1947年，他發表了短篇小說集《五勺酒》，這篇小說給了擔任中學校長的鄉下老人，其舊式情感的宣泄口。這名老人把現在的天皇（昭和天皇）視為一個有血肉之軀的人，終其一生對他抱持好感。這名老人，從這天生的好感中，希望天皇能從政治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作為一個平凡的人生活下去。

其后，中野重治還寫了一部描述東大新人會的長篇小說，題為《五臟六腑》（1954），是指日本和歌（古代詩歌）傳統中的“枕詞”[[13]](#_13_3)，它可以引發內心的各種思緒。小說這樣寫道：主角跟作者一樣是東大新人會的成員，也同樣是去拜訪一名東大的新人會成員，這名東大學生是子爵的兒子。主角在這宅邸中，看見一名老女傭因為端出微溫的茶水而遭到朋友叱責的情景。主角看到友人冷漠的叱責方式，不但覺得格格不入，還產生一種不同于內心的感情和思想。這是支撐同一政治思想的另一情感伏流。于是主角又想起參加某著名青年教授演講會時的情形，這名青年教授與現實存在的福本和夫極為相似。福本倡導的理論是，為了凈化左翼領導者的思想，激進派知識分子在人民與真理結合之前，應該從人民中分離出來。演講者的風采似乎很吸引主角。聽眾里的大學生用德文向講臺上發問時，青年教授也引用德文術語回答提問。回想當時的情景，雷和閃電的記憶突然浮現在主角的腦海中。孩提時期，主角和農村的其他小孩一樣，相信閃電會帶來稻谷的豐收。他真想對著自己的大學同志——新人會的成員，大聲喊道：“這就是我的哲學，我相信泛神論（用今日的講法，相當于萬物有靈論）！”

中野重治本身或許不好意思在新人會這樣叫喊，但是作者在回顧以東大新人會成員度過青春時光時，有意敞開當時所處的心境，借此照亮同為新人會成員的思想，即他藏在心中的無意識的潛流。外國傳入的用語沒有撼動人心的力量，要取得撼動人心的力量，必須移至該社會古老的傳統中培育，使其脫胎重生。青年時代的中野重治似乎已經出現這種焦慮，盡管這種焦慮，要到20世紀30年代開始才能完全表現出來。可以說，中野重治借由《五臟六腑》這部小說，才把他在1935年戰爭期間轉向和釋放后所發表的《村中的家》中找到的新方向更往前推進。[[14]](#_14_3)

這里又存在一個問題。鎖國性這種日本文化的特性，是在日本仍屬農業國，尚未像現在負擔這么多人口的時代里所培育而存續下來的。但是現在戰爭結束，尤其進入60年代的高度經濟成長后，二十多歲的青年從事農業的比例，在1965年降到7%，多數的勞動人口轉移到工業和服務業的領域。不過，成為日本文化特性的鎖國性，絕不可能在短期間內消失。鎖國性時時刻刻都要面臨各種狀況所帶來的新難題。只要鎖國性代表日本文化的主要傾向，日本就無法有效地解決日本現今所存在的問題。東大新人會的成員已經自覺到這種新處境的艱困，但不能說他們已具有充分解決問題的方法的洞察力。他們不僅對日本的未來欠缺洞察力，也欠缺對自身未來的洞察力！

[[1]](#_1_4) “萬歲”為日本一種類似中國對口相聲的表演，其中兩人一組的表演組合稱為“萬歲師”。

[[2]](#_2_4) 火男面具（ひょっとこの面）為形似中年男性，眼睛一大一小，嘴尖的丑怪面具。

[[3]](#_3_4) 指明仁。明仁于1952年被立為皇太子。

[[4]](#_4_4) 此事件被稱為“赤穗事件”，47名浪士又被稱為“赤穗浪士”。

[[5]](#_5_4) 美濃部達吉主張國家主權不在天皇，而是在國家本身，天皇只不過是國家的最高機關。此一學說引起議會爭議，美濃部的著作被禁，還被迫辭去貴族院議員的職務。

[[6]](#_6_4) 一種日語修辭法，多用于和歌等韻文。與主題無關，冠于某詞之前起導入作用的固定表達。

[[7]](#_7_4)折口信夫，《日本文學啟蒙》（1950）；《折口信夫全集》第12卷（1976）。池田彌三郎，《日本藝能傳承論》（1962）一書，對折口信夫所提的假設進行廣泛的資料查考，內容更加確定。不僅是日本的表演藝術，古代的文學也源自宴會中的對話。現今，日本的許多地方或祭典中仍可找到其原型的痕跡，在折口信夫的著作中時常提及。

[[8]](#_8_2)伊藤整（1905-1969）聽到對美英宣戰詔書后，有如下感想：“……聽到這件事后，我倚靠在地下室白色墻壁的凹陷處，仿佛全身突然被冷水澆濕了。沒錯，在我看來，確保民族的優越感驅使著我們，而這正是必須的作為。這場戰爭并非政治的延長，或與政治‘表里相關’，而是為了由衷地相信大和民族在地球上是最優秀的民族，遲早必須一戰的戰爭。”（伊藤整，《我的知識階級——為了不讓這感動消退》，刊于《都新聞》，1941年12月14日）。我并不是為貶低伊藤整的作品才援引這篇文章。在戰前，伊藤整即因翻譯喬伊斯和勞倫斯評論集《新心理主義文學》（1932）和長篇小說《典子的生存方法》（1941），以知性主義者、自由主義者聞名；戰后更以紀實小說《裁判》（1952）、長篇小說《泛濫》（1958），獲得日本代表性知識分子的崇高地位。但是在他聽到對美英宣戰詔書時，仍不免落入鎖國性的局限中，像這樣表明與戰前、戰后截然不同的思想面向，正反映出日本知識分子的精神軌跡。這種現象既是大正時代的知識分子想象不到的，也是高度成長期的現代知識分子難以想象的。

[[9]](#_9_2)伊藤整于1952年開始動筆，最后仍未完成的《日本文壇史》，由瀨沼茂樹續寫后出版（講談社）。

[[10]](#_10_2)小泉信三，《海軍主計上尉小泉信吉》（1946、1966）。

[[11]](#_11_2)加藤周一，《日本文學史序說》，《加藤周一著作集》第5卷（1980）。通過忠臣藏電影的分析，只使用日常用語嘗試進行“日本人論”的先驅作品是佐藤忠男的《赤裸的日本人》（1958）。其后，佐藤在《忠臣藏——志氣的系譜》（1976）中，做了更正確的考證。前作只以忠臣藏為資料，赤手空拳地寫出非專家立場的社會學，其氣魄令人折服。

[[12]](#_12_2)長部謹吾，《關于對思想犯的保護》，收入《司法研究》21:10（1937年3月）。長部謹吾（1901-1991），1925年東大法學院畢業，任職日本興業銀行，1926年司法官考試候補，走上法官之路。戰后歷任最高檢察廳次長檢察官、最高法院法官。

[[13]](#_13_2)守田志郎（1924-1977）的《日本的村莊》一書（1978），起初以《小小的部落》為名，1973年由朝日新聞社出版。

[[14]](#_14_2)中野重治（1902-1979），福井縣人。就讀四高，1927年東大文學院畢業。參加創立“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ナップ）。1931年加入共產黨。1934年以退出共產主義運動為條件獲釋出獄。小說《村中的家》發表于1935年。1945年11月再次加入日本共產黨。小說《五臟六腑》發表于1954年。1964年遭共產黨除名。

# 四 關于國體

1979年10月4日

鎖國性這種文化特征，比1931年至1945年間，日本政治史上廣泛使用的“國體”概念更具根源性，所以我們可以把國體概念放在鎖國性這種文化特征的延長線上來加以理解。國體的概念在這段漫長的戰爭時期被當成強而有力的語言工具，用來防御或攻擊日本人的政治地位。

隨著1945年日本戰敗，美國對日本進行軍事占領，“國體”一詞，才被吞沒在新的政治論點中而消失無蹤。然而，無關乎語詞，其功能（亦即曾借由這語詞所表現的概念）仍以隱蔽的形式寄存在目前的日本政治中發揮作用。

“國體”一詞的起源，可見于吉田寅次郎（吉田松陰）與山縣大華的往來書簡中。[[1]](#_1_7)吉田認為，此語指涉日本民族特有的推進力量。他的論敵山縣大華則不承認日本民族中有這種特有的東西。山縣指出，世界上每個民族都有同樣的推進力量，因此“國體”概念并非日本所特有。吉田的國體概念可以視為日本民族繼承的傳統，如果這樣解釋，我們也可以把這概念當成是足以被實證檢驗的事物。但是在此之后，這概念卻未朝著此種方向發展。明治維新以后，“國體”已被用來指稱日本國現在的政體，以及現存政治秩序所特有的東西。所以，這個用語已經完成如下任務，即照亮現今日本的政治秩序，把現存秩序視為自古不變的投影。《古事記》是日本現存最古老的文字記錄，這本書記載著天皇家族的祖先從天而降的過程。根據這個故事，“國體”可解釋成：以眾神之后綿延不絕、萬世一系的天皇家系為中心，并以天皇家系為信仰核心的概念。

現在，我就從橋川文三的記述來討論國體概念的歷史。橋川指出，明治憲法公布之前，憲法的主要設計師伊藤博文與其助手金子堅太郎間曾發生爭論，仿佛重演吉田寅次郎與山縣大華間對國體概念起源的對立。伊藤主張國體并非限于日本所特有，其他國家也有各自的國體；金子則認為不應該只把國體拉回到國家的基本結構，而主張那是日本特有的東西。在戰爭期間的日本，金子的主張是日本政府所認同的正統立場，其他的觀點均無存在余地。

十五年戰爭開始之前，日本教育體系的設計分為兩種：在小學教育與士兵的教育里，采用以日本國家神話為主軸的世界觀；在作為最高學府的大學和高等教育中，則采取以歐洲為范本的教育方針。這些被期待成為日本領導者的人，都必須被訓練成在國際汪洋中，具有充分知識為日本掌舵前進的專家。明治日本的建造者即有此一區別。

依明治時代建造者的觀點而言，日本人應該讓作為一個國家宗教的密教和顯教部分的信徒[[2]](#_2_7)，分別接受不同的訓練。這是新國家的建造者對日本自鎖國狀態以來各種困難的解決方式。他們在國際政治權力的波濤中為國家掌舵的同時，便盡量在不損及明治之前家族制度與村落制度的強大結合力下，來完成這項工作。為了達此目的，他們試圖把自己新發明的“家族國家”牢牢地置于天皇家族乃由天而降、萬世一系這個神話上。然而，他們認為僅此仍不充分，還必須訓練那些可能成為未來國家領導者的青年，習得足以和同一時代西歐各國領導者抗衡的教養與技術。

在日俄戰爭以后，依舊存活的新國家的建造者，被稱為“元老”。他們雖然垂垂老矣，但其中仍有人致力于把幕末時代經歷的危機感傳承給年輕的繼承者，期望這些繼承者在充分理解國家宗教的密教部分后，能指揮顯教的部分。元老中最后一位公卿出身的是西園寺公望，去世于1940年，可是他的繼承者近衛文麿公爵卻辜負了上述的期待。[[3]](#_3_7)

包括元老在內的重臣階層，雖然沒有對議會或官僚機構負責的公眾地位，卻能夠和天皇直接對話。因此在遇到重大議題必須做出決斷而引發意見對立時，他們就發揮了一種居中折沖的屏風功能。但隨著青年軍官的登場，這些元老的功能逐漸失去效用。青年軍官利用統帥權的特權，再通過軍部機構向天皇施加壓力。1931年至1945年，可說是重臣階層無法隱身于屏風后發揮作用的時代。不過，戰爭即將結束的1945年中期，那些比較年輕的所謂準重臣階層，雖然不像明治國家的建造者那般年老，卻繼承著明治維新時代的危機感。他們在明治初期被培育出來，形成與自身的法律地位無關的不定型團體。他們通過秘密行動與交換機密來逼退軍事機構的領導者，成功地引出肯聽老人忠告的退伍老軍人。戰爭時期的最后首相——鈴木貫太郎（1867-1948），是日俄戰爭時水雷戰隊指揮官，其后擔任天皇的侍從長。1936年2月26日，鈴木遭到反對軍事獨裁的青年軍官襲擊而負傷。他于1945年4月被任命為首相，引導日本接受投降。剛開始，他聲明要致力于維護國體，借此讓民眾期望這場戰爭會戰到最后，同時也讓與他共同行動的少數近臣，期望可用徹底抗戰以外的方法來護持日本。在做出接受《波茨坦宣言》（Potsdam Declaration）的決定之后，他對報紙聲明：國體已獲得維護。從鈴木對全體國民及其同伙的活動方式中，可以看出靈活運用國家宗教的密教部分與顯教部分的精彩事例。

日本國家宗教的密教部分受到歐洲文明的強烈影響。明治維新后不久，1871年新政府將機構的領導階層一分為二，也就是把部分富有學習能力的年輕人送去歐洲與美國學習西方的制度。當時一舉派出106名高級官員到海外，對貧窮的后進國而言，絕對是花費金錢的冒險，況且當時的日本正為嚴重的經濟問題所苦。遣歐使節團是由掌握新政府的最高權力、當時四十一歲的巖倉具視所率領，同行的包括時年三十八歲的木戶孝允和同齡的大久保利通。也就是說，其中包括了被稱為“維新三杰”的多數派，而“維新三杰”中留在日本國內的僅剩西鄉隆盛一人。歐美使節團歸國后，西鄉隆盛即領導反政府的內亂，表明反對現居新政府要職的歸國者所采行的歐化政策。派遣團中還包括當時年僅三十歲的伊藤博文，他在政府采行歐化內閣制度以后，出任日本首位內閣總理大臣，也成為日本君主立憲國的主要設計師。

這些高級官員派遣團對西方諸國科技的發達與效率印象深刻，也對推行有效率的統治組織所依據的宗教及倫理信條感到羨慕。因此他們試圖修改日本的神道傳統，采納作為支撐高效率技術文明的力量。于是，“天皇崇拜”被當成可讓日本更加繁榮的技術文明殿堂之思想基礎。

換句話說，有關皇室的傳說，即依此構想在政府制造的意識形態中被改造了。我們閱讀日本最古老的書《古事記》時可以發現，天皇及其祖神們曾犯下許多錯誤，因為他們世俗的動機而相互牽制、爭戰與失敗的記載，但這些愚行卻在書中不以為恥地傳頌下來！

我們從《古事記》的傳說中看不到眾神無謬的思想，其中顯然包含一種作為多神教的神道教。然而，現今在新生日本文明的設計圖，被改寫的國家宗教中，神道已扮演極似西方諸國的基督教角色，而帶有濃厚的一神教特性。于是，永不會犯錯的天皇形象出現了。此一形象在明治時代與大正時代具有比喻的性質——這是日本國家由熟悉國家宗教密教部分的元老、重臣階層與高級官員共同推動的時代。

明治政府采用的政治思想順利地根植在日本國民的心中，善惡價值判斷的基準全依據天皇發布的敕語。所謂“敕語”，就是繼承自傳說時代以來，歷代天皇公布旨意的形式。明治維新之后，《軍人敕諭》和《教育敕語》是最重要的文獻。另外還有中日戰爭開始與結束時發布的敕語、日俄戰爭開始與結束時發布的敕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與結束時發布的敕語，以及太平洋戰爭開始與結束時發布的敕語。這一系列敕語由1946年元旦天皇發表的《人間宣言》[[4]](#_4_7)宣告結束，而最后宣言是由占領軍所起草的。

這些敕語中占有重要位置的詞匯，被日本人用來保護自身道德和政治上的地位，而熟練地使用，成為忠誠臣民對天皇效命的最佳證明。在小學六年的義務教育中，即灌輸這些詞匯的使用方法。另外，單就男子而言，也會在年滿二十歲，于軍中服兩年義務兵役期間接受這種思想灌輸。教育敕語在全年重大節慶的日子由校長宣讀出來，其間學生們被要求至少在儀式進行中低頭站著聽完敕語。這對體弱的小孩子來說，簡直就是一種刑罰。在軍隊里，新兵被要求完整背誦出冗長的《軍人敕諭》，這非常耗費腦力。許多孩童和新兵因為不能順暢地背誦出敕語，或因為無法流利寫出敕語中的漢字而遭到毆打。這些儀式把相同的條件反射灌輸給日本全體國民。除了敕語的朗讀和背誦之外，還有一種儀式，就是在小學校園的特殊儲藏室內懸掛天皇的照片表示敬意。教師和學生經過儲藏室時，被要求恭敬地行最敬禮。這是十五年戰爭結束前，天皇在宗教、道德與政治上權威的根源。

這些敕語中的關鍵詞匯，無論背誦或正確寫出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來練習。一旦掌握使用這些詞匯的訣竅，就能不假思索地隨口說出或隨筆寫下。如此一來，由于這些關鍵詞匯的使用方法具有一定的排列組合規則，依據此規則，無論組織什么樣的文章，都會變成具有相同的內涵，不需結合實際經驗加以證實。當時的中央團體及其下面的各種分會，和許多擔任名譽職的人，就是依據這種排列組合的規則發表演說。此外，下級軍官對士兵的訓話也如出一轍。

我不認為這是近代日本才有的特殊現象，在實行神權政治的地方，絕對有其類似的政治慣例。明治以后的政府，除了具有民主政治的性質之外，也包含這種神權政治的特質。至于兩者是如何組合交集的，我們必須審慎看待。從1929年的世界經濟大恐慌，以及日本為從大恐慌中尋求出路，而于1931年侵略中國所開啟的時代里，我們可以直接看到神權政治的特質。此時，日本國民經由政府的六年小學教育和只針對男性的征兵制度，八十年來幾乎都習慣地處于相同的條件反射下，所有的男性都能為同一目標行動。問題是，在日本投降后，日本人這種慣性難除的條件反射都到哪里去了？不過，這并不是我們在這里要討論的問題。

根據丸山真男的研究，日本人的政治活動乃以三種功能分類：第一是神轎，第二是官吏，第三則是無視法紀的人。[[5]](#_5_7)明治新政府成立之后，官吏獲得了很大的權力。他們經過公平的考試制度，從全國人民中被挑選出來，政治上的重要決策就由各部門擔任重要職務的官吏決定。負責各個專門領域的官吏，在中央政府中的地位雖然不高，但也占有很大的分量。現在日本中央政府的各部會，實際上已經被細分為更小的迷你部會，里面的長官，就是各課的課長。一旦官吏所做的行政處分受到人民的批判，沒有地位的人民便會通過各種壓力團體表達他們的不滿，這些壓力團體的代表就是無視法紀的人。所謂神轎代表權威，官吏代表權力，無視法紀的人則代表暴力。

當明治國家建造者所設計的秩序無法運作時，國民就通過無視法紀的人表現他們積存的不滿，迫使當權的官吏們真正落實明治國家所采用的政治思想。若如實地解釋這政治思想，其基本原則就是所有宗教、道德與政治上的價值都將源于繼承諸神以來、萬世一系地位的現任天皇。因此對西方傳入的民主思想和世界觀，以及同樣從西方引進以人本為主的解釋觀點，都必須完全否定。過去由政府高官當作譬喻假設使用的各種詞匯，現在都必須如實地加以接受，而且直接用以指涉事實和行動。

倡導此一運動的論者蓑田胸喜曾在1933年寫道[[6]](#_6_7)，日本民族在對現今擁戴的天皇（意即“現人神”[[7]](#_7_7)）的信仰中，因為具有建國神話和國家宗教，因此可用儒教、佛教、基督教以及社會主義至今都無法實現的方法，來實踐世界史托付給人類的使命。當我們奉天皇為“現人神”，忠誠守護我們的祖國時，我們也依此服務人類。

依蓑田的觀點，讓日本成為世界最強的國家，乃日本人為人類貢獻的唯一的可能之路。當時，蓑田在日本少數私立大學的慶應義塾大學擔任邏輯學和心理學教授。隨著蓑田論點的日漸得勢，使得京都大學法學院的自由主義教授們遭到去職。京都大學在日本各學校金字塔組織中占有次高的地位。由此可見，蓑田胸喜的論點具有足以改變這所大學法學院性質的力量。接著，他的攻擊目標轉向金字塔頂端的東京大學，迅即又成功地打敗了先前的憲法正統解釋——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

美濃部達吉在1935年遭到檢察署傳喚，就日本現行法下是否可以批判“敕語”而不受法律制裁，接受調查。擔任調查的戶澤檢察官，就讀東京大學時，曾跟隨美濃部達吉學習法律。他是因為學習天皇機關說的憲法而通過司法官考試的人，因此非常了解其師的學說。調查結束后一天，美濃部達吉探討憲法的三本著作迅即遭到查禁，也就是依法不得公開販售。美濃部達吉并沒有撤回他的理論，但于同一年辭去貴族院的職位。

被當作神轎抬著不放的天皇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當時，擔任天皇侍從武官長的本莊繁陸軍上將（1876-1945）在日記中，曾記下他與天皇的對話。[[8]](#_8_5)本莊試圖把當時陸軍的想法傳達給天皇，天皇對此說出這樣的感想：“如果我們用思想或信念壓抑科學，世界的進步就會停頓下來。如此一來，連進化論之類的思想也被推翻了——然而，這并不是說不需要思想和信念。總之，我認為思想與科學應該同時并進。”

這是天皇1935年時的想法。然而，無視法紀的人要求政府如實解釋建國神話而展開運動時，多數掌權的官吏都不敢本于職責而賭上自己的地位予以否定。天皇雖然在本莊陸軍上將的日記里留下他的私人對話，但他并沒有公開指陳政府新訂政策的不妥。相反地，天皇隨著對中國戰爭的展開而改變想法。這可以從他沒有支持撤出“大陸派遣軍”，以結束對中國戰爭動向的政治動作看出來。[[9]](#_9_5)

明治初期以來，日本的官僚機構極力把有能力的年輕人安排在重要的職位上，軍隊的組織也不例外。在1931年以后的年代里，至少在形式上還保留這種架構。在陸軍和海軍雙方參謀本部的成員中都有能力卓越的青年士官，他們的任務是就日本與假想敵國雙方的資源提供最新情報。我曾得到當時最年輕的參謀軍官——陸軍的林三郎與海軍的高橋甫親口證實，當我問及日本對英、美開戰是否有勝算時，他們當時都提不出肯定的答案。[[10]](#_10_5)盡管從參謀部官員僅得到這種消極的預測，太平洋戰爭還是爆發了。其宣稱的理由是石油存量不久即將告罄，倘若再延緩開戰的時間，對日本將更形不利。而隱藏在這判斷背后的理由是，已經持續十年為總體戰所做的努力，不能因為政府機構受到打擊而停頓下來。

至少自1931年以來，領導者對日本與假想敵國在軍力和經濟力上的差距，一直提供給國民相反的資訊，導致自己也因此陷入自我欺騙的境地。對國家的領導者而言，要從對國民的持續欺騙中，保持自我的清醒，是非常困難的。讓當時日本的領導者踏上太平洋戰爭之路的決策背后，就隱藏著這種困難。回到前述的譬喻來說，由于日本國家宗教的顯教部分在漫長的歲月里吞沒了密教部分，使得日本國家原始建造者們的構想因而瓦解了。

隨著事件的發展，國家主義運動者相繼暗殺掉自由主義政治家和財經界人士，也造成無視法紀的人與青年士官結合，試圖展開軍事政變失敗的結果。不久，派至中國的參謀軍官發動“九一八事變”，中央政府卻對派遣軍發動的意外行動表示支持。此行動也導致“滿洲國”的成立，遂發展成與中國長期交戰的局面。缺乏結束這場戰局的能力，是日本后來陷入太平洋戰爭泥沼的原因。簡單地說，日本在中日戰爭中被打敗了。不過，至今仍有許多日本人在日本戰敗后不愿意承認這個事實。

在對抗英、美的壓力下，為了致力于不受矚目也沒有宣戰卻持續與中國進行的困難戰斗，政府發布非常時期宣言，借由各種法律來統一國民的思想。政府決定在使用“國體”一詞上有更新的解釋和更明確的意義，以作為統一國民思想的工具，并二度進行“國體明征”[[11]](#_11_5)的宣示。由此看來，高級官僚已經敗給那些與青年軍官結合展開活動的無視法紀的右翼分子。“大政翼贊會”成立，目的在于尋求各種職業的日本人協助，借此貫徹政府的既定政策：堅持打完這場未公開宣戰的戰爭。此方向意味著與美國、英國、荷蘭三國的沖突。不久，日本政府向美、英、荷宣戰。這段期間，議會制度仍被保留，但政黨皆自動解散，并加入現政府支持的單一政黨。1942年舉行所謂“翼贊選舉”的大選，這不是自由選舉，警察和右翼暴力干涉了選舉。當時受大政翼贊會提名當選的眾議院議員有381人，非大政翼贊會提名當選的議員只有85人。此一選舉顯示，即使到這時期，仍存在著抗議政府指導戰爭與鉗制言論的反對聲音。

《漫畫》雜志于1942年5月號刊出一則漫畫，作者是杉浦幸雄，題為《徹底革除英美思想》。在這則漫畫發表的當時，凡是頭發燙成卷曲狀者都被視為“非國民”[[12]](#_12_5)和違反國體。國家主義者甚至發起所謂的“反燙發運動”。此一事件的背景是，漫畫里一名年輕女性正用力搔著頭皮，西方傳來的思想便像頭皮屑般從她頭上掉了下來。1931年政府展開的轉向誘導至此已到達終點。所有外國傳來的思想像頭皮屑般從日本人的頭上掉下后，最后還會留下什么呢？就這則漫畫發表的當時而言，留下來的只有日本政府所灌輸的思想吧？那就是以“現人神”——天皇的無謬性為中心所建構出的國體觀念。然而，隨著日本的戰敗，同一個天皇親自宣稱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之后，國體觀念也像一小片頭皮屑般從頭上掉下來，之后就只剩下肉體而已。這就是戰敗后流行至今，經過形態變化而留存下來的所謂“肉體主義”的思想由來。坂口安吾、田村泰次郎和田中英光等“無賴派”[[13]](#_13_5)所代表的戰后文藝主張，忠于肉體的需求就是最崇高的價值！有關田中英光，容后再行討論。1960年起所發生的“經濟動物”傾向，可說是從戰爭期間播下的種子中萌芽、茁壯、成熟的思想。不過，長年根植日本人肉體中的條件反射依然存在。這是把過去的文化儲存在心底的潛在記憶。從這意義來說，國體概念的形態仍存在著。雖然言語已經消失，但言語所指涉的東西依舊存在。在此，我們再回到因為戰敗后的條件發生些許變化，卻依舊殘存的鎖國性形態。與大多數日本人是農民的德川時代相比，現在農民只占全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想必鎖國性會難以獲得日本人的支持。然而，日本四面環海，完全沒有陸上的國界，又使用相同的語言，只要狹窄的島嶼中繼續住著稠密的人口，鎖國性就沒那么容易消除。因此，今后我們還必須不斷提問：國體觀念會以何種形式保留下來？

[[1]](#_1_6) “密教”是指在前述的高等教育中，“將天皇的權威與權力視為由憲法及其他所限定的限制君主”的解釋體系；“顯教”則是指在小學教育和士兵的教育里，“將天皇視為具有無限的權威與權力的絕對君主”之解釋體系。參見久野收、鶴見俊輔，《現代日本的思想》，頁132。——編注

[[2]](#_2_6) 在這個宣言中，天皇宣布自己是人，不是下凡的神，即否定天皇擁有的神權。

[[3]](#_3_6) 借人的形象出現在現世的神，日本人對天皇的尊稱。

[[4]](#_4_6) 明確以天皇為中心的國體概念，為戰前喧囂一時的右傾思想。

[[5]](#_5_6) 意指“賣國賊、叛徒”。

[[6]](#_6_6) “無賴派”為“二戰”后出現的文學流派，主要成員有石川淳、織田作之助、坂口安吾、太宰治等作家。作品采用反傳統的自嘲式的手法，對社會罪惡和人生予以揶揄、抨擊、渲染幻滅情緒，試圖在沉淪中發現美。

[[7]](#_7_6)引自橋川文三的《國體論的聯想》一文（《展望》1975年9月號）。吉田松陰〔即吉田寅次郎〕與山縣大華的論戰如下：“……道為天下公共之道，同也；國體為一國之體，獨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天下同也；皇朝君臣之義，如卓越于萬國者，一國之獨也。”吉田松陰這樣闡述自己的國體論，當時代表長州藩的儒者山縣大華，則歸咎“國體”的用語只具水戶學的怪異性質，又說：“道為天地間之一理，其乃天理所生，我與人無差，我國與他國亦無別。”“天地以陰陽五行之氣生成人物，而后以陰陽五行之理蘊藏其中。此理即為人倫五常之道。此為天地之間，大凡人物者皆同之處，豈唯和漢有之？乃世界萬國皆同也。”他自始反對一國獨自之道（國體）的想法，并以“我國君臣之義卓越于萬國者，所在何處”加以反駁。橋川指出，幕末時期吉田松陰與山縣大華的國體論戰，似乎也延續到明治十七年（1884）左右伊藤博文與金子堅太郎的論戰。這時候，代表普遍主義的伊藤博文類似山縣大華，而代表特殊主義的金子堅太郎則類似吉田松陰。

[[8]](#_8_4)原田熊雄的《西園寺公與政局》（原田日記）全8卷（1950-1956，1982年再版）。有關追蹤重臣們如何發動戰爭的記述，最近（在加拿大講學時，無法加以運用）有勝田龍夫的《重臣們的昭和史》上下（1981）。這本書不僅運用原田的文件，還引述《木戶幸一日記》（1966）、《木戶幸一關系文書》（1966）以及木戶幸一所發表的談話。竹山道雄的《昭和的精神史》（1956）雖然是較早發表的作品，但我的思考方式深受其影響，這本書是從重臣階層自由主義的視角來掌握戰爭的時代。

[[9]](#_9_4)丸山真男，《軍國統治者的精神狀態》，收入《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1957）。

[[10]](#_10_4)“試想，儒教、佛教、基督教乃至社會主義都不能實現之際，地球上唯有我大和民族、日本國民在現人神的信仰中具現建國神話傳說與國民宗教，日后勢能實現世界史所賦予的人道使命。是故，我們日本國民應該‘忠誠地供奉現人神——吾皇大君’守護‘祖國日本’，即守護‘人道’。‘日本的’即是‘人道的’。”（蓑田胸喜，《學術維新原理日本》，1933）。

[[11]](#_11_4)依戰敗后自決的本莊繁陸軍大將（1876-1945）的遺囑表示，日記內容不得外流，但作家尾崎士郎用抄錄的方式，將其對話披露在紀實小說《天皇機關說》（1951）中。本莊與天皇的談話內容載于1935年4月25日。

[[12]](#_12_4)井上清，《天皇的戰爭責任》（1975）。

[[13]](#_13_4)高橋甫、林三郎，《舊軍人的場合》，《芽》1953年8月號。

# 五 大亞細亞

1979年10月11日

所謂“大亞細亞”，是日本人用來表達與亞洲大陸居民關系的詞語。更精確地說，是指與包含日本人在內的亞洲人和平共存的理想大共同體。[[1]](#_1_9)

早在幕末維新之前——中國鴉片戰爭時期，日本的先驅者抱持的危機感中，已經萌生這種觀念了。明治維新之后，盡管也關注朝鮮與中國，但仍有許多像福澤諭吉（1835-1901）那樣不為亞洲問題所吸引的人，轉而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學習歐洲的制度上。之后，當他們再度把目光轉向朝鮮和中國的時候，自認為已經有資格把速成學到的西方文明做法強塞給中國與朝鮮，扮演居高臨下的文明代表者的角色。

1931年，侵略中國之舉由派遣軍開啟，并以中央政府頗覺意外的發展開始。之后，日本的中央政府雖然支持這項軍事行動，但無不為了使瞬息多變的發展正當化和巧辯而費盡苦思。起先只有中央政府以外的右翼評論家發表泛泛之論，試圖合理化這項軍事行動。這些右翼成員與負責作戰的陸軍青年軍官間互通有無地展開活動。在既成事實不斷累積之后，中央政府才于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九年，宣布其政治思想上的根據。這是由當時擔任近衛內閣外務大臣的松岡洋右（1880-1946），于1940年8月1日所發表的聲明[[2]](#_2_9)，其內容如下：

我們現在的政策乃依據皇道的偉大精神，建立結合日本、“滿洲國”和中國的大東亞共榮圈。（中略）大東亞共榮圈之中，當然也包括法屬印度支那和荷屬印度尼西亞。

大東亞共榮圈的范圍是依據軍事需要而決定的。為了確保1931年以后在軍事發展上所獲得的利權，陸軍、海軍參謀官與學者合作完成多項草案。在這些草案提出之前，已經有石原莞爾（1889-1949）倡議東亞聯盟的構想。石原莞爾是應對“九一八事變”及其后發生軍事行動負起責任的關東軍參謀官之一。石原認為，日本必須覺悟，不久將會與包括蘇聯在內的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發生沖突，所以（他本身對這開戰也有責任）和中國間的對戰狀態不能長期持續下去。他的解決方案是，日本、中國和“滿洲國”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友好關系。石原是“滿洲國”的主要建造者之一。然而，“滿洲國”成立后，隨著東條英機的掌權，石原被逐出權力的核心。不久，所有的陸軍，甚至稍后的中央政府，都被納入東條的勢力掌控之下。石原在陸軍的所有重要職位全被解除，因為在東條看來，石原的構想力具有謀叛的因子。

1937年6月，近衛文麿出任日本的首相。在此之前的1936年，近衛的老同學后藤隆之助（1898-1984）獲得近衛的援助，創立了“昭和研究會”。[[3]](#_3_9)提案設立昭和研究會的后藤隆之助意圖借由這個組織，阻止當時逐漸傾向軍國主義的趨勢。為了此一目的，后藤認為只要有助于解決當前的問題，他愿意借重任何學派的人力。當時的日本共產黨，除了身陷獄中的成員以外，其勢力幾乎已完全崩潰。因此，后藤隆之助認為，邀請原馬克思主義學者及自由主義學者協助，對日本軍事獨裁政權采取靈活而堅決的反對立場，并不會那么困難。尾崎秀實（1901-1944）就是在1937年加入這個團體的。

昭和研究會中設有十二個獨立的研究會，尾崎秀實不僅擔任中國問題研究會的主席，還負責全部十二個研究會的協調工作。尾崎擔任中國研究會的主席三年半，直到“昭和研究會”被改組為半官方的大政翼贊會而解任為止。這三年半的期間，尾崎以近衛總理大臣幕僚成員的身份活躍于政壇。近衛在1937年擔任總理大臣之后，即組織以總理大臣為核心的早餐會。總理大臣在參加政府會議前，擬定各項政策的幕僚們先聚于一室，把匯整的資訊提供給總理大臣。尾崎雖然不是每次都出席早餐會，卻負有推派代表參加早餐會的任務。在同一時期，尾崎也與理查德·佐爾格（Richard Sorge）保持密切的聯系。佐爾格是德國的報社記者，因為得到當時德國大使的信賴，能獲取秘密的情報。后來，佐爾格以蘇聯間諜的罪名被日本警察逮捕，尾崎也以共犯的罪名遭到逮捕。尾崎在獄中時，寫下了“我顛倒了是非”的字句[[4]](#_4_9)，或許從中可以顯示出他的反省：與其作為佐爾格集團中的一員積極活動，倒不如借由擔任中國問題的專業評論家兼首相智囊的角色，把全部精力投注在中止中日戰爭的努力上。

作為中國問題專家的尾崎秀實，曾在1931年1月號的《中央公論》雜志上，發表題為《“東亞協同體”的理念及其形成的客觀基礎》的文章。他說：“實踐東亞協同體理論的過程中伴隨發展的得失，雖然乃視中日抗爭的張力關系或國際關系而定，但在日本國內推動此事產生的勢力集結，才是最重要的問題。”他還預言，實際問題是發生在和日本國內資本家間的糾葛。

1944年11月7日，佐爾格與尾崎遭到絞刑處決。

從軍事觀點來看，佐爾格集團得到的“日本不會進攻蘇聯”的情報，意味著斯大林可以免除準備兩面作戰的重擔。然而，尾崎作為大亞細亞主義評論家的地位，不應該因為他與佐爾格集團有所牽扯而被貶損。最終判決的審判長高田正是宣判尾崎死刑的法官，他對前近衛內閣司法大臣、因結識尾崎而失去職位的風見章說：“尾崎是值得尊敬的人，他能將信念付諸行動，在這一點上，我非常尊敬他。”

雖然和佐爾格共同行動，但尾崎并沒有接受任何報酬，他是為了信念而賭上性命。尾崎與日本共產黨及蘇聯的共產國際并沒有關系，作為一名獨立的共產主義者，他對中國的民族主義以及中國的共產主義深表同情，是接近民族主義的共產主義者。尾崎認為，要保衛日本人，日本人就必須與試圖從西方及日本帝國主義桎梏中解放自己的中國人通力合作。

尾崎的傳記顯示，這種大亞細亞的觀點是從他自己的構想發展出來的。尾崎是日本報社記者的兒子，在臺灣長大。日本人對臺灣住民的歧視待遇，在他的記憶深處留下痛苦的經驗，這卻成為他后來喪失生命的導因。他前往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就讀，之后進入東京大學法學部。當時尾崎并沒有醉心于大正時期民主主義的代表學者美濃部達吉，反而為美濃部的對手——當時是東大右翼運動評論家代表的憲法學者上杉慎吉所吸引。有趣的是，尾崎一生對上杉慎吉教授敬愛有加，即使在獄中所寫的書簡，也以自然流露的情感回憶舊師。

尾崎在第一高等學校及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的學生時期，并未加入當時流行的新人會運動，對投入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朋友也沒有深入的交往，這是他雖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卻長期未受到警察注意的原因。尾崎在東京大學的研究所短暫就讀后，即進入朝日新聞社工作，并以特派員的身份被派駐到上海。他在上海時，結識了美籍報社記者——現在仍以左翼作家聞名的阿格尼思·斯梅德利（Agnes Smedley），并通過斯梅德利與德國記者佐爾格會晤。雖然他們三人有交換情報的共同行動，但日本的思想警察并未加以注意，因為當時日本警察的活動范圍只限于日本境內，然而現在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

1934年，在日本共產黨經過幾波的“集體轉向”而解體之際，尾崎調回日本朝日新聞總社工作。從那時起，他以中國問題評論家的身份四處活動，也因為對中國共產黨知之甚詳，發揮出深入的觀察力，而開始受到矚目。與這些公開活動并行的是，他又以總理大臣的幕僚身份在政界幕后暗中活動。此時，他的老朋友佐爾格突然成為派駐東京的外國報社記者，出現在他的面前。這對尾崎來說，意味著另一項秘密活動的開始。而這項活動，最后竟然奪走了他的生命。尾崎被捕并判處死刑之后，包括眾多右翼政治立場鮮明的人士及其朋友們都紛紛表示惋惜，由此可見他的人品。他的主要委任律師竹內金太郎，是一位出了名有骨氣的國家主義者。他一直為尾崎辯護直到后者被處決為止，并稱尾崎為真正的愛國者。尾崎既不受蘇聯政府指揮，也沒有受到蘇聯共產國際對日本狀況判斷的影響。按照尾崎的分析，運動的主要打擊目標應該是財閥和軍閥的結合，至于天皇制，此時只是次要的目標。依照他對自己的評價，他是一個趨近于民族主義的共產主義者。因此有關尾崎的活動，即使在戰敗后，日本共產黨一直沒有給予公開的評價。

大亞細亞的觀念被政府納入施政綱領后，政府便籌劃出許多鼓吹大亞細亞理想的聲明、儀式與會議。向美、英、荷宣戰時，政府對如何稱呼這場戰爭，一時頗為躊躇。日本已經有十年期間持續在這種沒有宣戰的戰爭狀態中，既然決定宣戰，就不能不對此戰爭狀態予以命名。在政府的會議中，曾經提出過若干名稱，例如“太平洋戰爭”或“對美英戰爭”等。最后決定命名為“大東亞戰爭”，選擇這個名稱的理由是，其他候補的名稱并沒有把日本與中國之間持續進行的戰爭狀態包括在內，而此戰斗狀態才是這次宣戰的真正原因。

在日本戰敗的歲月里，日本人從美國政府的視角來回顧過去，認為這場戰爭主要是用來對付美國，于是從中日戰爭的脈絡中將這場戰爭割離出來。這樣做，日本人就不必正視敗給中國——長期以來被日本視為軍事上的弱者——這個不光榮的事實。對于1931年到1945年間進行的戰爭，我提議取名為“十五年戰爭”，原因是要把這場戰爭置于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看似不連續實際卻連續不斷的戰斗狀態脈絡中。另外一個與其說是心理的，毋寧說是反心理的理由，就是對我們這一代在戰爭時期度過小學生涯的人來說，由于政府一再提出聲明，才沒有察覺到戰爭其實已經持續很久，諸如“滿洲事變”“上海事變”或“日支事變”[[5]](#_5_9)之類的個別名稱，反讓人們誤以為是個別的戰爭狀態。我認為，這是我們日本人抱持的主觀事實，若不打破這個局限，我們就無法了解這場戰爭的全貌。因此，這是一場可以視為持續了十五年的連續性戰爭。然而，雖然事實如此，這場漫長的戰爭背后并沒有一個指導戰爭的策劃者。石原莞爾陸軍中將曾經是挑起“九一八事變”的始作俑者，也曾懷有防堵蘇聯及西方諸國的帝國主義的龐大構想，但他在這場戰爭初期已被逐出負責的職位，尤其對1937年以后進行的戰事來說，他本身也持反對的立場。這場漫長的戰爭之所以持續進行，是因為日本政府無力終止戰事，這才是真正的原因。換句話說，倘若沒有日本文化里固有的鎖國性這個條件，這場戰爭肯定不會持續下去。

擔任總理大臣的東條英機大將，雖然沒有自己的創意構想，但他憑著調整及統率以軍人為中心的高級官僚的卓越能力，成功地掌握住政府的會議。他邀集菲律賓、印尼、泰國、印度、中國以及“滿洲國”的領導者到東京，舉行大東亞會議。參加會議的若干領導者，均能用清醒的目光來評估日本政府的戰爭目的，并有效地利用這次戰爭，加強他們自己在國內推動的獨立運動。

巴莫（Ba Maw）曾于1937年擔任緬甸第一任首相，1939年即組織自由同盟運動，意欲擺脫英國的支配，爭取緬甸的獨立。1943年以后出任緬甸獨立政府的元首，并與日本政府展開密切的活動往來。日本戰敗后，他隱居在日本的鄉下，不久即遭到占領軍逮捕。1968年，他在《緬甸的突破：1939-1946年的革命回憶錄》一書中寫道[[6]](#_6_9)：

對日本的軍國主義者來說，他們被人種所束縛，而且這種觀念也最為偏頗。因此，以結果而言，他們完全缺乏理解外國人，或讓外國人理解自己想法的能力。正因為如此，在東南亞戰爭期間，無論事情好壞，在當地人看來，他們做的全是壞事。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只從日本人的角度看待一切，更糟糕的是，其他國家的國民與他們共事時還必須用相同的方式思考。對他們來說，要做事只有一條路而已，那就是用日本人的方式；他們只關心一個目的，就是日本國民的利益；對東亞各國而言只有一項使命，那就是與日本永遠結為一體，成為另外的“滿洲國”與朝鮮。以日本人種的立場強壓在他人身上，他們的做法就是這樣。因此，就結果而言，日本軍國主義者與我們當地居民間不可能產生真正的理解。

這就是身為亞洲領導者，同時也是東條英機首相最親密的朋友，并代表出席1943年大東亞會議的巴莫所做的感想。對日本國民深表同感的他也補充說道：

日本的所作所為只能說是悲劇。回顧歷史，我從未看過有哪個民族為了把亞洲從白人的統治中解放出來，竟付出這么多努力。不僅如此，我也很少看到一個為了助人解放，并在諸多事情作為模范的國家，居然受到當地人民的誤解。

菲律賓官僚機構的干部曾明確答應美國政府，受到日本侵略時將會盡力抵抗，但屬于統治階層的大多數人，卻跟日軍的占領政府合作。當時他們提出的借口是，他們是為菲律賓人服務，是為了保護菲律賓人免受日軍的不當要求而工作。然而，仍有如托馬斯·孔費索爾（Tomás Confesor）[[7]](#_7_9)那樣的人，不改其信念認為：即使美國陷入苦戰，也不應該破壞對美國人民的承諾。[[8]](#_8_7)根據孔費索爾的理論，軍人可以向強敵投降，但文官在道德上并沒有這種自由。因此，文官不應該和乘勝追擊的日軍合作。像孔費索爾這樣的人，都傾向使用游擊戰跟日軍作戰。麥克阿瑟將軍回到菲律賓開始反攻之后，主要的作戰方式集中在于獲取對日軍的勝利，毫不關注如何保護菲律賓人。在這個階段，日軍已無向美軍反擊的戰力，縱使置之不理，也會自行瓦解。然而，軍隊的領導者并不會等待敵人自行瓦解。在這場戰爭最后的日子里，由于美軍的持續轟炸，破壞了菲律賓人的生存空間。從這時候起，許多持續抵抗日軍的菲律賓人才認為，美國終究不是菲律賓窮人的朋友。

對互相戰斗的軍隊而言，不管在任何地方，要看清楚包圍自己的戰斗對象是非常困難的。根據記載，日本人戰敗之后，被送到菲律賓戰場的63萬日軍中，總計有48萬人死亡。日本人這樣回想的同時，卻忽略了在這場戰爭中，有將近100萬的菲律賓人喪命。日本不但讓約莫50萬日本人白白送死，又跟美國人聯手殺了100多萬菲律賓人。不過，這個事實還未納入日本人的記憶中。

大岡升平是在這場戰爭的最后階段，被送往菲律賓的士兵之一。[[9]](#_9_7)他被美軍俘虜，并在戰敗后寫下《俘虜記》與《野火》兩部小說。在日本文學的傳統中，小說家習慣通過美學形式來表現自身的經驗一，實現此形式也成為他努力的目標。之后，大岡升平開始擺脫這種傳統，重新松綁這種美學形式的束縛，并試圖追尋自己戰爭經驗的細節。于是，在《萊特戰記》[[10]](#_10_7)的記錄中，他找回許多在戰爭當時士兵們肉眼所無法看見的事物。例如，他寫下日軍在占領菲律賓的兩年中，為萊特島上的居民所帶來的損害。這可從他書中引用的統計中得知真相：



大岡升平在書中描述由于日軍殺死水牛，而破壞菲律賓人生產手段的境況。他還不忘補充說，被殺死的水牛是地主所有，往往因每個地主的地位而具有不同的意義。地主將土地租給佃農時，佃農必須付給地主60%的收成。所以在失去水牛后，佃農就沒辦法生存下去。如此一來，就不得不加入山里的游擊隊了。

大岡升平在這本書中，附了很多與菲律賓戰爭相關的書籍和小冊子的龐大文獻表，還強調這個文獻目錄是這本書最重要的部分。一位小說家說出此言實在極為少見。在此，我們可以感受到，日本文學史與精神史已展現出全新的特質。從其字源來看，所謂的“大東亞”，是伴隨20世紀40年代日本政府的軍事需要而產生的字眼。戰爭即將結束前，由于勝利已經無望，日本政府決定讓亞洲各民族獨立。這個決定意味著日本政府不想再白費力氣，因為他們已經無法采取任何措施來改變當前的局勢了。

1943年8月，日本同意緬甸獨立。1943年10月14日，菲律賓發表自由宣言。1943年10月，自由印度臨時政府在新加坡成立。日軍決定停戰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海軍默許印尼的領導者發表獨立宣言，以圖謀抵抗荷蘭的再次占領。

這一切舉措，都不是在日本政府在這些地區還維持軍事統治的時代所決定的。因此，并不能單純地從日本讓這些地方獨立的事實，就歸結說，日本政府曾為了讓亞洲各民族從西方帝國主義中解放出來而做出努力。依結果判斷的話，日本政府的行動畢竟還是為亞洲各民族帶來解放與自由。然而，這并不是由于日本政府的企圖，而是通過亞洲各民族自身的努力所獲得的。

有關日本政府的活動，在此暫告一段落。從精神史來看，日本人的著作中有沿襲“大亞細亞”觀念的系統，這個系統與日本國家意圖借由軍事武力稱霸亞洲的關注并不相同。

岡倉天心可說是發表這類作品的早期人物，此外還有宮崎滔天北一、輝和大川周明等。由于北一輝和大川周明與其后的軍事叛變[[11]](#_11_7)有所牽扯，他們的大亞細亞思想性質因而受到質疑。竹內好可說是屬于這一系列作家中的最后一位。20世紀30年代，竹內好與幾位朋友成立“中國文學研究會”。在日本尚未向中國宣戰的對戰狀態期間，日本人長期用帶有輕蔑之意的“支那”來稱呼中國。不過，竹內好等人并不說“支那”，而直稱“中國”。竹內好在其同人刊物中，發表支持對美英開戰的宣言。[[12]](#_12_7)他表示，日本人必須有所覺悟，我們的民族將在這場戰爭中改變性格，我們的國家在解放亞洲各民族的努力中也不得不變形。他的構想是基于一個預感：不打破日本政府當前的結構，就無法抑制政府領導者支配亞洲各國的野心。

戰后的年輕評論家菅孝行，站在竹內好思索的方向上，從戰后的日本政府中，看到了比戰敗前的日本政府，更有效持續戰爭目的的機構。[[13]](#_13_7)另一位戰后的評論家松本健一屬于比菅孝行更年輕的一代，他在日本與東南亞現在的經濟關系中，看見比日本政府鼓吹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戰爭目的，更為有效穩定的實現形態。[[14]](#_14_5)正如他們所指稱的，東南亞與日本的經濟關系中，以日本為中心的偏頗性質，仍保有戰爭時期日本所顯示的形態。

[[1]](#_1_8) “滿洲事變”“上海事變”“日支事變”為日方的稱呼，分別指“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與“七七事變”。——編注

[[2]](#_2_8) 托馬斯·孔費索爾（1891-1951）為二戰期間菲律賓伊洛伊洛省（Iloilo）省長，伊洛伊洛省被日本占領后，孔費索爾逃至班乃島（Panay），在班乃島領導反日勢力。1945年3月，馬尼拉從日軍手中解放后，他被任命為馬尼拉市長，8月擔任內政部長，隔年獲選為參議員。——編注

[[3]](#_3_8) 書名中的萊特島（Leyte），是麥克阿瑟反攻時在菲律賓登陸的島嶼。

[[4]](#_4_8) 北一輝因1936年由陸軍青年軍官發動刺殺政府和軍方高層的政變“二二六事件”而被逮捕，隔年以思想主導犯罪名遭槍決。大川周明因參與1932年海軍基層軍官和右翼分子等刺殺首相犬養毅的“五一五事件”，以叛亂罪起訴，判處五年有期徒刑。——編注

[[5]](#_5_8)竹內好是《現代日本思想大系》第9卷《亞細亞主義》（1963）的編者，他探索日本此一思想的系譜。在該卷序文《日本的亞細亞主義》中，竹內好認為亞細亞主義的基礎含有大亞細亞的理念，基于此理念（包含日本的），亞細亞互動關系究竟（從日本的立場而言）其侵略性和壓抑性到何種程度？對此每個思想領域的情況各不相同。竹內好的亞細亞主義論述還包括內田良平和巖波茂雄的觀點。補記：松本健一，《竹內好“日本的亞細亞主義”精讀》（2000）。

[[6]](#_6_8)1940年8月1日下午12時30分，松岡洋右外相所發表的談話（《東京朝日新聞》，1940年8月2日）。

[[7]](#_7_8)以“昭和研究會”舊成員的口述為主所編纂的記錄，收錄在昭和同人會編著，后藤隆之助監修的《昭和研究會》（1968）。“昭和研究會”創立時擔任辦公室職員的酒井三郎所寫的記錄，收錄在酒井三郎，《昭和研究會》（1979）。

[[8]](#_8_6)尾崎秀實于1943年10月23日寄出的信件，收錄在尾崎秀實的《愛情宛如流星》（1946）。現在，尾崎的著作，包含書信和報告書，都收錄在《尾崎秀實著作集》全四卷（1977）。關于尾崎的傳記，風間道太郎的《尾崎秀實傳》（初版1968、增訂版1976）是比較可信的作品。另外，石垣綾子的《回憶中的斯梅德利》（1967）對尾崎的性格有深刻的觀察。

[[9]](#_9_6)巴莫，《緬甸的突破：1939-1946年的革命回憶錄》（1968）。我曾在新潟縣六日町拜訪戰敗后藏匿巴莫的今成拓三，基于這段機緣，我才得以聽到他的回憶。從“大東亞共榮之夢”座談會可以窺知，巴莫已然知道有別于他在回憶錄中的日本人（收于《日本的百年》第10卷月報，1978）

[[10]](#_10_6)戴維·喬爾·斯坦伯格，《二戰時期菲律賓的通敵行為》（1967）。

[[11]](#_11_6)正如大岡升平在《我的文學生活》（1975）中所述，自從他在菲律賓作戰時面對自己之死，獲得把自己視為一個普通人的看法以來，縱使在《幼年》或《少年》這類自述傳中，也都采取將自己當作一個現象置于地理和社會史中探究的方法。用這方法寫出《野火》之后，便傾其全力在《萊特戰記》《再訪民都洛島》等作品中掌握構成作品根源的事實。

[[12]](#_12_6)《大東亞戰爭與我們的決心》，《中國文學》第80號卷頭言，1942年1月，該文沒有署名，是由竹內好執筆。

[[13]](#_13_6)“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戰后，難道天皇制沒有被維護或被發展得更加完備嗎？這是我一貫的問題意識。”“作為機構的天皇制，天皇的位置從掌權者移向象征的地位，確實會相對化到嚴重的后果。然而，我們不得不這樣思考：戰爭時期天皇制的存在結構不僅獲得延命的機會，它恢復了比新的支配形態更堅固的結合關系，進而形成更堅固的天皇制基礎。”（菅孝行，《天皇制的最高形態為何》，收于《天皇論札記》，1975）。

[[14]](#_14_4)“毋庸置疑，到了戰后，亞洲人來到日本，既不須做個逢迎者，也不必害怕被強行擄走，因為強權的帝國主義已經瓦解。只不過，日本近代化的路線在戰前或戰后絲毫沒有改變。也就是說，日本依然抱持著以亞洲作為跳板、躋身歐美帝國主義列強行列的基本構圖。”（略）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戰時體制的大東亞共榮圈已經崩潰，但以日本為“盟主”的經濟體制的大東亞共榮圈，毋寧說是戰后才確立下來的。此一確立期，亦即日本近代化過程結束后，擺脫長達百年間“近代日本”的框架與歐美列強并肩的時期。具體地說，以1964年東京奧運會那年為分歧點。松本健一，《從“亞細亞”到“西歐”》，首刊于《思想的科學》1979年9月號，后收錄于《戰后世代的風景》（1980）。

# 六 非轉向的形式

1979年10月18日

在日本，宗教的形式和西歐或美國稍有不同。當日本人被問到“你信什么教”，尤其是被外國人詢問時，都會簡扼地回答：“我信佛教。”然而，正確地說，日本人的宗教信仰不能這樣歸類。現在的日本人，除了近親的喪禮或自己死亡的后事以外，幾乎很少去佛教的寺院。對大多數日本人來說，墓地是由佛寺管理的。除了這種關系之外，就算當事人以家族為單位，參與佛教特別教派的教義，這些教義都不見得會浮現在他個人的心靈中。

日本人很少認真思考佛教與神道教的差異，雖然這兩種宗教在西方比較宗教的書籍中被區分為兩種不同的宗教，但其實在日本人的感覺中幾乎是相連的。在此種宗教意識中，也納進了佛教及神道教以外的各種宗教，而這些宗教最后都消融在日本式的宗教信仰中了。

對居住在都市里的日本人而言——現在大多數的日本人都過著都市生活——圣誕節是眾所周知的慶典活動，這項慶典通過商業活動普及日本全國。因此，對百貨公司而言，12月底的圣誕節期間是增加業績的最好機會。在現今日本人所能享受的藝術形式中，最強而有力的就是廣告；它把圣誕節變成日本人居住環境的一部分，納入日本的歲時記，成為每年季節嬗遞中諸多的節日之一。基于期待和迎接圣誕節的到來，日本人每年只有一天是基督徒，不僅互贈圣誕禮物，也把這天當作喝酒的借口。通過每年只做一天的基督徒，日本人認識了基督教的傳說和儀式，進而開始對基督徒的生活方式產生共鳴。

若按照西歐式的分類法，這些互不相同的宗教，其實早已融合吸收進這狹小群島上的日本人的共同信仰中了。這種宗教心支撐著彼此共居一地的事實，再由明治以后的政府暗中操作，把它鑄入國家宗教的模型中，使其塑造出對當權政府的服從。不過，這不能說是操縱日本人共同信仰的唯一方式。

在此，我們試著從另一途徑來探索日本人的宗教信仰。為了厘清日本人共同信仰的性質，有必要通過日本民間傳統，來了解在日本與西方各國斷絕往來的鎖國時代中，是如何改變耶穌基督的福音書，并借此探究日本人的宗教心性質。

自從日本向西方各國關上國門后，日本的基督教徒大都屈服于德川幕府政權的壓迫下而“轉向”了。有些人成為殉教者，為堅守信仰而死；也有人逃到遠離中央政府的日本離島角落，躲避中央政府的嚴密監視，才得以披著中央政府強加的佛教袈裟，繼續維持他們原本的基督教信仰。

1854年日本開放門戶之后，歐洲的天主教會懷著一種期望——希望已經脫離歐洲基督教中心兩百年的日本人，其心中仍保有些許基督教信仰，因而派遣傳教士來到日本。這類隱藏的信徒在1865年出現了。1865年3月17日，法籍神父珀蒂讓（Bernard T.Petitjean）在九州長崎新建的天主教堂“大浦天主堂”門前，看到十多名日本人聚集在一起。這時候，有三名女性走向法籍神父，用跟神父相同的姿勢祈禱。接著，她們小聲地對神父說：“我們和你有相同的信仰。”這幾名女性是來自當時被并入長崎市的浦上村的農婦。

光是在浦上村就出現了1300名基督教信徒。后來，在九州各地又出現了數千名基督教徒。但是，他們因為信仰的關系而遭到明治新政府的迫害。盡管在這二百年間堅持信仰，但進入明治時期后，大多數信徒仍遭受拷問與流放，并被迫“轉向”。直到1873年，明治新政府才解除對基督教的禁令。在此之前因堅守基督教信仰而被囚的信徒，才終于獲得釋放。在明治初年大舉迫害信徒期間，許多有智慧的人借由裝傻充愣繼續維持他們的信仰。他們不接近外國人新建的天主教堂，而默默地堅守自己的信仰。這些隱藏的信徒到底有多少，確切的數字目前仍無法得知。

田北耕也在《昭和時代的隱藏天主教徒》一書中提及：在九州長崎地區，光是五島列島其中之一的奈留島，就有4500名隱藏的天主教徒。[[1]](#_1_11)

至于在這些隱藏的天主教徒之間，是如何傳遞福音書的，實在引人興趣。在黑崎地區和五島流傳著一本《天地始之事》的抄本，用這個方式來傳述耶穌基督的傳說：

希律王為審判耶穌，上天下地遍尋不著，連當地居民之子亦混雜其間，遂下令誅殺全國所有剛出生至七歲的嬰孩（為數44444人），既不惋惜，亦不哀傷，其數達44444人。耶穌得知消息，自認數萬孩子失去生命，全是因己而起，遂發宏愿自承一切苦業，來救這些小孩之后世。此時，父神認為數萬幼子失去生命全是因耶穌之故，為此失去天國的喜樂，放心不下，予以告示：為了死去孩子的后世，你自當受譴責罰，舍身而盡。耶穌頓時伏倒在地，淚出鮮血。正午五祈禱文（玫瑰經痛苦五端）即為此時的產物。其后，耶穌回到羅馬國的圣潔教會，自當承受惡人折磨，舍棄生命。

以上需稍加以解釋。所謂“連當地居民之子亦混雜其間”，是傳述福音者自身的生活感受。這些人原本是農民，即使不是農民，而是武士或町人[[2]](#_2_11)，也已經逃到遠方成為窮地的農民。這樣看來，傳述福音書的人似乎頗有潛入土地中，艱辛求存的感受。并經由這種實在的感受，重新改述了耶穌的一生。接著說，希律王下令誅殺的孩童達44444人，這數目似乎是來自京都三十三間堂[[3]](#_3_11)的佛像總數，再將數字加進去的。同時，也加入具有與歐洲不同起源的元素。在福音書的口頭傳承中，有時也會摻進事實以外的各種傳說，如同五島的福音書傳述的那樣。其實，姑且不論耶穌是否存在，就算真有其人，他身上發生的事情能否如實傳述，恐怕終究還是難脫傳述者實際的生活感受。在這種情形下，傳述的故事就會變成活在自己心中的耶穌，和自己所相信的耶穌。在日本傳述耶穌傳的人，也有一種深沉的不安，因為他們在島原之亂[[4]](#_4_11)結束后，仍被江戶德川幕府的官吏追趕，隨時都可能被磔刑致死。因此，比起進入明治時代，解除基督教令之后，通過歐洲傳來的新學問將歐洲福音書翻譯成日語的人，那些隱藏信徒的耶穌傳可說包含更深切的焦慮。

1945年戰敗以后，日本的圣經研究又往前推進，出版了合乎現代日語的口語體福音書。比起明治時代的譯本，此日譯本在質、量上都要高出許多；比起住在五島列島的隱藏基督徒，新譯本也更準確地把歐洲的圣經譯成日文。在戰后的解放感中譯成的圣經文體，顯得溫和自然。姑且不提文體的形態，就思想來說，父神現身叱責耶穌的理由是：因為他，數萬幼童失去性命，所以，他必須為這些孩子的來世承受苦難，拋棄生命。耶穌本人也這么想。而這種受苦的方式，正是日本人的方式，即世代住在這島國的群體，所培育出來的同胞情懷。這種情懷成了傳述耶穌傳的動機，也跟1931年開始的十五年戰爭期間，推動日本人和滲透日本人的那股情感非常相似。在我看來，日本基督教徒在十五年戰爭期間，遭受苦難卻不放棄自己信仰的那股情感，頗近似于德川時代二百年的鎖國期間，天主教徒堅守信仰的情愫。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五島列島的福音書與現在所要談的戰爭時期精神史，頗有相通之處。

中村元是佛教學者，他在十五年戰爭期間，曾比較研究中國、印度、中國西藏和日本接受佛教的形態。雖在戰爭期間，中村元仍持續這項研究工作，終于完成巨著。這本題為《東方人的思維方法》的專著，戰后在日本出版，也譯成英文版。根據本書研究指出，與其他東方民族如中國人（尤其是西藏人）、印度人等相比較，日本人接受佛教的特色在于簡化其教義，并強調同信仰者的人際關系。[[5]](#_5_11)這些特色并不是通過德川中央政府鎮壓基督教，迫使其轉向并采用官方準許的佛教教派而興盛起來的；毋寧說，在更早之前，盛行的民間佛教運動中即已顯現出來。因此，在這種簡化的佛教中，也顯現出教徒拒絕政府不當要求的態度。

佛教有許多教派，其中也有隱秘的教派，跟基督教中有隱秘的基督徒一樣。以我所知的例子而言，阿伊染德美曾寫過一本《我躲著念佛》的書，這本書寫出他在成長過程中與同伴躲著念佛的故事和儀式。[[6]](#_6_11)那是流傳于巖手縣山中和賀村的黑佛流派。在這山村的隱藏念佛信徒間，形成了友愛共同體的意識。例如，美國佛蒙特州的奧內達（Oneida）[[7]](#_7_11)就有這種共同體，他們在百年前就具有友愛互助的習慣，哈夫洛克·靄理士（Havelock Ellis）的《性心理學》中很早就加以介紹過；據說和賀村也有類似相同的習慣。這種黑佛信仰是由約二百年前，遭到政府認可的佛教教派迫害，而進入潛伏狀態的流派所形成的。村民為幫助逃進山中的僧侶，而在當地形成信仰的共同體，并通過信仰讓原本就存在的互助習慣，更加緊密地結合。正是基于這種堅韌的共同信仰，和賀村的信徒們才得以度過數次饑荒和戰爭的威脅。在這期間，他們始終不肯向官吏坦承自己的信仰，不論在德川時代或對明治以后的新政府，始終如此。阿伊染德美指出，進入明治時代以后，曾發生數次內亂，后來又與外國發生兩次大型戰爭，許多村民被迫當兵或因而戰死，造成許多寡婦和孤兒。村民們不但公開迎納寡婦為妻，落實互助合作的精神，還照顧無依的孤兒們。這種形式，也隨著政府強迫村民參加戰爭而產生的不信任感傳承下去。這種信仰并不美化戰爭，反而認為戰爭比饑饉還要殘酷，這種口頭傳承也隨著佛教信仰流傳下來。姑且不提這種隱秘佛教的共同體，大都市中合法的佛教教派時常通過宗教贊美戰爭，又只會傳達支持政府的言論。因此，遺留在和賀村的共同體信仰可說是毫無前例。在山村里，不管是戰時或戰后，村民們始終背對著外界的人——與中央有所關聯的學校制度與軍隊制度、官方許可的寺廟和佛教制度等，悄悄地舉行隱秘的宗教儀式。這信仰的底層，含有對現存政治秩序與政治權威的不信任感。

德川時代和明治初期，正統官方許可的佛教教派，都被用來打壓基督教的信仰；國家神道則在明治時代和十五年戰爭期間，被用來鉗制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在基督教信徒中，成立官方認可大型團體的人士，在一開始便主動支持中日戰爭，其中絕大多數都參加過大政翼贊會的運動。在較小的基督教教派中，像是圣教會、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和燈臺社等，至少在某一時期曾對十五年戰爭采取批判的態度。不過，燈臺社因與日本傳統有關系，尤其值得注意。燈臺社此一無教會派基督教團體的總部設在美國，由羅素（Charles Taze Russell，1852-1916）創立，之后由拉瑟福德（Joseph Franklin Rutherford，1869-1942）繼承，其后再由會長諾爾（Nathan Homer Knorr）主持。這項運動以基督臨在思想為教理，要求信徒對世俗權力提出不妥協的批判。同時，拒絕向國家敬禮也被當作信徒的義務。基于這種信念，不管在德國或日本，信徒們都不斷地抵抗國家至上的政治思想。許多信徒也因此被捕入獄，甚至死亡。

明石順三（1889-1965）為了成立日本分部，1926年從美國的燈臺社總部被派到日本。明石順三并非像現在在美國發行的燈臺社歷史《耶和華見證神的目的》（1959）中所寫的那樣，是日裔美國人。[[8]](#_8_9)他出生于日本滋賀縣息長村的巖脅——靠近琵琶湖的山村；父親是個中醫師，十四歲時從中學退學，計劃前往美國。1908年，他十八歲時前往美國，一面工作，一面自修讀書，主要利用公立圖書館自修。1914年起，他先在圣地亞哥，接著在舊金山，最后到洛杉磯擔任日文報紙的記者。在這期間，他娶了日籍妻子。由于妻子是燈臺社的信徒，因此他也就順理成章地加入這個教派。明石順三和妻子生有三個兒子。當他被派往日本負責成立日本分部時，他的妻子拒絕一同前往，而留在美國。夫妻兩人就在這時辦理離婚。而一開始和母親留在美國的三個兒子，不久也被送回日本，與父親同住。這三個兒子認同父親的生活方式，始終不肯接受小學以上的教育，并協助父親籌組日本燈臺社的工作。

在日本軍國主義（始于“九一八事變”）興盛的前五年，燈臺社的組織非常符合日本社會的氣氛。這種基督教運動沒有教會組織作為基礎，只闡釋耶穌基督復臨的教義，并教人民反對戰爭。不過，明石順三等人的傳教作為，卻受到抱持相同理念進行活動、同時代的偉大基督徒內村鑒三[[9]](#_9_9)的忌妒。太田雄三所著的《內村鑒三》（1977）一書，便指出這個偉人的善妒；高阪薰還引用內村鑒三及其弟子討論明石順三的信件，借此呈現這偉人的狹隘面向。

1931年日本進入軍國主義時代，全國氣氛丕變，燈臺社的活動因而受到警察的強力干涉。明石順三的長子明石真人被征召當兵時，旋即表明自己反對殺人，將授予的槍支交還給長官。這則新聞迅速傳遍日本各地。在別的地方，也發生和明石真人相同的行動，這個問題讓日軍頭痛不已。因為在此之前，日本鮮少發生這種“良心式規避兵役”，也就是基于信念而規避兵役的事例。[[10]](#_10_9)最后這些人被送到軍事法庭接受審判。1939年6月14日，明石真人遭判監禁三年。在軍法會議判決之后約一星期，1939年6月21日凌晨5時，50名警官突襲位于東京的燈臺社總部，逮捕了共26名男女，其中包括明石順三和他剛再婚的妻子，以及他與前妻所生的另外兩個兒子。也就是說，明石一家全部遭到逮捕。在被捕入獄期間，明石順三只能閱讀經過許可的書籍，其中包含佛教與神道教的經典。經由在獄中的思索，他發覺自己所探求的宗教真理，并非只存在于《圣經》之中。戰爭結束后，他所寫的長篇小說《凈土真宗門》中，主角老人得出一個結論：宗教的真髓，在于歡喜歸空。他說，這種想法乃出自佛教的《法華經》。因為信仰佛教而開悟的人，就是能夠在寂滅為樂之相中觀看世界的人。換句話說，這種想法就像舊約《圣經》那樣把世界當成空之又空的事物。他認為《古事記》中也有這種思想。

日本當局禁止明石順三跟他被關在陸軍監獄的兒子會面，然而，他從閱讀佛教經典和神道教文獻所獲得的感想，還是經由別人口中傳到了明石真人的耳中。明石真人長期以來都在父親所說的“絕對的真理只存在于圣經中”的教誨下長大，當他聽到現在父親認為真理并不只存在于《圣經》中時，受到極大的打擊。不久，真人撤回拒絕扛槍的誓言，并在1914年，寫下“轉向自白”。根據自白，他在獄中自行閱讀日本最古老的史書《古事記》與《日本書紀》后，得出這樣的結論：日本之所以偉大，是因為擁戴萬世一系的天皇和世界之冠的“國體”；萬世一系的天皇為了日本民族，以及所有日本國民不斷地獻身努力。因此，他立誓今后要以身為帝國軍隊的一員，盡最大的努力，將他充滿罪惡的身體奉獻給天皇，為保衛國家欣然赴死。于是，他加入戰車部隊，戰敗后才恢復正常的市民生活。后來，真人也說服他的弟弟們抱持這種“轉向邏輯”加入軍隊。明石順三的次子就是擔任陸軍的文職人員在南方戰死的。順三的第三個兒子，盡管在兄長的說服下，仍然堅守父親傳下來的信仰，在當局的監視下度過戰爭，迎接戰敗的到來。

同樣是閱讀神道教和佛教的經典，父子兩人卻得出不同的結論。父親明石順三聽到其子“轉向”之后，1942年4月9日在法庭上現身時，在法庭記錄中留下這樣的證詞：

現在，跟隨我的只剩下四個人，加上我一共五人。這是一場一億人對五人的戰爭。到底是一億人獲勝，還是五人所說的神諭贏得勝利？不久就能獲得證明。我確信這一點。而且我們處之泰然，毫無所懼，何必多言。

沒有人在旁聽席上聽到這項證詞，因為當時那些未被捕入獄的燈臺社信徒，擔心遭到警察迫害而留在自己家里。不過，盡管戰爭已經進入最后階段，日本的法庭仍舊把明石順三這段沒有人在場旁聽的最后證詞記錄下來。

在最后的證詞中，明石順三并沒有提到自己在獄中從閱讀神道教和佛教經典中學到什么，這大概是他得知自己的兒子“轉向”之后，導引出他對這個問題保持沉默的智慧。明石順三完全可以想象到，如果他說出自己對神道或佛教的感想，肯定會被當時的政府加以利用。因此，他成功地阻止了自己在獄中領悟的宗教觀，遭到當局扭曲甚而誤導社會的可能性。這顯示出深諳實際政治表里的練達政治家的判斷。明石順三在戰后去世，他較為年輕的弟子——村本一生，是一個貫徹信念的硬骨頭，始終留在獄中直到戰爭結束。他用“一言以蔽之，他是個完美的常識人”[[11]](#_11_9)來形容明石順三的人格。

戰敗后，明石順三獲得釋放，與其一同被關在獄中的四個人當中，他的妻子和一名朝鮮籍信徒，在戰敗前就已經去世。殘存的三人之中，一名朝鮮人返回祖國，明石順三和一名年輕的女信徒幸存下來。明石第三次結婚時，把在獄中貫徹信仰的年輕女性收為養女。這名女子罹患重病，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康復。明石一家和從陸軍監獄釋放的村本一生共同退居在栃木縣的鹿沼，在經歷漫長的戰爭歲月，仍堅守信仰的團體中繼續過著儉樸的生活。據說，他們彼此間幾乎不談論戰爭期間的事。在戰后，他們完全脫離燈臺社的活動，也不推動與燈臺社不同的新興宗教運動。

日本戰敗兩個月后，當明石順三被釋放的消息傳到了燈臺社美國總部時，總部打了一封祝賀電報給他，并說要送一整船的糧食和其他物資援助他們。不過，讀完美國總部在戰時活動的報告后，明石順三在村本一生的協助下，對總部在宗教集會時豎立國旗的國家崇拜行為進行批判。此時的明石順三肯定想起許多日本的燈臺社信徒，曾因為拒絕在皇居前行最敬禮而遭到拷問，甚至死在獄中。此時，擔任燈臺社第三任會長的諾爾得知這批判后，撤銷了明石順三在燈臺社日本及朝鮮分會長的職位。然后又在回復明石順三的信中說：“我確信，以耶和華的靈讀過你的公開信的人，都能輕易看穿，從羅素牧師時代至今的這些年中，你一直是個偽善者。”于是，明石順三就從燈臺社的歷史中被抹殺掉，甚至現今在日本通過個別家庭拜訪增加信徒的燈臺社人員之間，也不知明石順三是何許人也，更不曾出現在他們所持有的燈臺社歷史書籍中。

燈臺社、圣教會和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等小型基督教教派，從中日戰爭初期的階段就采取批判的態度，因為這些教派大都在下層社會活動，而下層社會的民眾不僅沒有因戰爭獲得利益，反而深受打擊。在這場戰爭的初期，進入大學的青年都享有延緩入伍當兵的恩典。不過，無法接受高等教育、年滿二十歲的青年，就必須接受征兵檢查，體檢合格者即編入軍隊。因此，其死亡率要比同年齡的大學生明顯高出許多。另外，在燈臺社里面，有許多朝鮮籍的信徒，這可以從戰時在獄中堅守信仰的五人中就有兩名是朝鮮人推斷出來。

較大的宗教團體，就基督教而言，除了圣公會之外，無不與政府的戰爭政策積極合作，但內村鑒三影響所及的知識分子小團體，對戰爭仍維持批判的態度。經濟學者矢內原忠雄、政治學者南原繁等，都屬于內村鑒三門下的“無教會”教派，這兩人在日本投降后先后擔任東京大學的校長。

佛教團體除了極少數例外，都視侵略中國為圣戰運動的前鋒；例外的只有妹尾義郎所領導的新興佛教青年同盟。妹尾義郎抱持一切事物皆為相互依存而生生不息，亦即“緣起之法”的觀點，認為洞徹此法為生之后，其解放人類的基本態度，應該以建構否定個我與私有的共同生活為目標；抱持這種立場當然會產生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思想。此團體在農村的下層人民中推展宗教活動，必要時還義務替人籌辦喪事。然而，妹尾被捕后，于戰爭的最后階段卻聲明“轉向”。[[12]](#_12_9)

由柳宗悅所領導的民藝運動，推動依據佛教美學而尊重工匠的觀念，并在戰爭的集體狂熱中守住自己的立場。[[13]](#_13_9)

戰爭初期，存在于都市下層階級的反戰情緒，通過日蓮宗佛教運動的形式之一，亦即牧口常三郎及戶田城圣所領導的“創價學會”表現出來。[[14]](#_14_7)不僅在都市，農村下層階級的反戰情緒，也從出口王仁三郎所領導的“大本教”、御木德近所領導的“人之道”、大西愛治郎所領導的“天理本道”等神道系宗教運動中宣泄出來。[[15]](#_15_3)在這些運動中，有人遭到逮捕，也有人死于獄中。存活到戰敗后的人，也跟拒絕“轉向”而不改變政治信仰的日本共產黨殘余分子，于日本投降后一同獲得釋放。

那些在戰爭期間拒絕轉向、貫徹信念的共產主義者，于日本投降后不久，都成為共產黨支持者所創造出來的傳說對象。這十多名“非轉向”的共產黨員，被視為體現共產黨無謬性的代表。然而，最先對這些人提出批判的是吉本隆明（1924-2012），他屬于在戰爭期間成長的年輕世代。[[16]](#_16_3)他在1959年發表的《轉向論》，對拒絕轉向的共產黨領導者加以批判。吉本隆明論述說，就喪失與同時代狀況接觸的機會而言，其實這些獄中共產黨員的“非轉向”，和接受轉向者的思想，以及接受轉向的原共產主義者的思想一樣，都是荒蕪空蕩的。他又認為，那只是以原理為原理機械般地確認工作，在如何面對時代處境的方向性上，沒有任何效用。但我認為，他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所謂“非轉向”的狀態并不是靜止不動的狀態。由于人乃血肉之軀，行動總處于不停擺動的狀態，這也包含不做某種行動的抑制狀態。人類無論處于何種狀態，都無法脫出這種擺動的狀態。進一步說，在擺動的狀態中，人必須依靠某種基本價值來支撐自己。這種基本價值基準，在語言的原義中，可稱為宗教。這十多名共產黨的領導者，出獄時仍采用20世紀20年代在獄外活動時，與左翼知識分子間使用的語言和表達方式，來發表他們的政治見解。那是20年代東大新人會成員的文體，經由歐洲傳入的翻譯語詞所形成的。不過，那種語詞已經遠離戰敗后日本人民的生活情感。

堅持不轉向而留在獄中的共產黨員沼山寬，在日本投降及獲釋后，活了三十年。他在臨死前，這樣說道：“戰爭結束的時候，我們已經疲累至極，幾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當時，有位占領軍的軍官前來通知要釋放我們。在我們之中精神最佳的要數德田球一，他問我是否應該接受占領軍的提議。那時，我已經沒有力氣思考，只回答說，按他認為正確的去做。提這件事，并不是要夸示我當時的先見之明，但現在，我覺得當時應該這樣回答：‘在日本人讓我們獲得自由之前，我們應該留在獄中。’”[[17]](#_17_3)

與此稍有不同的是，作為燈臺社信徒而留在陸軍監獄，直到戰敗才出來的村本一生，于戰敗后三十年，這樣說：現在走到皇居的話，我覺得會被迫高呼天皇陛下萬歲。[[18]](#_18_1)在戰爭時期，只要對中國戰爭一日未歇，他就沒有現在這種感受。即使是相同的行動，在不同的境況中所代表的意義是不同的。由此看來，他與其師明石順三都是具備充分常識的人。這種確實掌握時代脈動，加以判斷后付諸行動的方式，不同于以引進海外思想作為大前提，并單憑此邏輯從中得出對同時代狀況所做的判斷方式。

本書由“滿屋書香”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讀什么書或者想獲得更多免費電子書請加小編微信：sisijuan2012或QQ：151680600 小編也可以結交一些喜歡讀書的朋友。或者關注小編個人微信公眾號名稱：滿屋書香。 公眾號中可以獲得書香君所有分享的免費電子書！

[[1]](#_1_10) 在日本江戶時代，對從事工商業者的稱呼。

[[2]](#_2_10) 位于京都的天臺宗寺廟，“間”乃一種建筑用語，代表柱間的距離，內有一千零一座木造千手觀音像，乃“蓮花王院本堂”的通稱。

[[3]](#_3_10) 1637年，反抗江戶幕府殘暴鎮壓的天主教信徒們，在天草四郎的帶領下攻占島原半島南部的原城，史稱“島原之亂”。

[[4]](#_4_10) 奧內達，北美印第安人伊洛魁族（Iroquois）的一支。

[[5]](#_5_10) 內村鑒三（1861-1930），思想家、宗教家。曾堅持不在學校奉讀《教育敕語》時鞠躬禮拜而引發輿論爭議，主張“非戰論”，并積極評論時政。提倡不受特定教派或神學束縛，不依賴特定機構或神職人員，純粹以《圣經》為本的“無教會主義”。著有《代表的日本人》《我如何成為基督徒》等書。——編注

[[6]](#_6_10) 常識人意指擁有健全的判斷力的人。

[[7]](#_7_10)田北耕也，《昭和時代的隱藏天主教徒》（1954；1978再版）。

[[8]](#_8_8)中村元，《東方人的思維方法》上下（1948-1949）。

[[9]](#_9_8)阿伊染德美，《我躲著念佛》（1977）。

[[10]](#_10_8)燈臺社總部的歷史，出自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守望臺圣經書社，《耶和華見證神的目的》（1959）。關于明石真人，見笠原芳光的《拒絕兵役的基督徒——明石真人的情況》（首次發表于《思想的科學》1970年10月號，之后收錄在“思想的科學研究會”編，《被湮沒的精神》）。有關明石順三與內村鑒三的關系，高阪薰在《明石順三與須磨浦圣書講堂——探索燈臺社創設前后之謎》（《思想的科學》1973年2月號）里，有詳細的描寫。太田雄三在《內村鑒三》（1977）談到內村鑒三的偉大之處，仍不忘描述他對其他基督教徒屢屢顯示的狹隘心理。關于與燈臺社同時遭到打壓的基督教教派——圣教會，可參閱米田豐與高山慶喜合著的《昭和的宗教鎮壓——戰時圣教會受難記》（1964）。本書并未指出當事人的姓名，只說圣教會遭到打壓的原因是：“北海道的一名青年牧師，在神社問題上因為言行偏激，遂遭人檢舉，拘留期間自殺身亡。”有關這名青年的事情，可參閱坂本幸四郎的《小山宗右副牧師的自殺》（《思想的科學》1969年12月號、1970年1月號）。在同志社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的《戰爭時期的抵抗》全2卷（1968-1969）中，對宗教人士于戰爭時期如何抵抗當局的打壓有翔實的記載。

[[11]](#_11_8)阿部知二在《良心拒服兵役的思想》（1969）書中，舉出日本近代史上為數不少拒服兵役的事例，例如日俄戰爭時的矢部喜好，太平洋戰爭時的村本一生、淺見仙作、政池仁等。其他，還有戰爭時期翻譯塞爾瑪·拉格洛夫（Selma Lagerlof）的小說《耶路撒冷》（Jerusalem）的石賀修。

[[12]](#_12_8)島根清的《新興佛教青年同盟——妹尾義郎》（“思想的科學研究會”編，《共同研究·轉向》上卷，1959），是最早論及妹尾義郎轉向的文章。當時，妹尾義郎尚在，對該文章頗為不滿。其后，有稻垣真美根據更廣泛的調查所著的《背負著佛陀向街頭——妹尾義郎的新興佛教青年同盟》（1974）和林靈法《奮戰的新興佛教青年同盟》（《現代思想與佛教的立場》，1962）。妹尾義郎死后，由妹尾鐵太郎與稻垣真美合編，中濃教篤解說的《妹尾義郎日記》全7卷（1974-1975）出版。

[[13]](#_13_8)柳宗悅于1931年至1951年所發行的雜志《工藝》，充分展現出民藝運動對戰爭的態度。柳宗悅從十五年戰爭開始的1931年到1933年，與壽岳文章共同編輯發行雜志《布萊克與惠特曼》。雖然為期短暫，但從編集后記中可以看出柳宗悅對“九一八事變”直言不諱的批判。收錄在《柳宗悅全集》（1980-1982）的文章中，有關朝鮮與沖繩的部分，反映出柳宗悅對十五年戰爭時期的基本思想。

[[14]](#_14_6)牧口常三郎（1871-1944）構思以康德哲學為思想體系，和以日蓮正宗為宗教觀的教育思想來推展運動，但在戰爭期間遭到打壓，死于獄中。其弟子戶田城圣繼承牧口常三郎的思想，使這一思想運動在戰后大為發展。《牧口常三郎全集》全8卷（1981-1982）。

[[15]](#_15_2)大本七十年史編纂會編《大本七十年史》全2卷（1964）。關于“人之道”，可參閱池田昭編，《人之道教團不敬事件相關資料集成》（1977）。大西愛治郎（1881-1958）率領的“本道教”（原天理本道）于1928年和1938年二度遭到打壓，盡管許多人被捕或長年身陷獄中，仍貫徹其信仰。村上重良《本道教不敬事件——與天皇制對決的民間宗教》（1974）。

[[16]](#_16_2)吉本隆明，《轉向論》，收于《藝術的抵抗與挫折》（1959）。

[[17]](#_17_2)ぬやまひろし（野山廣）是西澤隆二（1903-1976）的筆名。在獄中遇到日本戰敗投降，為共產黨中央委員。1966年被開除黨籍，以ぬやまひろし之名發表詩集《編笠》（1946）而廣為人知。與他有深交的司馬遼太郎曾在小說《每個人的足音》（1981）中，對他多所著墨。

[[18]](#_18)這句話顯示出村本一生與教條主義毫無關系和自在生活的處境。

# 七 日本之中的朝鮮

1979年10月25日

通過日本人對朝鮮人的態度，我們可以將日本人的思想放在一種“分光儀”中加以分析。這跟區分或右或左的政治思想不同，它可以呈現出各種想法。前文曾稍提及，日本政府試圖把文明強加于朝鮮，這里所謂的文明是指“西化”。早在1875年，明治維新政府成立八年后，當時日本的右翼和左翼兩派就有把文明強加于朝鮮的想法。

1884年，自由民權運動的兩位偉大領導者——后藤象二郎和板垣退助，計劃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朝鮮傳統主義者的統治。后藤夢想成為朝鮮的總理大臣。這項計劃最后被日本政府得知，日本政府自行采取自由民權運動者的構想，著手進行類似的計劃，卻因中國派遣軍的干涉而瓦解。1885年，自由民權運動左派領導者大井憲太郎計劃以暴力推翻墨守傳統立場的朝鮮政府，這項行動被稱為“大阪事件”，在付諸行動前即被日本警方鎮壓下來。之所以稱作大阪事件，是因為當時執行總部設在大阪。

在這個時代，所謂文明階梯的思想，在日本國內對政治有興趣的人的想象中，時常作為一種實體的觀念發揮著作用。參加政治活動的人——不管是右翼還是左翼都相信，要強制朝鮮進一步登上文明的階梯，就算使用暴力亦未嘗不可。這是基于他們政治上篤定的信念。

盡管“大阪事件”失敗，但強迫朝鮮接受文明的思想并未因此停止。其他類似的計劃仍持續進行著。樽井藤吉擬出一個構想——把日本和朝鮮合并為一，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具有新名稱的新國家。[[1]](#_1_13)這個想法在1910年由日本政府付諸實行，卻不是建立在樽井所夢想的平等基礎上，最后，日本并吞了朝鮮國。

日本政府采取“日韓合并”的行動，對日本人和朝鮮人帶來如何嚴峻的結果，當時對此進行深思的日本人為數不多，詩人石川啄木（1886-1912）是少數其中之一。他在朝鮮國滅亡那天寫了一首哀悼的短詩（短歌）[[2]](#_2_13)，同時，他也寫評論，批判日本的自然主義文學只著重刻繪日本人私生活的細節。他又說，如果自然主義文學家有勇氣描寫日本人的生活，就應該描寫國家使日本人的自由窒息的事實。明治時代即將結束的1911年，發生所謂的“大逆事件”，被視為涉案的諸多嫌疑者還包括當時具有領導地位的知識分子，其中有人被冠上意圖暗殺天皇的罪名，而被處以死刑。石川啄木受到這次事件的沖擊，在日記中留下對此事的批判文字。

對于當時歐洲最新的文藝思潮輸入日本，所形成日本式的自然主義，石川啄木所提出的批評，在當時《中央公論》的編輯木佐木勝的日記中，可得到精彩的例證。

關于以小說《棉被》在日本掀起自然主義文學運動的田山花袋（1871-1930），木佐木勝在日記中留下這段插曲[[3]](#_3_13)：當時田山花袋已經是一位年屆中年的著名小說家，但1923年關東大地震時，他聽信朝鮮人在附近的井里下毒的謠言，便去追打朝鮮人，并夸示自己的體魄。這種不負責任的流言，卻獲得軍隊及官員的推波助瀾，在1923年9月1日的關東大地震之后廣為流傳，遍及東京和橫濱。當時有6000名朝鮮人未經審判，即被自愿擔任民警隊的民眾組織、警察和軍隊當街殺死。做出犯行的群眾，雖然有少數在事后遭到警方逮捕，但大都只經過形式上的調查，即以證據不足的理由予以釋放。

然而，當時發出抗議之聲的日本人少之又少，例如后來當了演員及表演者的千田是也（1904-1994）。他曾當街被民警隊誤認為是朝鮮人，在險遭殺害之際，剛好有鄰居經過，證明他是日本人，才得以保住性命。從那之后，除了千田是也的本名，他又給自己取名為“千馱谷的朝鮮人”[[4]](#_4_13)，沿用至今。千馱谷就是他被誤認為朝鮮人，而險遭殺害的地方。盡管如此，他接受了自己被誤認為朝鮮人的角色，并成為他日后長期推動政治與藝術活動的力量。

若稍微追溯日本與朝鮮的關系可以發現，日本在德川時代曾有禮尊敬地迎接朝鮮派往日本的使節團。朝鮮和日本雙方對于所謂的“教養”，是以使用中國漢字，寫出中國式散文和詩詞的能力作為衡量。由于朝鮮使節在這方面的能力遠勝日本的知識分子，因而獲得很高的評價。不過，到德川時代接近尾聲時，日本與朝鮮的正式交流中斷了。

明治新政府成立之際，日本人對待朝鮮人的態度可以說尚屬中立。后來，向往文明的熱情攫住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時代來臨，日本人從此看不起朝鮮人。

作為帝國主義國家興起的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后，取得臺灣；日俄戰爭后，取得庫頁島，又獲得滿洲和中國東北部的鐵路使用權，接著吞并了朝鮮。在這個過程中，日本人輕蔑朝鮮人的傾向愈加強烈。日韓合并后，日本的商人大舉前往朝鮮，從脅迫、放高利貸到欺詐等手段，用盡各種方法，將土地據為己有。許多朝鮮人失去了土地，加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的工業急速發展，增加了許多工作機會，他們便前往日本謀取工作。1921年到1931年的十年間，大約有40萬朝鮮人移居日本。即便在1923年發生關東大地震之后，日本人大量殘殺朝鮮人，仍沒有阻止這股移工潮[[5]](#_5_13)，因為這種大舉移居正是朝鮮人所深切需要的。他們用外國腔調講簡單的日語，只為賺取低廉的工資；換句話說，當這類朝鮮勞工出現在日本時，更加深了日本人原本就輕蔑朝鮮人的態度。

無論是十五年戰爭之前或之后，在日本人所做的調查中顯示出，日本人始終把朝鮮人置于全世界民族中的最低位置。在日本文學中，明治時代以后的小說中紛紛出現非日本人的人物。在這些小說中，朝鮮人極少扮演重要的角色。所謂明治維新以后的日本近代文學，還包括大正民主思潮時代，至昭和時期十五年戰爭結束為止。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戰后文學中，出現了許多以朝鮮人為出場人物的重要小說。撰寫這類作品的不乏日本著名的小說家，比如松本清張、司馬遼太郎、開高健、井上靖、大江健三郎、小田實、小松左京和井上光晴等。從明治以后到戰爭結束，日本文學家對世界各民族抱持的價值意識，經過戰爭后可說是分崩離析。

在日本的小說史中最能表現這種價值意識轉變的作品，為田中英光（1913-1949）在1948年發表的《醉鬼船》，這部作品是根據作者在戰爭時期的親身體驗所寫成。當我們把目光投向這部小說的歷史背景時，正如前述，日本人無法停止始于1931年沒有宣戰的戰爭。于是，投入戰爭所需的勞工愈感匱乏。此時，政府即考慮以朝鮮人來彌補勞力的不足。1939年，日本政府內務次官與厚生次官聯名發表將朝鮮勞工移居日本的計劃。根據這項計劃，預計把8.5萬名勞工移到日本。這項計劃是在1939年7月擬定的，同年9月起，即開始強制朝鮮勞工集體遷移到日本。

1941年12月8日，公開宣戰的戰爭爆發后，日本政府便擬定比1939年構想更大的強制移居朝鮮人的計劃，這是因為日本戰敗需要引進更多的朝鮮勞工。樸慶植的《強制征召朝鮮人的記錄》（1965），是一本在戰后調查并記錄如何召集朝鮮勞工，及其往后境遇最可靠的書。之后，樸慶植又完成《在日朝鮮人運動史》（1979）一書。這本書指出，戰爭期間，被日本強行帶走的朝鮮勞工多達150萬人。日本政府把其中60萬人派至礦坑，40萬人分至軍需工廠，30萬人派至土木建筑業，15萬人分到礦山，5萬人派往碼頭當搬運工。除了這些從朝鮮被強制遷往日本本土的朝鮮人之外，又有37萬朝鮮人被日軍用做軍中職工和士兵。另外，還有數萬名朝鮮女性被迫擔任軍隊的“慰安婦”。[[6]](#_6_13)

朝鮮勞工總是被迫從事最艱難的工作，他們的工作時間長達十二至二十四小時，工資卻只有從事同種工作的日本勞工的一半。他們當然會計劃逃亡。為了把他們留置在分配的工作場所，警方會協助企業進行監督。根據樸慶植的推斷，1940年至1945年之間，在日朝鮮勞工遭遇的事故就有30萬件，其中死亡者高達6萬人。

在言論界方面，也如同產業領域般并行推展著，政府從1942年起召開三次“大東亞文學者會議”。[[7]](#_7_13)第一次會議中，正式使用的語言是日語，而且僅限于使用日語，亦不翻譯成日語以外的語言。對朝鮮人來說，這并不意外，因為日本吞并朝鮮以來，朝鮮人已經被剝奪使用母語。在朝鮮的學校里，日語成為正式的教材。1939年，也就是“九一八事變”八年后，對美、英宣戰的前兩年，日本政府下令規定，要所有的朝鮮人改用日本姓名，這項法律在1940年2月實施。著名的朝鮮作家們都用他們新的日本姓名發表作品，這些著作都是依據被日本強迫“轉向”的思想，用日語寫成的。

田中英光是以日本劃船選手的身份，參加1932年洛杉磯奧林匹克運動會之后，才廣為人知的。當時，他是早稻田大學政經學院的學生。他在學生時代與其兄長同為共產主義運動的支持者而從事活動，但隨著十五年戰爭的進行逐漸退出共產黨的活動。《奧林匹斯之果》是描寫1932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紀實小說，田中英光就是以這本書作為新進作家成名的。由于他是“橫濱橡膠”公司的員工且住在朝鮮，因此日本政府起用他擔任“大東亞文學者會議”組織朝鮮作家的工作。小說《醉鬼船》是他描寫“大東亞文學者會議”的第一部文學作品。[[8]](#_8_11)小說這樣描寫：主角的口袋塞滿厚厚的鈔票，和他的老同學在朝鮮的首都四處閑逛。他曾經跟這個老朋友一起從事左翼的地下運動。后來，他們雖然一同“轉向”，但為了證明自己還有反抗權力的勇氣，居然借醉打賭，走進派出所，在基層警員的坐墊上小便。想起這件陳年往事時，主角挑釁朋友說：“像你這么沒種的人，一定不敢在這廣場的正中央大便吧！”這時，老友竟借著醉意，爬上京城里行人最多的廣場正中央的噴水臺，蹲在臺邊，脫下褲子拉出大便后，還半舉屁股一邊用力拍打一邊大聲喊著：“喂，日本人就在這里！日本國王，你來吃我的屁股啊！”可是，那些仗勢酒醉獲得的勇氣乍然消失了。現在，他只是一個屈從權力而“轉向”的可憐的懦夫。主角年輕時擁有的熾烈理想主義已然消失，眼下只不過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殖民地雇用的中年男子，閑暇之余到朝鮮的娼館消磨時間，現在則是因為遵從日本政府的囑托組織朝鮮作家，才得到這筆巨款。

在他們少年時讀過的教科書，有則故事說，從前有個勇敢的日本士兵和朝鮮人交戰被俘，但他始終不肯向朝鮮人泄露日本軍事行動的秘密，反而大聲喊道：“朝鮮王（其實是新羅王），來咬我的屁股吧！”因而被處死。現在，這部小說不但用全新的邏輯，還充分運用了日本文學關心糞尿的傳統。換句話說，日本知識分子坦露的屁股和拉下的糞便，正是這位作家有意借此表現日本人與朝鮮人關系的重要象征。在此之前，日本人不管是左翼或右翼都相信文明階梯的想法，但在觸及朝鮮和日本的關系時已經完全將之拋置一旁，過去看待朝鮮與日本的架構在此已經瓦解。而所謂日本人的新架構，是通過看待朝鮮人，以及與朝鮮人的關系中來建立的，意即他們如何為各自背負的重擔而苦惱，并借由這個重擔來審視彼此。日本人就是通過這個全新的架構，才習得對遠比日本人背負著更沉重負擔的朝鮮人表示敬意的。過去那種劃分先進國家和落后國家的差別在此被棄之不用了。這正是十五年戰爭帶給某些日本作家的影響。

就田中英光來說，由于自己從未回避曾經“轉向”的羞恥經歷，才得以理解同為被迫“轉向”的朝鮮作家的苦悶。此時，“轉向”成為結合這兩個民族作家的契機之一。

正如前述，日韓合并時，在日本只有少數人對此提出批判，詩人石川啄木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名激進的社會思想家。而在保守的文學家之中，柳宗悅（1889-1961）是少數明顯關心韓國問題的人。[[9]](#_9_11)柳宗悅起先受到來自英國的年輕陶藝家伯納德·利奇的影響，開始迷上朝鮮李朝時代（1392-1910）的陶瓷器。朝鮮的陶瓷是三百年前左右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時，由他的部將帶回日本的，后來在茶道上獲得很高的評價。柳宗悅注意到，其實日本茶道中著名的器皿，在朝鮮原本是日常雜器，都是由無名的陶工制作的。于是，他回過頭來看日本，對自己提出一個疑問：日本傳統中是否也有同樣優秀的工藝？這股探究的風潮，旋即被稱為“民藝運動”，后來更促成日本工藝復興的動力。

在前述的脈絡中，重點是柳宗悅因為熱愛朝鮮的工藝，于是對日本政府采取破壞朝鮮民族文化的政策，明顯表示抗議。對于日本政府在1919年毫不留情地鎮壓朝鮮獨立運動的示威游行，柳宗悅也寫過幾篇隨筆加以抗議。同時為了表示某些日本人對日本政策的愧憾之情，他甚至對外募款，呼吁將散落日本各地的朝鮮藝術作品帶回朝鮮，試圖在1924年以“朝鮮民族美術館”的名義公開展覽。

他謹慎地把自己的批評限于工藝和美術的領域，沒有直接對政治本身提出批判。然而，日本吞并朝鮮后，盡管已經過了一二十年，他并沒有屈服于這個既成事實，仍不改把日本與朝鮮寫成“兩個國家”的作風。在他所身處的集體轉向時代里，這種一貫的態度是極為罕見的。根據歷史學家內藤湖南的看法，正當政府代表與國家主義者高唱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寶的許多文物，代表日本文化的優越性時，柳宗悅卻勇敢地拂逆這股風潮；內藤湖南還指出，若虛心觀察可以發現，其實，日本指定的那些國寶文物，都是移居日本的朝鮮手藝人留下的作品。

興起于20世紀30年代的極端國家主義風潮倡言：純粹無瑕的日本民族自古就存在，其祖先乃是從天上降下的，此純種民族創造出的優異藝術作品，已代代留傳至今。綜觀柳宗悅的批評活動，他總是對日本文化這種極端的國家主義風潮，表現出鮮明的抗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時候，日本本土有200萬朝鮮人。跟隨占領軍來到日本的愛德華·瓦格納（Edward Wagner），后來寫了一本書，題為《日本的朝鮮少數民族：1904-1950》（1951）。他在書中指出，當時的占領軍并未收到針對居住在日本的朝鮮人的詳細指令。[[10]](#_10_11)因為華盛頓的美國政府只專注在如何處置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對居住在日本的朝鮮人反而疏于研究。由于沒有詳細的指示，占領軍便協助居住在日本的朝鮮人返回朝鮮。進行這項工作時，占領軍雖然要求日本官員注意民主主義與反對歧視的原則，但這只是就整體原則而言，所有的細節全交由日本官員處理。因此，反而造成日本官員用投降前的相同方式來對待朝鮮人。

當時，朝鮮人大都希望回到他們出生的國家。然而，在這時候，他們的祖國卻分成南北兩邊，并被不同政治思想的外國勢力所支配。祖國分裂的情勢成了許多在日朝鮮人不積極返國的理由之一。另一種理由是，他們若要重返祖國，就必須幾乎空手而回。更詳細地說，他們獲準帶回去的金額，只限1000日元。也就是說，他們必須把這些年在日本艱困環境下工作賺取的所有財產留在日本，才能返回故鄉。

到1946年12月1日之前，日本政府遣送朝鮮人回國的計劃已經結束。經過若干年后，雖然又遣返一批朝鮮人回去，但當時大致已經停止。現今，大約還有60萬朝鮮人留在日本。其中大多數屬于在日朝鮮人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他們在日本出生、長大，在日語的環境中接受教育。根據各種調查顯示，日本人現在仍對在日朝鮮人抱持偏見，日本企業雇用他們的機會也受到這種歧視待遇的制約，與日本人通婚的機會也受到同樣偏見的阻礙。生活在這種環境下的在日朝鮮人，一方面理解具有日本人身份所過的生活，同時也基于這個理解，培養出批判日本的觀點。但正因為這種觀點，盡管在日朝鮮人的人數比起在日日本人要少得多，他們對日本文學的貢獻卻很大。更嚴謹地說，這貢獻對于日語書寫的文學而言，不但提高了日本文學的品質，還展示出議題的深度。

金時鐘出版過兩本長篇敘事詩[[11]](#_11_11)，其中一本以《新潟》為題，這是取自在日朝鮮人告別留在日本的親友們，返回祖國時的港口名稱一。另本以《豬飼野詩集》為題，描寫群居在大阪市里的在日朝鮮人，雖然住在日本，但仍堅守自己的民族習慣生活著。若說明治維新以來至今一百一十年間用日語書寫的詩歌，只有這兩本長詩，并非言過其實。例如，在更早以前有白樺派詩人千家元麿所寫的長詩《從前的家》，雖然是優秀的作品，但未能完成。至于日語長詩的寫作為何是由在日朝鮮詩人完成的，在我看來，這是因為住在日本的日本人，往往把興趣投注到當地社會生活的細微部分，而在日朝鮮人卻在日本社會中備受排擠和壓迫，反而能培養出審視日本整體社會的觀點。換句話說，他們若不去思考被帶到日本以后的歷史，就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待在這里；他們若不追溯從前的歷史，也就無法了解為什么受到日本人的歧視。由此看來，他們已經學會通過歷史的視野觀察現在的日常生活。另一個理由，也可能是在日朝鮮人所寫的日語詩作中，早已受到朝鮮故事詩的影響。日本人原本就沒有這種故事詩的傳統。明治時代的優秀文學家中，勘助（1885-1965）曾經努力想創作長詩，最后卻得出日語不可能寫出長詩的結論，后來轉而朝向寫作童話式的故事。正如前述，比他年輕一輩的千家元麿的長詩《從前的家》，就是受到俄國普希金的《葉甫蓋尼·奧涅金》（Eugene Onegin）的影響寫成的。《從前的家》這首詩把他明治初年的故鄉風景點描如畫，而且趣意盎然，可惜未能完成。

金達壽在1958年完成中篇小說《樸達的審判》[[12]](#_12_11)，小說的主角是韓國的勞工，戰敗后不久[[13]](#_13_11)，他因到處張貼批評當時專制政府的海報而被捕。每次被捕，他便當場后悔哭喊，保證以后不會再犯，而獲得釋放。后來，又做相同的行徑，被逮捕，又同樣哭著懺悔，再獲得釋放，就這樣接連上演同樣的舉措。警察每次逮捕他時，都投以輕蔑的眼光。之所以持續重犯故錯，是為了招惹輕蔑他生活態度的警察。在日朝鮮人金達壽寫這部小說的用意，在于批判日本知識分子在“轉向”看法上的硬直姿態和僵化形式。在金達壽看來，日本知識分子僵化的轉向觀，是明治以前武士階級文化的不幸遺產。明治以后的文化，由于以前武士階級的德目擴展到整個日本國民，奪走了日本人民原有的彈性活力。金達壽八歲時移居日本，從小學時開始，就以撿破爛等工作養活家人，由他做出批判應有其說服力。

高史明是另一位朝鮮小說家，他出生于日本，父母是來自朝鮮的移居者。他所寫的自傳式長篇隨筆《生存的意義》在1975年出版。[[14]](#_14_9)在這本書里提到，要上日本的小學時，高史明用已是小學生的哥哥幫他所取的日本名字開始上學，他經由讀寫的教化而變成日本人，漸漸地將日本政府的立場與自己合為一體來思考事情。因此，日本政府在1945年投降時，他也茫然若失了。從這時候起，父親究竟如何生存下來的意象，才逐漸在他心中以新的意義浮現出來。高史明的父親是碼頭工人，和同樣來自朝鮮的碼頭工人一起工作。所以對他來說，學會日語在工作上是沒有必要的。而在家里，他也只說朝鮮話，吃自己烹煮的朝鮮菜度三餐。因為妻子早逝，為了養育年幼的兒子，他必須負擔所有的家務。兒子們上小學時，因為口中常有大蒜的臭味而覺得難為情，所以向父親訴苦，要求不要用大蒜做菜，父親因而生氣地說：“朝鮮人吃朝鮮食物有什么不對？”不過，父親并沒有發覺兒子自行決定采用日本名字。他對于日本政府制定的法律——朝鮮人必須放棄朝鮮人的姓名而改成日本姓名——幾乎一無所知。他只懂得在職場跟在日朝鮮人的勞工同伴一起生活，在家里與年幼的兒子一起生活，一成不變地守著朝鮮人的生活方式。他總是叫自己的次子，也就是這本書的作者“裘睦尚、裘睦尚”。這是兒子出生時，他為兒子取的名字，他一輩子都叫兒子這個名字。而在戰爭結束后的混亂中，高史明才逐漸明白其中的意義——父親是在何等艱困中生存下來的？在不停叫自己的兒子“裘睦尚”之中到底包含什么意義？“裘睦尚”只是一句簡單的詞匯，但這個詞匯中，卻有日本政府通過軍國主義的十五年戰爭，也無法打破的某種態度和觀念。高史明的《生存的意義》是“非轉向”的一個實例，這種“非轉向”根植于在日朝鮮勞工在日本社會中的生活處境，以及他們所屬的階級和民族意識。

[[1]](#_1_12) 地名，位于東京都內。

[[2]](#_2_12) 指朝鮮戰爭（1950-1953）。——編注

[[3]](#_3_12)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1893）。樽井藤吉的生卒年為1850-1922年。

[[4]](#_4_12)地圖上朝鮮國一片漆黑。涂著墨，聽著秋風。日本并吞朝鮮后，石川啄木寫了很多短歌，其中這首短歌最為杰出。日本文學有必要正視此作品的重要性。石川啄木在同時期撰寫評論《時代閉塞的現狀》（1910），主張日本自然主義文學應該正視勒住自我咽喉的國家實態。

[[5]](#_5_12)木佐木勝，《木佐木日記》（1965）。

[[6]](#_6_12)1923年9月1日，關東大地震之后，在東京與神奈川被日本人殺死的朝鮮人，共有6415人。這項調查是由當時上海的朝鮮獨立運動機關刊物《獨立新聞》社長全承學潛入東京，與李鐵、樸思稷、閔錫鉉、李昌根、崔承芳、李茂根等留學生10余人共同調查到11月底得出的數據。吉野作造獲得赤松克麿的協助，調查到10月底，得知有2711名朝鮮人遇害。見姜德相，《關東大地震》（1975）。

[[7]](#_7_12)樸慶植，《強制征召朝鮮人的記錄》，（1965）。

[[8]](#_8_10)尾崎秀樹（尾崎秀實之弟），《大東亞文學者大會》（《舊殖民地文學的研究》，1971）。

[[9]](#_9_10)要廣泛掌握日本近代文學中出現的朝鮮人形象的作品，可參見樸春日，《近代日本的朝鮮觀》（1969）。其后，有高崎隆治《從文學看日本人的朝鮮人觀──〈朝鮮歌集〉的貧乏》（《三千里》25，1981年2月）。這篇文章顯示出戰爭期間日本人撰寫關于朝鮮人的文章還有選擇的空間。

[[10]](#_10_10)柳宗悅認為，朝鮮人喜好白色與朝鮮藝術的線條之美，正是朝鮮人悲哀的表現。朝鮮人本身對柳宗悅論點的批評，見崔夏林的《柳宗悅的韓國美術觀》（此文為崔夏林為柳宗悅撰寫，李大源翻譯的《韓國與其藝術》一書所寫的解說）、金達壽的《關于朝鮮文化》（《巖波講座——哲學》第13卷《文化》，1968年8月），還有金潤珠、文明大、金勇、金兩基發表的談話。高崎宗司的《柳宗悅與朝鮮》（《朝鮮史叢》1，1979年6月）廣泛綜覽過去韓國人批判柳宗悅的朝鮮論后，為柳宗悅的著作重新定位。李進熙的《李朝之美與柳宗悅》（《三千里》13，1975年2月），除了批判柳宗悅的疏漏之處，還指出柳宗悅試圖修正初期著作中的見解所做的努力。

[[11]](#_11_10)愛德華·威利特·瓦格納，《日本的朝鮮少數民族：1904-1950》（原著：1951；日譯本：1975）。

[[12]](#_12_10)金時鐘，《新潟》（1970年）、《豬飼野詩集》（1978）。

[[13]](#_13_10)金達壽，《樸達的審判》（1959）。

[[14]](#_14_8)高史明，《生存的意義》（1975）。

# 八 以“非斯大林化”為目標

1979年11月1日

對向來把文明階梯視為一個實體的日本人而言，1917年11月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為他們的想象力帶來很大的刺激。這個刺激，通過東大新人會的組織，擴及日本全國的知識分子，和以準知識分子自居的年輕族群。創立于1919年的國際共產黨，在1920年之后，開始與日本的左翼運動進行接觸。日本共產黨成立于1922年，在創黨黨員當中，包括了前一時代各種傾向的社會主義者，比如在日俄戰爭中高唱反戰者，或是僥幸逃過“大逆事件”牽連的幸存者。然而，他們力主折中式的社會主義，以及源自個人體驗的思考方式，遭到了年輕大學生們的輕視。因為這些大學生直接承襲西方文明中最進步國家的思想，而這些國家正邁向社會主義。許多日本新世代的社會主義理論家，都跟隨蘇聯的做法，從一般理論出發對現狀做出結論。他們向當時的日本提出一種見解：蘇聯是個必然依據理論邏輯發展的國家，且是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唯一祖國和代表完美社會的國家。即使在其后發生審判革命運動的事件中，初期的幾名領導者，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拉狄克和季諾維耶夫等，這些社會主義理論家不僅輕率地做出蘇聯政府的處置是正確的結論，而且對這審判沒有任何質疑，更沒有在日本形成討論。

日本共產黨創立之初，其領導者山川均（1880-1958），是經歷過“大逆事件”，并勠力從事社會主義運動的幸存者之一。他提出忠告：日本的左翼知識分子必須對勞工階級每天為掙取生存糧食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更大的同情，而且必須和他們結合起來。不過這個觀點，卻遭到剛返抵國門不久的福本和夫（1894-1983）反駁，他是代表新時代留學德國，并用原文學習共產主義理論的年輕教授。福本和夫在解釋列寧主義時指出，精英知識階層首先要從群眾中抽離出來，再以激進知識分子的身份徹底武裝理論，才是左翼群眾運動與知識分子進行大團結之前的必要條件。福本提出“先離后合”的組織論，在當時信奉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之間獲得勝利，而成為日本共產黨創立初期深具指導性的理論家。但是后來，共產國際常駐莫斯科的領導者們將包括福本在內當時的一些領導者召到莫斯科，除了否定福本的理論，并送交“1927年綱領”（27年テーゼ），指示日本共產黨以此作為行動方針。“1927年綱領”指出，當前的日本仍處于絕對主義的半封建天皇制之下，農村地區還殘存著半封建的地主與佃農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日本直接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機會尚未成熟。而首先必須推動的是，以工人和農民為主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革命，借由這個革命，來實現天皇制的廢除和封建地主制的解體。這個觀點，在“1932年綱領”（32年テーゼ）中更加明確。這些在莫斯科起草的方針，因而成為日本共產黨行動戰略的基礎。但依循這種不妥協的主張，以徹底廢除天皇制為目的而展開的忠實斗爭，卻招致日本共產黨至1935年為止，短促而幾近毀滅的結果。當時，日本革命的方針吸引許多熱情的日本青年，盡管面對警察的脅迫，他們仍舊毫無私心地全力以赴，其中更不乏為堅持理想不惜犧牲性命的年輕一代。

1931年日本開始侵略中國，兩年后，發生了日本共產黨支持者集體轉向的事件。有黨員要求，要守護日本共產黨這面旗幟，需要無比的勇氣和長期的堅持抗爭。因此有十幾人寧愿忍受漫長的牢獄生涯，有幾個人死在獄中，也有殘存到戰爭結束的。這些黨員，無視于日本政府十五年來所做的軍國主義宣傳，仍舊忠誠地信奉著蘇聯共產國際起草的“綱領是科學”的真理，更遑論對共產國際總部指示的方針做出質疑或批判了。當時，脫離日本共產黨的成員在“轉向”的時候，至少已經認識到，共產國際所做的方針，對在日活動的了解不夠充分。而這種“認識”，在他們轉向時起了很大的作用。

擔任過日本共產黨委員長的佐野學（1892-1953）在轉向聲明中批判日本共產黨對共產國際的盲從，并呼吁日本應該在天皇之下，建立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一國新政黨。當時，他對日本共產黨應從共產國際的指令中解放所做的批判，極具說服力。在意大利和法國，脫離蘇聯的指示，基于獨立判斷的社會主義理論非常盛行，其對興起的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所做的批判，正是依據這個理論展開的。相反，僅從理論架構來看，佐野學在日本提倡的一國社會主義，有點類似斯大林所提倡的。但現今回顧起來，他顯然是在呼吁日共，在擺脫共產國際的同時，要停止對天皇政府的批判。相對于克服擺脫蘇聯政府的判斷，持續進行獨立批判的課題而言，佐野學及其后的黨派，在1933年的轉向聲明之后，已經無力回應日本當時逐漸抬頭的軍國主義了。

以下試舉埴谷雄高（1910-1997）為例。他在佐野學等人入獄之后，由于黨內沒有年長的黨員，因此年僅二十歲便被送上日本共產黨領導者的寶座。然而，他的轉向又與佐野等展現出不同的軌跡。埴谷是1933年繼佐野學之后，在獄中轉向的共產黨員。雖然檢察官在他面前撰寫審訊的筆錄，但他卻看見自己的所思所言與眼前的原資料截然不同了。同時，他發現自己正掉進由檢察官制作的代表日本政府的正式記錄，和由獄外的領導者們制作的日共正式記錄的裂縫中。他自覺到自己已被逐出正式的歷史記述，也驚覺除了他之外，肯定有更多不幸的人，同樣在不為人知的狀況下死去。他自問：難道我不能用這份自覺來寫作嗎？對他而言，這種自覺成了一種希望，他就是倚靠這絲希望在漫長的戰爭歲月中存活下來的。在這期間，他當過財經相關的小型雜志的編輯，有時候也靠翻譯各種書籍和報道來維持生計。

盡管埴谷雄高作為一個受到戰爭影響、默默無聞的日本人過著世俗生活，但他把自己分成兩種角色，過著雙重的生活：也就是他讓一個自己停留在轉向的時間點上，努力盯住他所看到的事物；另外一個自己則是作為一名平凡的勞動者。日本投降之后，埴谷和戰爭時他頗為信任的六個朋友，于1945年年底創辦了一份同人雜志——《近代文學》。這本雜志，對戰后日本人思維方式的形成，影響甚巨。[[1]](#_1_15)

戰爭期間，埴谷除了翻譯之外，僅發表過兩部作品。一篇是發表于1939年的幻想小說《洞窟》，另一篇則是以《Credo Quia Absurdum——因為不合理，所以我相信》為題的格言集。[[2]](#_2_15)這些令人費解的作品，早就隱含在他定為畢生之作的長篇小說——《死靈》的主題中。1946年起，《死靈》以連載的形式發表，尚未完成時，作者自己卻說：“我想大概不會完成吧。”這部小說，既不是描寫歷史上的特定人物，也不是刻繪地球上的特定場所。小說是埴谷在獄中構想的創意，但這純粹是幻想之作，而不是以一種合理的社會哲學與社會思想體系，或者對現代史中某一事實的記述，努力地提出作者的看法。盡管這部小說表面上是采取空想之作的形式，但同時也是從一個獄中之人的立場，對日本共產黨及斯大林統治下的俄國，采取毫不妥協的批判！

從表現的形式來看，《死靈》是否可稱為小說仍有爭議，就算把它視為小說，也無關乎歷史上的任何事實或人物。然而這部小說，卻有1934年日本共產黨私刑事件[[3]](#_3_15)的烙印。[[4]](#_4_15)這起凌虐事件起因于：現任的日共委員長，懷疑當時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兩名成員涉嫌充當間諜，埴谷也從黨的立場，以同為中央委員會成員的身份出席，對兩人進行盤問。其中一名間諜涉嫌者，因為神經性休克在審問中猝死。另外一名間諜在戰后做證指出，當時他是被日本的特務警察送進日本共產黨內當臥底；而此人趁另一同伴之死引起混亂時，逃離了審訊的監禁場所。當時的報紙和警方通力合作，借著這次事件，大肆渲染共產主義的殘虐。約莫兩年前（1977年），民主社會黨議員在日本國會提案說，日本共產黨委員長曾參與1934年的私刑事件，應追究其責任，解除其國會議員的資格。現今的日本仍以這樣的態度關注當時的私刑事件，但埴谷的見解與此不同，他是從罹難者的立場來看這事件。在他看來，罹難者是在密室中受到同伴的訊問，因而猝死的。此外，埴谷也從被黨分配作為黨中央委員會成員情婦的女性的立場，來看待這個事件，而這個黨中央委員竟然是警方的密探！這名女性在遺書中說，她以身為密探的情婦深感羞恥，隨后就自殺了。埴谷把小說的重心放在可以聽見這些犧牲者聲音的暗盒中。這樣一來，當時在私刑現場，現在已成死者的主角，即可通過虛擬的電話裝置，和當時被逼上死路的叛徒之魂進行對話，并順便（用“順便”一詞有點唐突）與位于宇宙進程終點的終極物質交談。從這極點來看，黨的政治斗爭可視為唯一過渡時期的總和。在這個極點上，一切都已死亡，共產黨死了，往昔標榜行事正確的共產黨領導者也死了。若從這個觀點來看，政治活動的真諦，包括共產黨的政治活動在內，可以化約為如下簡單的呼聲：

他是敵人！

打倒敵人！

倘若有人抱持這種想法致力于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話，他一定會為共產黨挺身而出，對共產黨行將到來的滅亡謹記在心。如果他是共產黨的領導者，大概會為行將到來、勢必來臨的領導終結和作為領導者之死而努力吧。也只有抱持這種展望，他才能在共產黨的活動中充分應用約翰·阿克頓（John Acton，1834-1902）的名言：“一切的權力都會腐化，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腐化！”可惜在戰爭期間，只有少數人有此清醒的見解。在左翼運動的領導者中，有許多仿效佐野學轉向的知識分子，在脫離往昔信奉的斯大林主義之后，轉為推崇對中國、美國和英國推動圣戰的當今天皇[[5]](#_5_15)。反觀直到日本戰敗后仍堅守非轉向立場的共產黨員們，旋即受到日本整個社會的矚目，極大程度地影響著學生和積極投入左翼運動的年輕人。這個影響力不但深化到他們領導下的年輕族群，使其繼承十五年戰爭前，非轉向共產黨員即堅守不渝的想法，更把當時斯大林指導下共產國際的正確性信念，深植在年輕跟隨者的腦海中。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接班人赫魯曉夫在公開演說中透露，斯大林生前曾肅清過政治上的異己，埴谷雄高未被重視的觀點，這才開始得到理解。換句話說，許多對戰后舊左翼干部的領導感到幻滅的年輕一代，以及眾多即使深感幻滅仍不愿離開左翼陣營的日本青年們，開始感同身受地接受埴谷的見解了。

1960年，岸信介出任日本的內閣總理。岸信介是戰爭期間東條英機內閣的閣員之一，同時也是擬定先前提及的強迫朝鮮勞工移住日本，和強制勞動計劃的高官之一。這一年日本不再是對美宣戰，而是與美國重新簽署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軍事協定。當時，大批脫離日本共產黨的非共產黨系左翼學生們，對這項軍事協定進行了大規模的抗爭。這個時候，埴谷雄高的著作不僅比戰爭期間更受到青睞，甚至比批判斯大林時期吸引更多讀者。埴谷雄高和吉本隆明因而同被評為20世紀60年代以后，在日本極具影響力的新左翼先驅者。他們的見解不僅受到馬克思主義，也深受佛教和耆那教[[6]](#_6_15)的影響，因此可以將它視為一種虛無主義的思想。

眾所周知，“無的哲學”是由西田幾多郎（1870-1945）在日本所建構的。根據三木清（1897-1945）所說，西田幾多郎是日本最早建立自己的哲學體系，并躋身近代哲學史上的哲學家。但是在政治思想中，他代表著以“無的立場”美化天皇，而且進入戰爭時期之后，他更投身至崇拜天皇的洪流中。后來，甚至草擬日本充滿大東亞共榮圈思想而發動戰爭的相關文件。與此鮮明對照的是，即使在戰爭時期，埴谷雄高的虛無主義思想既未被崇拜天皇的潮流淹沒，也沒有在極端崇拜斯大林的思想中滅頂，可說是達到了徹底的虛無吧。這樣一來，埴谷雄高對戰后的日本左翼，其盲目崇拜、貫徹非轉向的少數日共領導者的作為，自然無法予以茍同。在戰后的日本，埴谷雄高將自己安置在共產黨的周邊，并采取與舊左翼共同奮戰的立場，但是他絕沒忘記自己擔任黨的領導者時，因判斷錯誤造成許多犧牲者的往事。他不斷地與共產黨的領導階層保持距離，繼續站在被區分為一般黨員的、為此付出勞動的群眾的立場。他堅信領導者不久終將消亡，更堅信因為這個因素，黨的領導者必須經常輪替。因此在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他的見解旋風般吸引著激進派的年輕學子們。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在左翼的團體中，即存在著對共產國際正確性的質疑。這種人在勞農派[[7]](#_7_15)系統的學者和運動組織者中不在少數。山川均就曾對當時日漸高漲的軍國主義，提出一貫的批判態度。他與主張通過新一代領導者的分合，借此凈化和純化激進派運動的理論相悖，而很早就脫離了共產黨。但是他仍堅守批判權力的立場，而在許多共產黨系統的領導者被關進牢獄，或轉向成為極端的軍國主義者之后，他仍主張不分黨派或學派，試圖組織反軍國主義的人民戰線。因此到了1937年，他和許多勞農派系及運動組織者，在中日戰爭方興未艾之際，通通被送進了監獄。

山川均在其生涯中，曾數度進出監獄。獲釋期間，他做生意維持生計，開過藥局、照相館，計劃開設印刷廠（但并未實現）。此外，他還做過酪農、代書（幫老顧客寫信）、廣告代理商、園藝，也開設養雞場出售雞蛋。他的生活方式和做法不同于比他稍晚出身自東大新人會系統的大部分左翼領導者。民俗學者柳田國男（1875-1962）提議，在明治維新以后，所有的日本國民都能過著在過去只占日本極少部分的武士階級的生活方式。左翼運動的領導者受到這種“武士化”主張的影響，但山川均依然堅持自己的信念，他終其一生都以經商為生。正如他在自傳《山川均自傳——一個平凡人的記錄》（1951）所取的標題一樣，他把自己視為一個平凡人，并以此自覺建立理想中的社會主義。山川均的兒子，后來當上東京大學的教授，為了幫助他的父親，賣過山川家養雞場的雞蛋，父親卻時常責罵他還未掌握商人之道！[[8]](#_8_13)

大河內一男（1905-1984）的情況與山川均有點類似，但又有顯著的差異。他承認戰爭時期的軍國主義有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也從效率不彰的觀點加以批判。大河內這種批判的角色，對日本政府相當有用，因此直到戰后他并未喪失在東京大學的地位。日本戰敗后，在經濟高度增長的20世紀60年代，他當上了東大的校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們兩人雖然同為經濟學者，他的經歷卻與山川均不同。

在戰爭時期，大河內是“生產力理論學派”最著名的理論家，其理論對日本政府深具影響力。有幾個在“九一八事變”之前的馬克思主義者加入了這個學派，他們從共產主義轉向之后，在“生產力理論”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這個學派主張在已知的條件下，在能力所及的范圍內重整合理的社會結構，并希望借此社會結構促進日本生產力的發展。此外，他們也在國家的各種活動領域中，嘗試提出最具體的政策性建議。[[9]](#_9_13)大河內說，這個概念是他在1931年撰寫《從概念構成看社會政策的變遷》一文時所得到的靈感。當時，他年僅二十六歲，擔任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的助教。約莫兩年后，他發表論文《有關勞動保護立法的理論》，進一步發展了這個概念。在這兩篇早期的論文中，大河內指出，在資本主義的國家，社會政策通常是依資本家的利益形成的。在資本主義最早的階段，資本家為了壓榨更多的勞動力，卻招致勞動力降低的結果。資本家自覺到這個弊端之后，轉而支持以保障勞動力為目的的法案。其后，資本家甚至開始部分地接受勞工為其權益發動的勞工運動。在這階段，社會政策主要以促進社會保障和產業穩定為主。這樣的社會政策在個別特定的情況下，會與資本的利益對立。然而，這些社會政策是整個資本主義經濟自覺性的展現，因此必須通過資本主義國家的力量，排除個別企業的反對才能付諸實行。正是這種見解，大河內及其生產力理論學派的學者們，才得以在戰爭時期批判日本政府。大河內被戰爭時期的政府延攬到委員會工作，他和同屬于生產力理論學派的學者們看到戰爭如何破壞社會的習慣，并使之合理化的情形。他們的分析和建言，雖然代表了大政翼贊會工作合理性的面向，但整體而言，這既是個推動侵略中國的組織，同時又是把日本推向與擁有龐大軍事力量的英、美國家爆發宿命般沖突的主因。

在這不久前，大河內一男擔任助教時的主任教授——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教授河合榮治郎，因為不肯放棄自由主義的立場，受到政府的壓迫不得不離開教職之際，擔任助教的大河內偕同幾名同事提出辭呈，抗議政府對這次事件的處置，但后來幾經慎重的考慮，又撤回辭呈。大河內這種前后不一的態度，被河合的弟子們斥為叛徒。盡管河合榮治郎的言論在戰爭時期遭到打壓，但他始終勇敢地奮戰到底，后來因為營養不良和甲狀腺亢進癥去世。大河內離開他的主任教授與恩師，守住東京帝國大學內的地位，可說是貫徹著一種特殊的生存方式，因為他以此反抗整個日本國民的武士化，而這正是綁住明治時代以后所有日本知識分子的生活方式！從這點來說，不能不說他與山川均頗為類似。他始終不超出理性主義，并且從中找到可以繼續批判戰時政策的路徑。就這個意義而言，他的學風不同于與戰時政府的軍國主義正面沖突的恩師河合榮治郎。對大河內而言，這條路徑就是偽裝轉向之路，它具有對抗戰時日本政府的軍國主義，又與之合作的雙重功能。有時在這種偽裝轉向中，起初只是虛與委蛇，后來卻不知不覺地成為真實的轉向。話說回來，有的雖說是要偽裝，但偽裝卻變成目的，最后陷入除了偽裝一無所有的狀態。[[10]](#_10_13)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有660萬日本人滯留在海外各地。從原日本殖民地的朝鮮、臺灣和非殖民地的南洋群島與英、美、荷蘭占領下的地區，以及中國等地回歸祖國的日本人，直到1947年才結束。然而，留在蘇聯領地內的60萬日本人卻長期不得回來。這60萬滯外未歸的日本人，在戰后日本人的精神上蒙上一層不安與焦慮。這種不安與焦慮，與戰前日本政府長期深植的，而戰后美國占領軍政府未予消除的恐共心理結合在一起，在戰后形成一種潮流。在此時期，也導致一名對蘇聯抱持苦悶情緒的哲學研究者的死亡。現今回顧起來，我們很難理解這個事件，不過，它忠實地反映出1947年至20世紀50年代間日本的社會心理。

當時有流言說，日本共產黨書記長德田球一要求蘇聯政府，若被留置在西伯利亞當俘虜的日本士兵不改信共產主義，就不要把他們遣送回國云云。1950年3月，大英帝國代表羅伯特·霍奇森（Robert Hodgson）在遠東委員會上提及此事說，如果這則流言屬實的話，德田球一的行為無異于背叛他的祖國，而且罪行重大。因此，英國代表要求占領軍最高指揮官麥克阿瑟對德田球一做出強硬處置。這些聲浪促使日本的國會議員在議會里成立特別委員會，調查德田球一是否涉及此案。

據稱，一名口譯員曾在西伯利亞的集中營，對日本俘虜傳達德田球一的聲明。后來，他從回歸者中被找出來，被帶到國會的公聽會上做證。這名口譯員叫作菅季治，當時三十三歲，曾在東京教育大學和京都大學念過哲學。1950年3月18日，菅季治在面對參議院特別委員會的質詢時，這樣回答：

有關德田〔球一〕的要求是否存在，我不能做任何評論。在這里，我只能表述當時我作為一名口譯員，我只敘述當時的事實而已。

時間是1949年9月15日，地點在卡拉干達（Karaganda）第九分所。（中略）有俘虜提問：我們什么時候可以回去？蘇聯政府宣稱11月之前要釋放日本人的聲明，對我們是否適用？在此之前，代理所長沙菲耶夫中尉對這些提問都會據實回答，但這回他卻沒有答復，只是對著坐在一旁的政治部軍官揚了揚下巴，示意他做出回答。這時候，政治部軍官葉爾馬拉耶夫中尉站了起來，予以回答。（俄語省略）根據我平常的口譯經驗，我相信直譯比較不會出錯，所以我記得是這樣翻譯的：“各位什么時候可以回去，全憑你們自己。當各位在這里真誠地勞動，成為真正的民主主義者的時候，你們就可以回去。日本共產黨書記長德田〔球一〕期望你們不是以反動分子的身份，而是以做過充分準備的民主主義者回國。”

以上是我根據當天的事實所做的陳述。

菅季治在眾議院聽證時，做了同樣的陳述。但是他的回答，未被隸屬于參、眾兩院特別委員會的多數議員們接受。因為若根據菅季治的回答，并不能構成共產黨書記長德田球一的犯罪事實，證據也不夠充分。他們逼問證人菅季治，問他是不是用“期望”一詞來淡化德田球一所寫的“要求”字眼？又進而逼問他，他是不是同情德田球一的共產黨員？有關那場公聽會，當時的報紙都做夸大的報道。這導致菅季治不時接到來自各地陌生的右翼分子的恐嚇信函。4月6日，菅季治投身電車自殺身亡。當時，他的口袋里還裝著柏拉圖《申辯篇》這本小書。在他死后，從其眾多的遺稿中，整理出版了《未被說出的真實》《人生的邏輯》《哲學的邏輯》。[[11]](#_11_13)

現在回顧起來，為什么僅憑一個從遠離日俄雙方中央政府的俘虜營選出的日籍口譯員，就可以對日本共產黨書記長是否曾向蘇聯總理斯大林提出“要求”一事，作為決定性的證據呢？現今看來，這顯然是不可能的。菅季治只不過是居中通譯一名蘇聯軍官的話而已。而這個陸軍士官在蘇聯政府體系中的地位也微乎其微。至于菅季治在第一次口譯時，是否使用“期望”或“要求”的措辭，并非重要得足以作為揭開事實真相的證據。當時，菅季治并沒有表明自己的政治思想立場來保護自己，卻堅守與政治思想無關的陳述事實細節的立場。然而，他的證詞沒有得到國會特別委員會議員們的接納。或許他太相信“真理可以超脫意識形態對立，真理終將被接受”這樣的信念吧。

菅季治被逼上死路的事實，充分反映出1950年蘇聯政府留置60萬日俘的做法，讓日本全國面臨的緊張狀態。在遭到蘇聯留置的60萬人之中，有幾名作家對馬克思主義產生共鳴。其中，高杉一郎（1908-2008）所寫的《在極光的陰影下》，以及長谷川四郎（1909-1987）的《西伯利亞故事》和《鶴》，這些書在戰后的日本被廣為閱讀，書中忠實地傳達出戰前日本左翼作家不能描寫的蘇聯生活實態。[[12]](#_12_13)

在任何一個社會，“監獄”都是了解當時社會狀況不可或缺的重要線索。政府所公布的數據往往夸大其詞，但那些不為人知的社會實態，卻是由描寫監獄的生活顯現出來的。高杉一郎既寫出負責看管俘虜勞役的官員們的狡猾，也刻繪出與上述截然不同的、俄國人善待日本俘虜的親切之情。讓讀者從中得知，其實在嚴酷的官僚制度之外，還存在著超越蘇聯體制的、超越時代藩籬的俄國人民。久待重返祖國的夢想實現時，據說，高杉一郎對他的同伴們說，我們回到日本之后，一定會懷念起在這里大排長龍等著打飯的日子吧。因為他相信，這種不需任何命令依然守秩序排隊的習慣，反映出日本仍缺乏平等精神。而在高杉一郎看來，這種平等精神已成為俄國社會生活的牢固基礎，同時他也堅信，這是革命帶給俄國的禮物。

在長谷川四郎的《西伯利亞故事》一書中，也出現過極為蠻橫的蘇聯政府官員。此外，長谷川還保留了一幅舊陸軍少校的精美肖像。他說，這個與蘇聯政府合作推動俘虜營民主化的日本軍官，當著自己的部下以及眾多日本俘虜面前，掏出天皇頒贈的勛章，扔在地上頻頻踐踏，極力斥罵這是反動時代的遺物云云。不過，根據他的發現，后來，這名軍官始終保有這枚勛章，并妥善地把它藏在行李箱的底層。在俘虜營制造出來的馬列主義，畢竟是速成制品，因此在他們踏上日本后的短期內便消失無蹤了。總之，日本共產黨書記長德田球一所說的是“期望”或“要求”，直到最后都沒有明確的結論。

石原吉郎（1915-1977）是戰后日本最值得矚目的詩人之一。他因為懂俄語而遭到逮捕，也是因為懂俄語的關系，被懷疑是間諜，進而被當成戰犯留在西伯利亞。他被軍事法庭判處無期徒刑。當時，那個官拜陸軍上校的老審判長匆匆念完判決書之后，迅即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拿起身邊的紙袋走出法庭。石原猜想，這個老人的太太大概吩咐他回家時在市場買點晚餐用的食材吧，以致他在宣讀判決書時也心不在焉，思緒早就飛散了。

石原被判無期徒刑以及后來被放出俘虜營都是在毫無根據下進行的。這是20世紀50年代斯大林死后發生的事。即便在當時，石原仍不清楚自己遭到判刑和獲釋的真正原因。他回到日本的時候，日本已從戰敗的打擊中恢復，正處于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日本人已經忘記戰爭的存在。石原的父母在他滯留西伯利亞期間已經去世。石原心想，他的兄弟和親戚們應該會理解：他和60萬同胞在這場魯莽的戰爭中，都是無辜遭到株連的犧牲者，理應得到同胞的慰藉才對。可是情況剛好相反，一個親戚長輩卻對他說：“你若是共產主義者，就不要進這個家門！”

在西伯利亞度過無依無靠的嚴酷歲月，以及看見日本人置身在極度繁榮中自我陶醉的情景，使石原突然成了一名詩人。當他聽到久未聞見的日本人的對話，他也用日語和他們交談。詩歌就是在這種經驗中，從他的心中迸涌而出的。他除了寫詩，還著有《對日常的強制》一書，書中對俘虜間彼此漠不關心但為求生存團結一致的共生經驗，有鮮明的描寫，此外，還對淪為俘虜的狀態、對看守員的憤怒、對俘虜同伴的寬容，以及擔憂伙伴和因為營養失調在嚴酷的勞動條件下死去的朋友，都有入木三分的刻畫。根據日、俄雙方政府的正確統計，被拘留在西伯利亞的57.5萬名日籍俘虜中，有5.5萬人是在拘留中死去的。這是蘇聯對日宣戰到日本投降僅僅八天之間，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高杉一郎、長谷川四郎、石原吉郎等所寫的都屬于記錄性的散文，但和埴谷雄高的哲學式小說有相通之處。他們都是用透視的角度，亦即通過死者之靈的身邊事物，來描寫社會主義國家和官僚主義。

除了這些作家留下的作品之外，其他被拘留者也留下許多記錄。幾天前，我收到一本由青森縣出身的公司職員伊藤登志夫撰寫的《白色安加拉河——伊爾庫茲克第一俘虜營紀實》（1979）。[[13]](#_13_13)他跟待過伊爾庫茲克（Irkutsk）第一俘虜營的同伴說，回到日本后，希望籌組“安加拉會”，每年聚會一次。上述的“安加拉”（Angara），指的是流經伊爾庫茲克第一俘虜營的河流。伊藤借由每年與來自全國各地同伴見面的機會，喚醒彼此的記憶，他的書就是對這些集體記憶的匯編。在此，伊藤和他的同伴——前日本俘虜們——做出結論：共產國家雖然沒有如戰前日本政府教育所說的那么惡劣，但的確不是舒適的居住之地。這個說法已簡略道出與左翼運動無關的日本人居住在蘇聯的實況。他們甚至親眼看到俄國女性啃咬高麗菜心的情景，高麗菜心既硬，不易下咽，又難吃。這個景象讓他們認識到，在當時，不只是日本俘虜受到饑餓之苦，所有的俄國人也陷入營養失調和食物不足的困境。從這種狀況來看，他們承認，俄國政府直到戰爭結束后，仍強制拘留60萬外國士兵在自己的領地內壓榨勞力的做法，盡管有失妥當，但卻是聰明之舉。根據伊藤推估，之所以造成5.5萬名俘虜的死亡，主要是因為日本人無法適應西伯利亞的酷寒所致。對此，他們既不恨蘇聯的人民，也不恨蘇聯的政治體制，說來有點令人匪夷所思，但這似乎道出日本人向來就沒有特定的意識形態，所以淡然以對。正因為日本人抱持這種情感，日本才沒有強烈要求歸還直到今天仍由蘇聯保管的千島群島的其中兩座島——擇捉島和國后島，雖然俄國人也承認這些島嶼自沙皇時代起即屬于日本的領土。[[14]](#_14_11)

或許下述這種看法，反映出現代日本民眾在政治上的智慧：日本既已被安置在美國的核傘保護下，就不要因為這個經濟上意義不大的問題[[15]](#_15_5)，刺激或激怒這個除了美國之外的另一個軍力強大的鄰國！

[[1]](#_1_14) 日本共產黨私刑事件（日本共産黨リンチ事件）又被稱為“日本共產黨內奸查問事件”（日本共産黨スパイ査問事件）。被懷疑充當特別高等警察間諜的小畑達夫和大泉兼藏，遭到盤問者暴力毆打。小畑因外傷性休克死亡，并被埋尸監禁場所的床下。——編注

[[2]](#_2_14) 即昭和天皇。

[[3]](#_3_14) 印度的一種古老宗教，約起源于公元前5世紀，反殺生，尚禁欲。

[[4]](#_4_14) 日本昭和初期在資本主義論爭中與講座派相對立的馬克思理論集團。因1929年創刊的《勞農》為中心，故名。代表人物有山川均、大內兵衛和向坂逸郎等人。

[[5]](#_5_14) 應指擇捉和國后二島的經濟效益。

[[6]](#_6_14)《近代文學》雜志于1945年10月3日舉行創刊說明會，同年12月30日，出版創刊號（1946年1月號），直到1964年8月號宣布停刊。在這期間，加入許多同人。原本的創刊同人為：荒正人、小田切秀雄、佐佐木基一、埴谷雄高、平野謙、本多秋吾和川室靜等七人，除了因與共產黨對立退出同人行列的小田切秀雄之外，其余六人，從創刊至停刊，十九年間共事編務。有關這段歷史，后來以同人擴增時期的參加者，以及創刊后攜手共進的社外執筆者回憶的形式匯編成《“近代文學”的創刊》一書（1977）。

[[7]](#_7_14)埴谷雄高《洞窟》，收于《構想》創刊號及第2號（1939）。（《Credo Quia Absurdum——因為不合理，所以我相信》）》則收于《構想》1-7號（1939-1940）。小說《死靈》開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推出的《近代文學》創刊號（1946年1月號）上發表，迄今未完。《死靈·六章》（1981）已出版，后來寫至第八章（編按：本書日文版完成后，埴谷又于1995年發表了《死靈》第九章）。

[[8]](#_8_12)有關讓埴谷雄高構想寫出哲理小說《死靈》的“共產黨私刑事件”，同為《近代文學》創刊同人的平野謙曾寫《回憶“共產黨私刑事件”》一書（1976）。該書附有當事者之一的褲田里見的審訊筆錄、相關文件和埴谷雄高的后記。當時，平野謙重病在床，他之所以在這時候發表對“私刑事件”的看法，主要是斷定1976年1月末民社黨的春日一幸把這“共產黨私刑事件”帶入國會，并要求開除當時的共產黨負責人宮本顯治（日本共產黨委員長）的做法，頗有讓戰時日本政府復辟之嫌。有關這個事件，已有多篇文章討論，日后還會有更多披露。其中重要著作如：立花隆的《日本共產黨的研究》（1978）、宮內勇的《20世紀30年代日本共產黨私史》（1976）、菅原克己的《遠方之城——為了某個時代人們的回憶》（1977）。

[[9]](#_9_12)山川菊榮、山川振作編，《山川均全集》全20卷（1966）。高畠通敏編，《山川均集》，收于《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976）。山川均曾發表《習慣轉向者的手記》（《經濟往來》1935年8月號）一文，談到自己如何在軍國主義的時代應付營生。

[[10]](#_10_12)高畠通敏，《生產力理論——大河內一男·風早八十二》（1960）。其后，這個主題延續成戰后的學術形態，中島誠《轉向論序說——聯結戰中與戰后的事物》（1980）一書中有所探討。

[[11]](#_11_12)有關花田清輝對“轉向論”和“追究戰爭責任”的看法——《罪與罰》，可參閱《錯亂的邏輯》（1947）。花田清輝與吉本隆明的論戰，始于《致年輕世代》（《文學》1957年7月號）這篇文章，于《鸚鵡螺號的反應》（《季刊現代藝術》3，1959年6月）一文結束論爭。吉本隆明則以《不許藝人入山門——對花田清輝的反駁》和《表揚執筆撰寫〈乞食論語〉——一個笨理解的“不成為前衛黨”》（兩篇都刊于《日本讀書新聞》，1959年1、2月），以及《轉向法西斯的詭辯》（《近代文學》1959年5月）加以反擊。有關1960年6月的政治活動，花田清輝寫了一首新詩《風的方向》（《現代藝術》1960年10月號），吉本隆明則寫《六一五事件與我——給花田清輝的一句話》（《周刊讀書人》1960年11月）。

[[12]](#_12_12)菅季治的手稿是在其死后出版的：《未被訴說的真實：菅季治遺稿》（1950）、《人生的邏輯——對文藝的心理學之嘗試》（1950）。

[[13]](#_13_12)高杉一郎，《在極光的陰影下》（1950）；其后重印收入富山房百科文庫（1977）；巖波文庫（1991）。內村剛介，《匆匆的人生》（1967）。長谷川四郎，《西伯利亞故事》（1952），后收入《長谷川四郎全集》（1977）。石原吉郎，《對日常的強制》（1970）、《望鄉與海》（1972）。

[[14]](#_14_10)伊藤登志夫，《白色安加拉河——伊爾庫茲克第一俘虜營紀實》（1979）。

[[15]](#_15_4)盡管如此，根據現在（1981年）日本的輿論調查指出，蘇聯仍是日本人心中最不受歡迎的國家之一，這個數據已表現在新聞的輿論調查中。

# 九 玉碎的思想

1979年11月8日

最近，臺灣小說家黃春明的作品集出版了日譯本《莎喲娜拉·再見》。[[1]](#_1_17)書中的同名短篇小說《莎喲娜拉·再見》非常有趣。故事描寫了一名臺灣的年輕公司職員，由于有七個重要的日本顧客來訪，公司的老板指派這名職員帶他們去泡溫泉，景點就在臺北的鄰近縣市。七名日本人想在溫泉勝地找臺灣女性狂歡一夜，而他所肩負的任務，就是把這些日本中年男子帶去溫泉勝地住上一晚，隔天再把他們帶回臺北。無獨有偶，那溫泉鄉竟是主角的故鄉！從孩提時代開始，他就與鎮民們非常熟稔，而這些日本人偏偏要從他青梅竹馬的女伴中選出陪宿的對象，讓他頗為難堪。總之，他痛苦地度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充當口譯員的主角，又帶著七名中年日本人前往臺北。這趟火車的旅程需要幾個小時。在半路上，一個臺灣的大學生坐上火車。上車之后，這名大學生迅即發現，車廂內有日本乘客，而且看似來歷不凡，便走了過來。他想跟那幾個日本人交談，請主角居中翻譯。這名學生表明，自己即將畢業，畢業后打算去日本學習中國文學，希望主角把這席話翻譯給那些日本人聽。他大概認為，他即將赴日留學，這番表白應該會得到這幾個日本人的好印象吧。然而，負責口譯的主角卻跟日本企業家說，這名臺灣的大學生想問他們是否上過戰場，故意來個移花接木的謔問。幾個中年企業家聞言后，回答說上過戰場。這時候那個大學生又提問些什么，主角把它譯成：“你們上過哪里的戰場？”他們回答說是中國。接著，主角又假借大學生之口問道：“你們當兵去中國干了什么？”只見這幾個企業家變得面有難色，最后只好稱贊臺灣的大學生看起來都很用功，這么勤奮的學生在日本一定會受到歡迎的云云。但主角假傳其意，反問大學生為什么要去日本研究中國文學。這么一問，卻讓大學生表情為難。一答一問間，火車終于駛至大學生下車的車站。告別的時候，那幾個日本企業家向大學生說了聲“再見”，這是用中國話說的“莎喲娜拉”，因為他們去過中國，只學會“再見”這個詞，所以用中國話道別。這篇小說原題為《再見》，譯成日語則成了《莎喲娜拉·再見》。

正如這篇小說所揭示的，盡管并非所有日本人都有不堪回首的戰爭期間的記憶，但至少對現在四十歲以上的日本人而言，它的確是段苦澀的回憶。這些“人們”，其實也包括我，我們始終有一個強烈的渴望，亦即希望把這段記憶埋在心靈深處，因為我們不想直接與它面對面。關于這個現象，日本的不同世代都有自己的看法。比如說，有些成長于戰后的年輕日本人，就會清楚地詰問他們的父執輩，他們在戰爭中到底做了什么？做父母的面對這種質問，都不愿意回答，至少有很多為人父的是如此。但讀者若能了解他們是如何記憶戰爭期間的偶發事件，如何將記憶藏在心中并置換成他物，如何解釋，又如何表述此記憶，便能掌握理解日本文化的一條線索。我們就從這個著眼點，來追溯十五年戰爭期間，以重大事件為主的各種軍事行動。

1931年9月18日，幾名被派至中國東北滿洲的日本參謀軍官，擬訂了一個計劃：要在距奉天（沈陽）北方約7.5公里處的柳條湖，炸毀當時隸屬日本管理的南滿鐵路的某一段路軌。他們并沒有事先向派遣軍司令官和參謀長報告這個計劃。事實上，炸毀鐵路的是河本末守中尉及其部下的幾名士兵。不過，這個事件卻被日軍報道成中國人所為，把事件的責任扔給了中國人，日本國內的報紙也不斷借用軍方的報道。日本旋即對這次炸毀事件展開復仇作戰。戰爭開始之后，日本未經宣戰就把這次事件命名為“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

在這個秘密計劃的背后，當時日本的派遣軍，也就是關東軍的參謀軍官石原莞爾中校曾參與其中。他提出一個戰略理論：日本必須在滿洲建立軍事要塞，并借此為之后日本與西歐各國間可能爆發的世界最終戰爭做準備。后來，同樣在關東軍參謀軍官們的策劃下，將廢黜中國宣統皇帝溥儀一事也加入計劃中，并于1932年扶植其為“滿洲國”的皇帝。雖然“滿洲國”的建立在國際上招來惡劣的批評，但日本為了守護它，退出了國際聯盟。這種先發動軍事行動再合并某一領土，使其成為既定事實以強迫承認的做法，還包括了扶植傀儡政權，和退出對此行為大加撻伐的國聯在內。吊詭的是，此種做法后來卻為意大利和德國的國策提供啟發作用。若從同時代的世界史中加以考察，“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曲，也是開啟日本十五年戰爭的肇端。[[2]](#_2_17)

使用“十五年戰爭”這個稱呼，主要有兩個用意，亦即把日本經歷漫長的戰爭時代劃分為二：日本與中國的對戰和日本與英、美、荷等國的戰爭。由于戰爭期間我還是個少年，因此，只知道這次戰爭被稱為“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過了幾年，又爆發了戰爭，大家稱之為“上海事變”（一·二八事變）。又經過數年，這回別人告訴我發生了另一場名為“支那事變”（七七事變）的戰爭。這些所謂片段的“事變”，就這樣毫無關聯地灌入我們年少的腦海中。這正是當時日本政府的意圖！如今，我從大人的角度思考，卻有了不同的看法：我認為這些“事變”都是與歷史的事體有其聯系的戰爭狀態。接下來在1941年，我又得知日本和英、美的“大東亞戰爭”開戰了。對日本人來說，我們在主觀上被教導知悉歷史上有過幾次零星的爭戰事件，但卻把它們當成不同的戰爭，而非視為歷史事件。正如我在家永三郎于1968年出版的《太平洋戰爭》一書序言中指出的，我們應該把1931年至1945年的戰爭看成是一場連續性的戰爭，并且把這次戰爭視為日本敗于中國的戰爭！[[3]](#_3_17)

森島守人曾在奉天總領事館擔任外交官，有關戰爭是如何開始和進展的，他在回憶錄中均有詳述。[[4]](#_4_17)據說，森島曾就當時日本中央政府外務大臣決定的方針，向關東軍參謀軍官板垣征四郎上校提議，必須和平地解決當前發生的戰斗狀態。不過，板垣上校予以反駁說，統帥權已對此問題做出決定，難道總領事館有意無視統帥權嗎？同席中較為年輕的參謀軍官花谷正少校甚至拔刀威脅說，誰要是敢干涉統帥權，他絕不輕饒！板垣上校、花谷少校，以及上述提及的石原中校，都是密謀炸毀南滿鐵路然后嫁禍給中國人的密謀計劃成員，他們事前不但沒有向日本的陸軍參謀總長報告，甚至背著當地的派遣軍司令官和參謀長。

這項作戰行動是由遠離東京的陸軍參謀總部，也就是由關東軍內部少數幾名參謀軍官暗中擬訂的。他們在計劃實現之后，以此作為既定事實，強迫東京的陸軍參謀總長予以承認，進而強迫當時的日軍大元帥——天皇，接受這個已然展開的戰局。他們將此次沒有事前知會天皇和東京參謀總部的行動稱為“統帥權”，而統帥權決定的行動，包括日本首相及文官在內的內閣閣員都必須接受，這是當時軍人思考的邏輯。在1931年的日本政治中，這種觀念獲得勝利，最終把日本推上世界的舞臺，步入與軍力遠勝于日本的各國展開對決的境地，而其背后的原動力，正是來自于殖民地派遣軍內部的一群年輕參謀軍官。在最初階段，這個集團還包括石原莞爾。他雖然行事專斷，但頗有先見之明。1936年，石原加入遭到壓制的年輕軍官陣營，接著，又在1937年之后，明顯轉向有意停止攻打中國的陣營，因而被逐出陸軍權力核心。在日本與英、美打得方興未艾之際，石原被編入預備部隊。戰爭就在摒除這位最初全盤策劃者的情況下，由一群精于操控陸軍職業軍人集體欲望的成員，在東拼西湊的計劃下持續進行。雖然明治憲法上保障的統帥權給予這些軍人此種自由，但統帥權必須通過天皇和陸軍參謀總長的指令才能實行，然而他們的秘密計劃在初期階段便未受到統帥權應有的控制。由于這種企劃在初期階段可以使工作進展快速，因此看似非常具有效率。然而，一到戰爭的后續階段，整體計劃必然會出現政治和軍事缺乏統合的弊端，尤其當日軍轉攻為守時，這種破綻更是顯而易見。日俄戰爭以前，日本的陸軍就以普魯士陸軍為楷模，之后更是崇拜德國陸軍的作為。納粹德意志在歐洲興起之后，日本陸軍的領導者們便強烈希望日本能與德國結合。從軍事上來看，這可以說是有某種根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軍事史家李德·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Hart，1895-1970）曾指出，日本只有和德國結成軍事同盟才有可能打贏這場戰爭。李德·哈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1970）一書中提到，波蘭和法國敗給德國之后，唯有英國的軍力足以對抗德國，因為這時候美國和蘇聯尚未加入戰圈。倘若希特勒在這時候對英國展開決定性登陸作戰的話，或者即使不采取登陸作戰，決心另尋其他決定性攻擊策略的話，照樣可以征服英國。

如果希特勒傾其全力擊垮英國，英國的沒落幾乎是可以確定了。換句話說，就算希特勒失去攻打英國的最好時機，他照樣可以擬定確實有效的方法，借助空軍和潛水艇的強大威勢，穩住自己的腳步，逼使英國力感不支以至最終瓦解。

然而，希特勒認為，俄軍始終守在德國東部的邊境上虎視眈眈，極可能有從陸路攻打德國的危險。他深刻覺得，為了顧及海陸雙方出擊的策略，不能冒險集中所有的軍力。因此，他得出一種戰略：為維護德國后方的安全，擊潰俄國是唯一的生路。他之所以對俄國的意圖如此疑懼萬分，乃是因為長期對俄式共產主義的厭惡，已成為他內心的痼疾。

李德·哈特也指出，潛藏在希特勒深層心理的不安情感促使他轉而對付俄國，但此舉對德國而言卻是致命傷。李德·哈特在此所述的希特勒心理因素仍有待商榷，但從軍事史的事實來看，希特勒把軍力投入俄國邊境的作戰之后，才深刻了解到此舉導致了補給線過長的戰略弊端。所以，日本能否取得勝利，端看希特勒在法國投降之后，是否全力攻擊英國這件事上了。

李德·哈特提到，日本參與這次戰爭，對希特勒并沒有幫助，因為日本加入戰圈，反而把美國的力量拉入這場戰爭中。日本海軍剛好與陸軍形成鮮明對比，是以英國為楷模而建立的。關于與德國和意大利結成軍事同盟一事，日本海軍始終與陸軍針鋒相對。1938年，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在主要閣員的會議中清楚指出，即便集結日本、德國和意大利三國的海軍軍力，也敵不過英、美、法及蘇聯海軍戰備的總和；他又說，日本海軍原本就不是為與英、美兩國作戰而建立的，而德國海軍和意大利海軍不足為懼。這種毫不客氣的見解，乃基于他對現今世界局勢的具體掌握。

確切地說，日本海軍在1941年向英、美兩國宣戰時，也未喪失這種務實的態度。因為當時聯合艦隊的總司令山本五十六也已看出勢態，亦即日本雖然在戰爭初期可以取得耀眼的成果，但此優勢恐難持續。

然而，日本陸軍依仗日本精神與國體絕對優秀的自我暗示，打敗了日本海軍基于務實態度的自我認識。最后，日本和德國、意大利締結了軍事同盟。

1941年9月6日，召開指導戰爭的“御前會議”[[5]](#_5_17)決定對英、美宣戰。在會議中，天皇問當時的陸軍參謀總長杉山元上將：“一旦與美國開戰，陸軍要耗費多少時間才能結束戰局？”杉山回答：“南太平洋的戰事大概三個月內即可結束。”但天皇反駁說：“日支事變爆發之際，時任陸軍大臣的你表示，戰爭大概在一個月內即可結束，但迄今已過四年，為什么戰事尚未結束？”杉山則回答：“因為中國大陸幅員廣大。”天皇又問：“倘若中國是個大國，太平洋豈不是更大？你是基于什么理由判斷戰爭可以在三個月內結束？”接著，天皇再問：“領導高層是否把重點擺在外交上？”這時候，海軍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大將幫杉山回答：“正是如此。”然而，盡管外交自始至終就受到重視，但有關開戰或和平的決定，這時候已定下日程，而且也決定積極準備軍力，以供開戰時刻之需。這些事實已大大傾向天皇擔憂的方向，也就是開戰。有關上述經緯，可參閱池重高編的《日本對戰爭的決斷》，書中有詳細記載。[[6]](#_6_17)

假定這時候和美國的談判沒有成功，宣戰的日期就定于10月上旬。到底是基于什么理由把日期定于10月上旬呢？因為日軍每天都在進行激烈的軍事訓練，而且石油的存量消耗快速，光是一個小時，海軍的耗油量就達400噸。因此，結論就是：若要發動戰爭，現在正是最好時機。

另一個重大的理由是美國方面的立場。美國政府明確表示，日本從中國撤退和與德國、意大利斷絕結盟，是恢復美日關系的前提條件。石油存量和美國的要求，才是把日本趕向不可能戰勝的賭注的兩項因素。在天然資源和工業基礎上，日本遠遜于中國、美國和英國。日本可以憑恃的只有日本精神和對國體的信念，這是明治維新以來，歷時七十年，由日本政府在國民中培育起來的。從軍事的觀點來看，1941年12月，德國已經跟俄國開戰，日本開戰伊始就勝利無望的評斷自是恰當的。

1942年6月5日，日本海軍在中太平洋的中途島海戰中，盡管數量上優于美國海軍，但仍吃下第一場敗仗。山本五十六大將麾下有200艘軍艦，尼米茲上將（Chester William Nimitz）則以76艘艦船迎戰。戰斗結束時，日本損失航空母艦4艘、巡洋艦1艘和飛機330架；美國則折損航空母艦1艘和飛機150架。山本五十六大將開戰時承諾的驚人戰果，在這一階段便告幻滅；接著，要守住開戰初期占得的若干前進基地，更是愈加困難。瓜達爾卡納爾島的防衛注定是要失敗的。日軍于1943年2月7日撤出瓜達爾卡納爾島，卻使用“轉進”這個字眼，模糊國民對日軍撤守的認知。從那之后，作為前進基地的島嶼逐一淪陷，只有阿留申群島中的基斯卡島例外。日軍在此的撤守作戰成功地瞞過美軍的攻擊部隊，美軍經過三天的猛烈轟炸和登陸作戰后，才發現日軍已經完全撤走。日軍方面并沒有全力支援孤立的部隊，也沒有把被美軍奪走的眾多島嶼重新搶回來。因此，在這些島嶼上的日本士兵，分別陷入封閉的狀態中；而正如陸軍的戰場訓示，他們堅守“生不受虜囚之辱”的信念，因而走向玉碎[[7]](#_7_17)之路。1943年5月29日，美軍的登陸部隊攻陷北太平洋阿留申群島內的阿圖島時，2500名的守備隊士兵中，只有29人被俘。在阿圖島之后，南太平洋的馬金島、達拉瓦島和吉爾伯特群島，加上中太平洋馬利亞那群島中的塞班島，以及非常接近日本的硫磺島等，紛紛展現出“玉碎”的風范。最后，距離日本本土最近的沖繩，也在1945年6月23日淪陷了。

這些激昂的模范警示了住在日本本島的日本人，美軍登陸時自己應該做什么。因為當時的政府強調，凡是天皇陛下的忠良臣民應有為維護國體，不惜玉碎的決心。如此一來，即使所有日本人，包括天皇在內皆全數滅亡，形式仍會留存下來。維護國體此思想本身，即有這層哲學含義。根據支配日本長達十五年的陸軍解釋，敕語的哲學必然帶來這種邏輯歸結，但在當時的日本，只有極少數人敢質疑這種推理邏輯。至少在現實上，包括社會科學家和各宗派的宗教家都不敢出聲批判此觀念。1941年決定走這條路線時，難道當時的領導者不應負起事先提醒日本國民，將被政府帶向玉碎之路的政治責任嗎？

海軍軍官由于操作機械的需要，無形中在職業上形成技術者的思維方式，也由于他們平時航海繞行世界的時候，有機會與世界各國的海軍軍官交流，因而保有一種從國際視野看待事件的習慣。因此，海軍在擬訂作戰計劃上較具合理性，有著“絕不擬訂參與者生還概率為零的作戰計劃”這種不成文的規定，至少理論上如此。太平洋戰爭初期，即使是在珍珠港攻擊美國船艦的雙人座特別潛艇，也允許他們在魚雷攻擊結束后，返回出發的航空母艦。盡管海軍并不熱衷于近乎自殺式的戰爭，但最終仍被卷入崇拜“玉碎思想”的集體狂潮中。擔任第一航空艦隊司令長官的海軍中將大西瀧治郎，于1944年10月20日下令組織“神風特攻隊”。事實上，這項自殺攻擊的訓練，在1944年初即已開始進行，使用的都是為此目的而設計建造的飛機。最后，構想終于實現。大西瀧治郎中將對當初下達這項命令自覺責任重大，便于日本投降之后，以武士的方式切腹自盡。

參加神風特攻隊的成員，都是從有意投入這項為特別目的而戰的志愿者中選出來的。不過，戰爭發展到這個階段，不管是加入海軍還是陸軍的青年們，幾乎毫無例外地受到這股風潮的感染，紛紛志愿參與這項任務。日本的報紙在報道神風特攻隊時，還刊登了他們出發前的英姿照片，并借由重印他們所寫的信件、遺書和辭世詩句，贊揚他們是多么勇敢的青年。新聞影片中，也拍出這些青年出發時英氣煥發的立姿。戰爭結束之后，比特攻成員更年輕的日本人，用新穎的角度描寫神風特攻隊。小田實（1932-2007）是屬于較年輕一代的小說家，戰爭當時，大阪遭到空襲，他正置身于不知逃往何方的幾萬名災民之中。少年時代的逃難經驗告訴他，要從被趕出家門、前途茫然的群眾立場看待這場戰爭。神風特攻隊的隊員大概也有與他少年時代經歷過的類似經驗吧。也只有以此方式思考，小田實才得以在自己的心中捕捉作為英雄的特攻隊員，駕機駛離機場后的形象。對習慣以戰爭時期培養的傳統觀念看待戰爭的年長一代而言，想象特攻隊員駕機起飛后的殉死心情，也未免太過殘酷，所以后來就不予揣度了。1965年，小田實寫了一篇題為《思考死難的意義》[[8]](#_8_15)的隨筆，從各種角度揣想特攻隊員的心境，表現出戰后一代的觀點，試圖把被塞進英雄傳說中的神風特攻隊員，從傳說中拯救出來。這種思想給予當時推動社會運動的新世代極大幫助。他們不再像以前那樣通過嚴密的組織，而是采取較松散的聯結方式，亦即通過在都市遭到空襲時被迫逃出家門的群眾，來抗議日本政府與當時正在進行越戰的美國政府合作。

渡邊清（1925-1981）十七歲時，志愿加入海軍當水兵，他服役的船艦“武藏”在當時是最大的軍艦，但卻被擊沉。受創之際，他的一個同伴水兵抱住船桅，哭喊著母親的名字。不過，這名同伴的死，與日本士兵臨死前高喊“天皇陛下萬歲”的傳說相去甚遠。他在戰后出版的紀實小說《戰艦武藏的末日》中，對此事有詳細的描寫。雖然他長期擔任“海神會”事務局局長，全力支持此會，但他與任何政黨都沒有關系，也不受黨派左右，專心投入保存戰爭記憶的工作，從搜集戰歿學生留下的書簡，使其結集問世的活動開始。這些書簡最后結集成書，題為《聽吧，海神的聲音！》。[[9]](#_9_15)

林尹夫（1925-1945）是神風特攻隊隊員之一。據說，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仍偷偷地閱讀托哥哥取得的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一書。他在軍隊的廁所閱讀該書，每讀完一頁，便把它撕碎吞下。他從中得到一個結論：自己將為毫無意義的目的而死。他體悟到，日本進行的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日本終將被美、英、蘇、中四國聯合的強大軍力打敗。他把這個想法寫在自己的筆記上，又悄悄地寄給哥哥。他雖然能夠構想自己死后的社會形態，但卻找不到自己如何在未來社會效力的出路。戰爭結束之后，他的哥哥把他遺留下的書簡和筆記，編輯成冊出版，題為《命舍月明時》。[[10]](#_10_15)

海軍少尉吉田滿（1923——）1979所乘的“大和”艦，是當時與“武藏”艦并列的世界最大的戰艦。不久，“大和”被編入攻擊美國海軍的特攻任務，不攜帶回程的油料，直接從日本本土出航進擊。戰艦在離開日本港岸，航向最后之航時，軍官房間里隨即展開熱烈的討論。往昔鉗制軍官們言論自由的肅殺氣氛終于解除。他們都在思考，自己到底是為何而死？一名職業軍人——炮術軍官臼淵上尉在激烈的辯論中說道：“從戰略上來說，我們這次出擊毫無意義可言，也不能給敵人任何打擊；我們的目的就是證實此一行動的徒勞，我們將為此而死。”這些話都被吉田滿記錄下來。吉田滿是少數落海后被救起的生還者，他在《大和戰艦的末日》這部史詩般的紀實文學中，寫下臼淵上尉的看法。這本紀實性的長篇著作，是在日本投降之后，由參戰的海軍軍人寫成，絲毫沒有對美軍占領日本時期，鉗制言論思想的做法有任何妥協，因此占領軍的檢閱單位禁止這部著作據實出版。直到占領時代結束的1952年，這部作品才以完整記錄當時史實的形式，出現在眾多日本人的眼前。[[11]](#_11_15)作品的率直文體洋溢著年輕士兵的勇敢，日后成為日本文學中留存的名著之一。這部作品的卓絕之處在于，沒有蒙上戰后性格的痕跡。由戰爭時期軍人文體所寫成的作品，反而可以超越戰爭時代的精神，給予不同時代的讀者們強烈的震撼。而這正證明，無論在任何時代或任何社會，文學作品都是最普遍的試金石。

吉田滿后來高升至銀行的監事，于1979年9月病逝。他在去世的前兩年，曾在某次公開場合說：所有為戰爭展開某種行動的人，都應該忠實記錄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把它當成遺產留給后代子孫！這席話是他在20世紀70年代日本經濟高度發展時期，擔任日本的銀行監事之職時所言。

許多參與特攻行動的青年，都認同自己的行為價值。在這些人之中，我引述的林尹夫和吉田滿，在戰爭末期封閉窒悶的氛圍中，早已展開獨立的思考。他們無力從封閉的狀態中掙脫出來，自然更沒有氣力擊垮封閉的國家。可是，他們孤獨的聲音傳至今天，他們就像落地而死的麥子般，雖然一粒麥子死了，但還會長出更多的麥子。

1945年6月23日，沖繩淪陷了。有10萬名的沖繩平民罹難，9萬名日本軍人戰死。其后，日軍相繼在緬印邊界和菲律賓吃了敗仗。8月6日，美軍在廣島投下原子彈。8月9日，蘇聯向日本宣戰，攻擊位于中國東北方的日軍；同一天，美軍又在長崎投下一顆不同性能的原子彈。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1]](#_1_16) 意指在天皇前召開的最高會議。

[[2]](#_2_16) 指自殺。

[[3]](#_3_16) 原文題為《難死の思想》。日語的“難死”，意謂罹難致死，因此譯成《思考死難的意義》，比較貼近原意。

[[4]](#_4_16)黃春明的原作《莎喲娜拉·再見》發表于1973年8月《文季》第1期。福田桂二的日譯，1979年被編入黃春明的《莎喲娜拉·再見：亞洲的現代文學——臺灣》。黃春明1939年出生于中國臺灣的宜蘭，經臺北師專，后畢業于屏東師專，曾任職于廣告公司，據此經歷寫成《莎喲娜拉·再見》。

[[5]](#_5_16)西格蒙德·諾伊曼，《現代史——指向未來的路標》（1956）。

[[6]](#_6_16)家永三郎，《太平洋戰爭》（1968）。鶴見俊輔的《知識人的戰爭責任》（《中央公論》1956年1月號），論及“十五年戰爭”一詞的提議；《日本知識人的美國觀》（《中央公論》1956年7月號）一文中，談及為何要使用這個詞匯。

[[7]](#_7_16)森島守人，《陰謀·暗殺·軍刀——外交官的回憶》（1950）。

[[8]](#_8_14)根據企劃院總裁鈴木貞一于1941年11月8日召開的御前會議發言指出，1941年12月1日為止，陸軍、海軍與民間的石油總存量為10億升。按第一案，戰爭的第一年尚可剩余1.8億升，第二年很快就會缺油4.4億升，第三年（假定已奪得蘭印石油產地）將不足2800萬升。若按第二案，戰爭第一年尚能剩余2.8億升，第二年將不足2.4億升，第三年不足2800萬升。總之，最后做出坐守不如出擊的結論。參見：五味川純平《御前會議》（《文藝春秋》，1978年，236-237頁）、參謀總部編《杉山備忘錄》（1969）。英文著作有：Nobutaka Ike的《日本的參戰決定：1941年御前會議的記錄》（1967）。

[[9]](#_9_14)日本戰歿學生紀念會編，《聽吧，海神的聲音！》（1949、1959新版）。渡邊清（1925-1981）是農家出身的少年兵，并非學生兵，但他卻擔任以舊學生兵為主的“海神會”的事務局局長，長期支持這個團體。他的作品有兩部紀實小說：《海之城——海軍少年兵的手記》（1969）和《戰艦武藏的末日》（1971），以及紀實報道《被打碎的神明——某個復員兵的手記》（1977）、評論《我的天皇觀》（1981）。

[[10]](#_10_14)林尹夫，《命舍月明時》（1967）。

[[11]](#_11_14)吉田滿（1923-1979）就讀東大法學部時，以學生兵的身份加入海軍。他擔任海軍少尉坐上大和艦，參與1945年4月的沖繩戰役，大和艦遭到擊沉。后來，在其擔任日本銀行監事任內病逝。他的著作包括戰后所寫的，有《大和戰艦的末日》（1974）、《提督伊藤整一的生平》（1977）、《戰中派的生死觀》（1980）等。

# 十 戰爭時期的日常生活

1979年11月15日

諾曼·朗梅特（Norman Longmate）在他的著作《當時我們是如何生活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常生活史》（1971）中，曾詳細記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民眾的日常生活實態·。如李德哈特指出，英國當時已被迫至幾近潰敗的局面。日本和英國都屬于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而且又沒有支撐龐大人口所需的豐富糧食生產力一，因此也跟英國樣，深為日常生活的糧食短缺所苦。但是英國和日本，在戰爭時期呈現的日常生活樣貌卻有些不同。

其中，最明顯的不同在于配給制度合理性的差異。朗梅特雖然對英國黑市充斥的情形大加指責，不過，他也同意某個農夫所說的，傳言的確比事實夸大得多。英國的糧食部在抑制糧食價格方面的成效非常顯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糧食價格上漲了130%，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時間跨度上幾乎比第一次世界大戰長兩倍，糧食價格卻只上漲了20%，即使沒有得到政府的補助，增加率也不過50%而已。

在與糧食相關的所有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歷時六年的戰爭結束時，英國人——至少幸存的英國人——都比開戰之初要健康得多。據說，1939年英國的一般婦女，還弄不懂蛋白質和卡路里有何不同。可是當戰爭結束時，糧食部部長卻收到來自家庭主婦的抗議信函，內容扎實，令他既感為難又覺心喜。她們抗議住家附近的食品店，并沒有備齊讓家人補充體力免于生病所需的食品。

日本配給主食白米的制度始于1941年4月，后來還擴及調味品在內的其他輔佐食品。根據1941年的厚生省公告，倘若一名參與一般工作的年輕男子，一天需要2400卡路里的話，政府已確保供應相應分量的食物。1942年以后，這個基準降到每天2000卡路里，到了1945年，更降至1793卡路里。這種情形自然導致一種結果：國民的健康已遭到破壞。1930年以前，因結核病死亡的人數，每年有14萬人，這個數字可以說相當高了。到了1942年，已攀升至16萬人，1943年更超過17萬人。1944年以后，政府不再對外發表統計數字。

表面上，配給制度的實施看似沒有破綻。不過，配給制度自始至終就有黑市組織在背后補助。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始終是個農業國家；因此，即使在明治時代以后，都市的住民與鄉間的親朋好友仍互有往來。于是，都市的住民便通過親朋好友或者鄰近的居民，以物易物的方式（這是比貨幣至上的市場更早的經濟形式），來換取他們所需的白米和蔬菜，為每個家庭打開秘密的生活通道。如此一來，在這種時代的都市住民們，便幾乎得時常下鄉去，循著復雜的人際關系，拜訪他們新認識的“朋友”，用自己的舊衣及貴重物品，換取生活所需的食物。換句話說，都市的住民若沒辦法找到這種黑市交易的管道，可能因為斷糧而危及生存。

除了建立于私誼以及互助習慣的黑市交易之外，另外還存在一種黑市交易。這種黑市交易，是由熟悉經濟脈動的投機者，借由囤積生活必需品，抬高價格以牟利而衍生出來的。這種貨幣至上的黑市交易使得東京的米價節節上漲，根據在戰爭時期每天寫日記的小說家永井荷風指出，1943年間，白米的黑市價格1升是4日元，到第二年，由原來的10日元漲到15日元。短短一年內，白米的價格就從250%漲到400%。[[1]](#_1_19)

在這種情況下，家庭主婦必須掌握各種資訊，根據這些資訊做出正確的判斷，同時還得經常觀察社會情勢的變化。

為了維系家族成員的生命，主婦們不得不掏出自己僅有的一點東西，同時下鄉去建立新的人際關系。而為了造訪這些新的人脈，又必須想辦法搭乘當時極其難尋的交通工具，而為了獲得政府配給的衣服和食物，必須長時間站立。另外，為了日后能獲得鄰居的幫忙，必須出席鄰組[[2]](#_2_19)的例會，或是在自家庭院挖掘防空洞躲避空襲，以及參加嚴防敵機空中來襲的防空演習。不過，最后這項防空演習，只是練習徒手接傳裝水的水桶，或用掃帚滅火而已。到了戰爭末期，敵機正式轟炸時，這些練習絲毫派不上用場。

家庭主婦為什么必須如此十項全能，原因非常簡單，因為大部分的男人，無論是年輕人或中年人，只要身體還能動的，不是被征召入伍，便是被征調到軍需工廠工作。1944年2月，被征召入伍的人數已達400萬人，占當時男性總人口的10%；到1945年8月，投入軍務的人數高達719萬人，已占包括兒童、老人、病患和殘障者在內男性總人口的20%。

戰爭時期的都市主婦們，在缺乏男丁的狀況下，不得不張羅一切的家務，但這也使得明治時代以前，農民、漁民和商人之妻的傳統得到復活。明治時代之前，武士等只占全人口的極少部分。因此，非武士階層的妻子與武士階層的妻子形成鮮明的對比，在行動上有較大的自由。戰時的都市主婦們不但要肩負起生活的重擔，而且還要具有看顧所有家事的自信，并迎接戰爭的結束。反觀從男性至上立場發號施令的日本帝國政府卻舉旗投降，使得男人們失去了自信，而女人們卻仍舊繼續日常的工作，以維系自己、孩子和其他家人（包括丈夫在內）的性命。這件事，給予這些女性在近代日本從未有過的權威。茨木則子（1926-2006）寫過一首題為《當我最美麗的時候》的新詩——日本戰敗的時候，她才十九歲——表現出戰后不久許多女性共有的高昂且充滿自信的氣息。[[3]](#_3_19)

女性絲毫不必負起日本發動戰爭的責任。她們既不是陸軍或海軍的領導者，也不熟悉把戰爭合理化的政治語言，而且在戰爭期間也不享有投票權。不僅如此，為了能夠確保生存所需的糧食，她們不得不犯法。倘若她們如實地遵守法律條文，恐怕所有的家人都得餓死，至少在都市里的情況是如此。在某種意義上，不僅是女性而已，大多數的日本人在戰爭期間都以某種方式觸犯過法律。女性從黑市市場得到某些訊息，通過共同的私下交易相互幫助，避免與現存的國家秩序正面沖突，但仍遵從超越公認秩序的道德與習慣；她們不講夸大的政治口號，卻充分運用戰時不為國家機器納入，或可說是因此涌出的實際思想。這種思想不僅與日本政府的投降無關，甚至正因為如此，而成為她們繼續活下去的動力。

多虧占領軍的幫助，女性在日本歷史上首次獲得了選舉權。不過，女性把自己的代表送進議會，相對此狀況來說是較少有的事件。戰后首次大選的結果，選出的466名議員之中，女性議員只占39名。由于戰爭期間女性廣泛享有的生活思想并未與任何政治黨派的思想合流，因此，盡管在日本戰敗后不久，女性的政治活動看似非常活躍，但隨著生活的日漸安定，卻逐漸平緩下來了。等到戰后的混亂漸趨平靜，她們對推選女性代表進入議會的關心便大大降低了。

除了糧食配給計劃之外，戰時日本和英國的日常生活中還有另一個較大的差異，那就是“鄰組”組織。這種組織與其說是出于政府的建議，倒不如說是受到政府的命令而成立的。在日本與中國開戰的最初階段，中央政府的官員即已看出，不久后資源將更加匱乏，配給制度的實施勢在必行。但問題是，日本從未實施過類似的配給制度，絕不能貿然推行，所以必須先設立教育機構，借此向市民宣導配給制度的內涵。例如領取日常生活用品時必須排隊，或盡量制定實際的計劃，用所得有限的糧食和衣物維持生計等。為此，東京市政府的區政課長谷川升提出恢復德川時代鄰居交誼的組織，取其新名為“鄰組”的方案。東京市市長接受了這個提案，刊載于1938年5月19日的東京市政府公告上。

從日本的精神史來說，那時候的谷川課長，不僅從德川時代的“五人組”制度[[4]](#_4_19)，也從幕末的二宮尊德（1787-1856）所構思的鄰居互助的組織得到啟發。盡管這個自發性的互助層面，有來自谷川課長的構想，但在1938年至1947年的鄰組制度史中，并未獲得體現。之所以只說到1947年，是因為這個制度直到此時才由占領時期的政府下令廢除。“鄰組”向來都是作為傳達政府既定政策至民眾生活的工具，而不是扮演像毛細管般，把民眾意見和生活情感傳至中央政府高官的角色。倘若它能執行這種任務，“鄰組”勢必成為一種文化革命。大政翼贊會成立之初，由包括激進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在內的近衛文麿智囊團構想出這個組織時，其實就含有這種目的。進言之，當時的民眾也看出這種目的。因此，大政翼贊運動在1940年展開的初期階段，才受到廣大群眾自發性的支持。但是這個組織迅即被中央政府的高級官員和陸軍軍人奪取，淪為他們監督和干涉細至市民生活的機構。結合了此傾向，當初東京市政府一個課長的一時之見，才會如此迅速變成由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指揮的眾多擾民法令之一。

正如守田志郎在《日本的村莊》中所述，日本的村落有一種傳統：它不會因為思想或宗教的理由，對同聚落的村民進行肉體的抹殺。不過，這個習俗并不適用于村外者。這個事例可從尾崎秀實一案得知。尾崎秀實被公開指稱與蘇聯間諜佐爾格的關系之后，他的家族親戚在戰爭時期便受到同為日本人的鄙視。當流言指稱他是叛國之徒時，對此人從精神到肉體都要加以消滅的動作旋即在，“鄰組”一帶集結起來。這種情形有點像出現在歐洲史和美國史中的“獵捕女巫”，就最近的事例而言，又類似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麥卡錫（Joseph McCarthy）掃除共產黨分子的旋風而這個。“麥卡錫旋風”，也逼使準備赴埃及履新的加拿大大使，同時也迫使近代最優秀的歷史學家——E.H.諾曼（E.H.Norman）走上自殺之路。有關這件事，容后再敘。

類似這種不屈服于戰時“獵捕女巫”的旋風，仍堅持自己信念的女性，首推九津見房子（1890-1980）。[[5]](#_5_19)在日本人的轉向史中，九津見房子稱得上是個奇葩，她在轉向之后，仍繼續參與批判政府的反戰活動，而且接連受到嚴懲。她既不是一心想抵抗軍國主義，也不是故作姿態地偽裝轉向。

九津見房子出生于日本中國地方[[6]](#_6_19)的岡山縣。她最初和獨立派的宗教人士高田集藏結婚，生下兩個孩子。1921年與丈夫離婚之后，和同伴創立了社會主義女性團體的“赤瀾會”。同年，她跟當時投身共產黨最有力的組織者——三田村四郎結婚，參與印刷工廠的勞工運動。1928年被捕，1933年再度入獄。她在1933年的集體轉向之后，脫離共產黨的運動，另外展開運動，營救尚被羈押在獄中的社會主義者。在這些入獄者中，有佐野學、鍋山貞親，以及她的丈夫三田村四郎。由于九津見房子本身沒什么學歷，所以沒能親自建構證明其轉向的理論。在戰時日本轉向的激進主義者之中，九津見房子是罕見的人物之一。因為她雖然在書面上向日本當局聲明轉向，在行動上卻不轉向。因此，她既不屬于當時蔚為風潮、從共產國際的狂熱信徒轉移到信奉超國家主義[[7]](#_7_19)的立場，也沒有從一個極端擺蕩到另一個極端的傾向。盡管她是曾任日本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后來入獄服刑的著名轉向者三田村四郎之妻，她仍成了尾崎秀實和佐爾格的同志，積極防阻蘇聯和日本發生軍事沖突。1941年6月，九津見房子再度被捕，被判八年的有期徒刑。1945年10月，因麥克阿瑟司令部的指令，才獲釋出獄。

戰后重建的日本共產黨，鼓勵九津見房子出來參選戰后的第一次大選。不過，她拒絕了這個提議，寧愿作為三田村四郎的妻子度過一生。三田村四郎戰后曾以反共產黨罷工的領導者而聲名遠播。然而，九津見房子在政治理念上與丈夫并不相同。1960年，她以一介無名的合作者，而非領導者的身份參加市民運動，抗議再度崛起的戰時領導者岸信介總理政府締結的軍事協定[[8]](#_8_17)。1964年，三田村四郎去世之前，她一直和他共同生活。我們從九津見房子的生涯中看到：在日本人的轉向史中，她是一個難得而又獨立的女性，日本男性知識分子身上罕見的靈活性（不論是否為激進主義者），她也具備了。

戰爭期間對叛國賊的責難，大至日本全體國民，小至“鄰組”單位。這些細小單位發揮著與過去村落傳統不同的作用。過去的村落對各種傾向的住民都予以保護，但是“鄰組”只要從自己的周遭嗅出異國的氣息，便對這種具有外國特質的人士施加壓力，直到對方變成認同國家體制的真正愛國者。因此，許多人被捕、被拘留、受審判，或以微不足道的理由遭到迫害。在戰爭時期特務警察制造出來的犯罪中，最著名的是1944年的“橫濱事件”。為此，朝日新聞社、時事通訊社、日本評論社、巖波書店、東洋經濟新報社、中央公論社和改造社等著名言論機構的員工，紛紛被逮捕入獄。其中，《中央公論》和《改造》在軍國主義時代之前的大正時代，即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旗手，但這兩家雜志社，因為這次事件的擴大渲染，最后不得不宣布解散。1944年1月，這兩家雜志社有幾名員工遭到警察逮捕；1944年7月10日，情報局又命令這兩家雜志社“自行”解散，到7月底這兩家雜志社最終解散。

橫濱事件第一次的逮捕行動是在1942年9月11日。川田壽（1905-1978）和他的妻子定子（1909-1999）成為首批犧牲者。他們兩人遭到逮捕，是由一個搭乘俘虜船的返國者證實的。這艘俘虜船于1942年8月20日，從美國抵達日本，船上約有1500人。警察以隨機抽樣的方式，對長期旅居美國、剛返抵國門的日本人進行逮捕。他們把這種隨機逮捕的方式當成一種實驗，認為可能揪出自美國潛入日本的間諜！尤其是赴美國之前曾在日本參與左翼活動、留有案底的人士，更成了他們必須特別調查的對象。其中，有個落入此網的無辜者，大概想逃避漫長的拷問，于是向警方說，有個比自己更重要、姓氏為川田的人物已經返國云云。

川田壽在基督教教友派（Quaker）[[9]](#_9_17)父母的培育下，進入慶應義塾大學就讀。在學生時代，他曾參加為日本共產黨募款的活動，而數度被捕。后來，他前往美國留學，一邊打工一邊讀書。羅斯福總統主持新政的時代，他曾以勞工運動組織者的身份，四處活動，但并非像逮捕他的特務警察所說的是美國的共產黨員。1941年1月，亦即日美交戰的前十個月左右，他偕同妻子回到日本，在世界經濟調查會擔任資料室主任。川田夫妻遭到逮捕之后，在獄中頻受拷問，連他們的一些朋友也被捕刑問。但即使警察拷問，依然找不出川田夫婦回國后從事左翼活動的任何證據，終于在拘留三年之后不得不釋放他們二人。但是釋放前仍有形式上的審判，川田壽被判三年徒刑，緩刑四年；川田定子被判一年徒刑，緩刑三年。起訴書上既沒有記載川田壽企圖重建日本共產黨一類當初警方所認定的罪行，更沒有所謂從事間諜活動的事情。其中，記載的唯一罪名是他在美國期間從事左翼活動，而這竟也違反日本的《治安維持法》。

僅僅因為認識川田壽即遭逮捕的朋友中，包括高橋善雄，而因認識高橋善雄被捕的，則有當時擔任滿鐵東京分公司調查室主任的平館利雄，以及在同單位任職的西澤富夫。特務警察從他們的隨身物品中找到一張攝于富山縣泊鎮[[10]](#_10_17)的照片。這張照片中，有細川嘉六這號人物。這位細川正是在1942年的《改造》8月號與9月號上，發表論文《世界史的動向與日本》的人。細川嘉六（1888-1962）生長于富山縣的泊鎮，他因為要返鄉處理父母的喪事，所以借此機會邀請朋友到他的故鄉一游。那時候，東洋經濟新報社剛好出版他的《殖民史》，他獲得1.6萬日元的版稅，這對出生在日本海邊且并不富裕的漁夫之子細川而言，算是一筆巨款，所以他打算撥出部分版稅和幾名好友共享。因為當時，要吃到新鮮的魚是非常困難的。但這次與政治毫無關聯的朋友聚會，只因留下一張照片，卻成為特務警察捏造的根據，進而被扭曲成一場企圖重建日本共產黨的會議！

其實，當初在泊鎮召開的“會議”并非如警方指稱的圖謀不軌，現在已毋庸置疑。因為戰敗后，細川選上共產黨的議員，西澤富夫也成了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即使在這時期，他們也沒有用戰爭時期重建黨的英勇事跡，來掩飾自己的過去。

戰爭時期最大的捏造事件，始于警察無意間從被捕者的隨身物品中發現的一張照片。特務警察用這張照片制造幻想，并為了讓這個幻想有其根據，他們把這次聚會命名為“泊溫泉會議”，來呼應當初日本共產黨創立時召開的著名的“五色溫泉會議”。事實上，細川嘉六招待朋友投宿之處是泊鎮上的“紋佐旅館”，館內無溫泉。就因為這場憑空虛構的“泊溫泉會議”，使得62位編輯和作家被捕，其中4個人死在獄中。

戰爭結束之后，川田夫婦和橫濱事件其他的受害者們，一起控告了特務警察的惡行。在這起控訴中，詳細記載了他們被刑訊的情形。比如，用來刑訊的工具種類繁多，有竹刀、竹板、5尺長的棍棒、鞭打用的繩索、用來刺人的傘尖、火筷子、專用踢踹人體的鞋子和鞋底等。警察還讓川田定子的下半身裸露，拿起警棒戳刺私處。記述這些刑訊之后，川田夫婦還說，不僅他們遭到刑訊，因同一嫌疑被捕的大河內夫婦也受到慘無人道的凌虐。

這些指控就是中村智子在《橫濱事件的受害者》一書中補寫的部分。[[11]](#_11_17)幾年前，我曾在連載中讀過中村智子對此事的披露，但當時并未提到這部分。現在，這補寫的部分和我個人的記憶結合在一起。這本筆記指出，川田夫婦似乎完全不認識大河內，但這大河內夫婦卻是我的朋友。1942年3月，我被美國聯邦警察逮捕，起先遭到拘押，后來被扣留。我在拘留所認識的一名日本人告訴我，就他已知的旅美日本人中，大河內先生是最富傳奇性的人物。據說，大河內先生和這位先生的哥哥在同一個馬戲團中，這個馬戲團叫作“玲玲馬戲團”（Ringling Bros.and Barnum & Bailey Circus），是當時世界最大的馬戲團。

我們再往前回溯一下歷史。20世紀初，早年的杰出橫綱力士常陸山曾率領日本的大相撲團到海外巡回公演。當時，隨團中有個叫太田川的相撲選手，他的相撲技藝在美國頗獲觀眾的青睞，因此，他并沒有隨大相撲團返回日本，而是留在美國。他在玲玲馬戲團的舞臺上初展身手，試演他自己編導的柔道劇。他導演的柔道劇其實是一種“幕間狂言”[[12]](#_12_15)，借以轉換動物表演與雜技間的氣氛。首先，中央的圓臺一片漆黑，發出下雨的聲音。接著，一個身穿日本和服的女性，一面用日式的油紙傘半遮著臉，一面緩步走到圓臺的中央。這個女性正是相撲選手太田川的妻子。但就在這時候，沖出一個彪形大漢（由太田川飾演，他是相撲選手，所以在美國人看來，也是巨漢），撲向嬌弱的婦人，想要搶錢。只見這名婦女輕巧地抓住惡徒的手臂，施出柔道的手勢，便把他摔倒在地。惡徒的一名手下（由大河內先生飾演）見狀，想來拯救老大，而持槍準備射擊這名婦女。不過，他照樣被這名婦女用柔道摔得四腳朝天，最后兩個惡徒只好落荒而逃。劇情雖然如此簡單，但卻廣受歡迎，據說曾在美國各地巡回公演好長一段時間。大概是日俄戰爭后不久，美國對日本文化正產生興趣吧。

待在監獄期間，我們無所事事，聽到許多這類的故事。在那里最常為人所津津樂道的大河內先生，其實還有許多逸聞。雖然我也聽過有關大河內先生的眾多故事，但是在這里，我只想談一件耳聞，也就是他前往美國的理由。

他的本名叫大河內光孝，是子爵家中的次子。按當時華族子弟的習慣，他進入學習院[[13]](#_13_15)就讀。讀小學期間，他發現有個低年級生看似非常孤單，由于他很喜歡這個學弟，于是把自己帶到學校的糖果——只是些廉價糖果和點心——送給那個學弟。事情傳出后，卻引起一陣騷動。當時，學習院的院長是乃木希典大將，想找大河內父母商談，但大河內的父母惶恐之余，讓自己的兒子退學了。從那之后，大河內光孝先生的人生有了很大的轉折。后來，他走上了歧途，父母無法管教，于是把他送到美國。在美國幾經輾轉流浪，最后進入了馬戲團。從這個故事的脈絡中，各位想必已經察知，大河內先生送糖果的那名低年級學生，就是當時皇太子的兒子，亦即現在的天皇（昭和天皇）。

我輾轉待過幾個拘留所，最后來到馬里蘭州米德堡（Fort Meade）的戰時俘虜收容所。上述傳說中的主角，比我先進入收容所。正如傳言所說，他是個心胸寬廣、性情豪爽之人，從他那里，我聽到許多有趣的故事。但有關贈糖給天皇的故事，并非他直接告訴我的，而是我從日本人之間口耳相傳聽來的。我們的交往頗為密切，不僅同在這最后的戰時俘虜營，又搭同一艘“日美交換船”[[14]](#_14_13)回去。這是最早的“日美交換船”，離開美國后，經由南美，繞過非洲，再經新加坡抵達日本，幾乎繞了地球的三分之二，花了整整兩個月的時間。我們是在這種情況下回到日本的，所以有許多交談的機會，我因而更加欣賞他的為人。回到日本之后，我志愿當海軍的文職人員，前往南洋，但卻罹患結核性胸部骨疽，動了兩次手術，最后被送回了日本。1944年12月，我回到日本。回國后不久，在1945年的嚴寒時節見到大河內先生。那時候，他剛出獄不久，我問他為什么被抓，按他自己的說法，連他也不知道理由。唯一的可能性是，大河內先生不改住在美國的習性，心直口快，說了什么帶有“日本可能打不贏這次戰爭”之類含意的話，因而遭鄰居密告入獄。他們夫婦說，除此之外，想不出其他的理由。后來，戰爭結束，社會依然混亂不已，我因而與他們夫婦失去了聯絡。我心想，他們應該還活著吧。這次，我是讀了中村智子的《橫濱事件的受害者》中引自警方的筆錄，才知道大河內夫婦因為卷入“橫濱事件”被捕并受到拷問，以及大河內光孝與“橫濱事件”的關聯。

上述情狀，讓我思及三點事情。第一，有名男子喜歡天皇這個“人”，到頭來卻背上莫須有的罪名，在天皇的名義下受到拷問。這是一個事實。第二，他從美國回來之后，當公寓的管理員維持生計，但正因為他是從美國歸來的，所以包括公寓在內的附近鄰居，都視他為外來者。可是他久居美國回到日本，在語言和習慣上，難免與本地人有很大的差異。但就因為他的這種外國風格，“鄰組”便不予保護，并且對他的言論大加撻伐！因為他與當時多數日本國民的意見大相徑庭，才遭到密告入獄。盡管他是華族的妾腹之子，但在被捕之后，這種出身絲毫沒有用處。在這層意義上，日本的戰時法西斯主義隱含著一種堅實的沖動，亦即對特權階級的憎恨和圖謀消滅。在這種情況下，大河內先生自然成了戰爭時期必須統一國民輿論的某種民主主義的祭品！第三，大河內先生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被捕，換句話說，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捏造的“橫濱事件”中所處的結構位置。在我看來，他甚至最終都不知道“橫濱事件”這個名稱呢！

[[1]](#_1_18) 日本于1940年規定的。二戰時因所謂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體制而設立的基礎組織。約十戶為一單位，受地方政府、釘內會等控制。政府通知、物資配給、義務勞動及防空演習等都通過該組織實施。

[[2]](#_2_18) 以五人為一個小組，是江戶時代的一種連帶組織。

[[3]](#_3_18) 指岡山、廣島、山口、島根、鳥取等五縣。

[[4]](#_4_18) “超國家主義”為極端民族主義，指帶有國家社會主義色彩的法西斯主義政治思潮與運動，極強調國家主義因素的政治體制。以20世紀30年代中期至二戰期間的日本和納粹德國為典型。

[[5]](#_5_18) 指《新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編注

[[6]](#_6_18) 又稱貴格教派。

[[7]](#_7_18) 現今稱為朝日町。

[[8]](#_8_16) 短喜劇，以諷刺諧謔為特色。原本在能劇的演出幕間插演，以緩和能劇悲戚哀傷的氣氛。

[[9]](#_9_16) 學習院是學校的名字，這里指的是學習院大學的前身，當時有初、中、高三級學校。這是日本的貴族學校。

[[10]](#_10_16) 1941年日本突然對英、美宣戰，因此仍有大量的外交官員和民間人士在對方國內及占領區滯留。開戰后雙方斷交，往來交通中斷，滯留人員無法返國。日、英、美旋即通過瑞士、葡萄牙等中立國談判，于1942年協議日本（包括其占領區與殖民地）將與美國（包括其美洲盟國，如加拿大和巴西）和英國（包括其殖民地及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自治領），以遠洋郵輪進行滯留人員交換。滯留人員會先搭乘“日美交換船”或“日英交換船”到葡屬東非的洛倫佐·馬庫斯（今莫桑比克首都馬普托）或葡屬印度的果阿，再由母國船只接回本國。——編注

[[11]](#_11_16)諾曼·朗梅特，《當時我們是如何生活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常生活史》（1971）。永井荷風（1879-1959）的日記《斷腸亭日乘》全7卷（1980-1981）。

[[12]](#_12_14)茨木則子，《茨木則子詩集》（1969）。

[[13]](#_13_14)牧瀨菊枝編，《九津見房子：從明治社會主義到佐爾格事件》（1975）。

[[14]](#_14_12)中村智子，《橫濱事件的受害者》（1979、增補版1980）。有關橫濱事件，當事者的回憶錄頗多。藤田親昌、美作太郎、渡邊潔《言論的敗北：橫濱事件的真實》（1959）。新版：《橫濱事件》（1977）。

# 十一 原子彈的犧牲者

1979年11月22日

在戰爭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共同的事態：交戰的國家時常不約而同地通過國家特質，顯現一種心電感應般的方式，默契十足地持續瞞騙自己的國民。當我們思考戰爭這個層面時，可以從國家有意瞞騙國民的角度看出國家的特質。原子彈就是這眾多的事例之一。換句話說，我們從投下原子彈這一事件可以得知，即便在戰爭期間或戰后，甚至在其后長期持續的和平時期里，這兩個舊時的敵對國家，依然保持著共謀的同盟關系。[[1]](#_1_21)

1945年8月6日，美國B29轟炸機在日本本州的廣島市投下了鈾—235型原子彈。8月9日，另一架同型轟炸機又在九州的長崎市投下了鈽—239型原子彈。

報紙向日本國民報道說，美國已用新型的炸彈來對付日本人云云；同時還傳述新型炸彈的威力，并勸告讀者穿白色衣服比穿黑色衣服更能防止新型炸彈的傷害。這類報道給人一種印象：僅做這種程度的準備有用嗎？有關新型炸彈的強大威力，大本營和報紙都沒有說出其嚴重性。日本投降之后，美國派出專家前往廣島和長崎確認原子彈的效力。不過，直到美軍結束占領的1952年之后，日本國民才得知原子彈破壞力的真相。

1952年4月28日，在舊金山簽訂和約的結果：占領軍在日本審查書報雜志的制度宣告廢除。發行周刊照片雜志《朝日畫報》的朝日新聞社在占領結束的當天召開編輯會議，決定出版受原子彈殘害的相關照片。長達七年遭到刻意隱瞞的原子彈下的慘狀，通過《朝日畫報特輯》的披露，這時才為日本國民所認識。在此之前，遭受原子彈之害的幸存者們，無不獨自承受原子彈后遺癥的折磨，茍延殘喘或者死亡，他們的證詞始終沒辦法傳到本國同胞的耳里。幾名幸存者有意以自家出版的書籍形式發表自己的受災遭遇，但是即便以這種形式，仍被占領軍的審查制度禁止。[[2]](#_2_21)日本電影社曾制作了一部長達兩小時左右的紀錄片，可是連底片也被美軍抄走，幸虧當時有幾名制作人員暗中保存了毛片；這是呈現原子彈爆炸后都市實況的唯一電影紀錄，該片一直保存到現在。曾有兩名朝日新聞社的攝影記者拍下廣島和長崎在原子彈投下之后的景象，其中一名攝影記者接到占領軍的命令，要求他毀掉這些底片，但是他不予理會，反而保存了底片。這些照片經過搜集，終于在占領結束后，得以向日本國民公開。

占領軍當局認為，披露這些記錄會對他們推動占領的目的有所阻礙。或許這種判斷是正確的，因為向來以寬大心懷、民主主義者自居的占領軍形象，與帶給廣島和長崎市民的悲慘境遇太不相稱了！

日本投降之后，美軍公布一項數字：原子彈投到廣島市，造成7.8萬人死亡，1.3萬人失蹤。但是證據顯示，至少有20萬人死于這場災難。根據日本紅十字會推斷，有25萬人死亡，15萬人受傷；而且死亡的人數，隨著年月節節升高。到最近，其死亡率已超過未受原子彈貽害的同時代人。根據推斷，原子彈投在長崎造成的死亡，高達12萬人。

赫伯特·費斯（Herbert Feis）仔細研讀戰爭當時，美軍決策的參與者所能利用的資料之后，在《原子彈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一書中，做出這樣的結論[[3]](#_3_21)：

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對于這項早在1945年達成的結論，始終無法提出立論充分的反對意見。因為他們綜合研判軍事上的狀況與日本政府及民間的意見傾向后發現，日本的戰力已經嚴重耗損。轟炸調查團同時預測，就算〔美國〕不向日本投擲原子彈，或蘇聯不參戰，甚或不考慮登陸日本的作戰計劃，日本也肯定會在1945年12月31日前（也很可能在1945年11月1日前）投降。

日本投降之后，美國曾派遣專家到日本，確定和評估美國空軍攻擊的實態及其效果。費斯的這項結論已由專家的報告得到證實。不過，費斯自己仍說，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的決定，不應受到譴責。他的立論根據在于：使用原子彈可以盡快結束戰爭的痛苦，拯救更多的人命。費斯引用的資料指出，神風特攻隊發動攻擊以后，日本的特攻機擊沉了34艘美艦，其中包括3艘航空母艦；并炸傷了285艘美艦，其中包括各種航空母艦36艘、戰艦15艘、巡洋艦15艘、驅逐艦87艘等。費斯接受美國領導者的價值意識，認為在蘇聯欲加入分享獵物前，為了盡早結束戰爭，使用原子彈是正當之舉。但問題是，應否使用原子彈的判斷，跟此判斷是否原封不動地接受1945年8月美國戰爭領導者的價值意識有關。

英國的軍事史家李德·哈特就沒有受到美國領導者價值意識的束縛，他從軍事的觀點，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一書的最后階段，這樣寫道[[4]](#_4_21)：

……于是日本用無線電宣布投降。

其實，并不真正需要使用原子彈才能產生這樣的結果。誠如丘吉爾所說，當其船只的十分之九都已沉沒或不能航行，其空中和海上的兵力都已被摧毀，其工業已被破壞，其人民糧食供給已日益缺乏——在種種情況之下，日本的崩潰實在早已成為定局。

美國的戰略轟炸調查報告書（U.S Strategic Bomb Survey）也同樣強調這一點，不過卻又補充說：“假使日本的政治結構能夠對于國家政策做比較迅速有效的決定，那么在軍事上的無能為力，與在政治上接受無可避免的現實之間的時差，也許就能縮短。話雖如此，似乎還是很明顯，即便不使用原子彈，空中優勢也能產生足夠的壓力，使日本無條件投降，并且無登陸作戰的需要。美國艦隊總司令金恩（Ernest Joseph King）也認為，只要我們愿意等待，僅憑海軍封鎖即可餓得日本人非屈服不可——因為他們缺乏油、米，以及其他各種必需的物資。”

但是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美軍決意不等呢？這就是問題所在！假設當時美國的目的是與蘇聯競爭，美國政府當然不能等待。另一方面，美國可能也抱持一種價值意識，要滿足美國內部的輿論，最好盡早結束戰爭。基于這些因素，美國政府認為不能空等，也決定不再等。這樣一來，可以說使用原子彈的決斷，不僅出于軍事上的需要，也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但是，美國不愿意面對這個事實！

我再援引一下李德·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其中便提及美國軍事領導者間不同的意見。曾經出任羅斯福總統與杜魯門總統參謀總長的萊希上將（William Leahy）也跟前述金恩上將相同，有不同的預測：

萊希上將對原子彈的判斷為不需要，并且更加強調：“在廣島和長崎使用這種野蠻兵器對于我們與日本的戰爭無實質的助益。由于有效的海上封鎖和成功的傳統性轟炸，日本已被擊敗并準備投降。”

但是，為什么要使用原子彈呢？除了希望想迅速減少英美兩軍人命損失的直覺想法以外，是否還有其他的強烈動機？這有兩個原因：其一便是丘吉爾本人所透露的。在他的敘述中，7月18日當天聽到原子彈試驗成功之后，和杜魯門總統會商時的情形里，他曾對于當時在座諸公的心情做出以下的分析：

我們應該可以不再需要蘇聯人，對日戰爭的結束已經不必再依賴他們投入大量軍力，我們不需要再求他們幫忙。幾天后，我告訴艾登先生[[5]](#_5_21)說：“非常明顯的，目前美國不愿意蘇聯人參加對日本的戰爭。”（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6卷，頁553）

斯大林曾在波茨坦會議上要求分享占領日本，使得美國人感到非常為難，而美國政府必定十分希望能夠避免這種情形發生。原子彈也許能夠幫助解決這個問題。蘇聯已預定在8月8日加入戰爭——也就是在投下原子彈兩天之后。

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的第二個理由，是由萊希上將所透露的。他說：

科學家和其他人士想要做這次試驗，因為這個計劃已經耗費了大量的金錢。

原子彈的建造計劃共計2億美元。一名與代號為“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的原子彈作戰具有密切關系的高級官員，曾經對于這一點解釋得更清楚：

簡單地說，這顆原子彈必須是成功的——因為在它身上已經花費了大量的金錢。如果失敗，我們該如何解釋這樣龐大的費用呢？想象人們會怎樣批評……但時間日益迫近，在華盛頓有某些人曾試圖說服格羅夫斯將軍（LeslieGroves），也就是曼哈頓計劃的指揮官，趕緊急流勇退，以免太遲而不得脫身。因為他們知道，假使我們失敗，格羅夫斯將會成為眾矢之的。

當這顆原子彈完成并投下之后，所有一切相關人員感到巨大的安慰，真有如釋重負之感。

此外，也有人不從歷史的軍事層面來看問題，而從未來世界一分子的角度闡述自己的觀點。羅貝爾·吉蘭（Robert Guillain）是當時派往日本的法國記者，法國投降之后，他被扣留在日本生活。他在記述當時經歷的《日本人與戰爭》一書中，提出這樣的質問[[6]](#_6_21)：

白種人膽敢向非有色人種投下原子彈嗎？

他猜想，這個問題的回答應該是否定的。他以白人新聞記者的立場認為，盟軍領導者的潛意識里有人種歧視之嫌，這使得他們可以輕易下決定，向日本投下原子彈。

1954年3月1日，在中太平洋比基尼環礁捕撈鮪魚的“第五福龍丸”，淋到美國在水中試爆氫彈造成的灰雨。3月14日，該漁船回到靜岡縣的燒津之后，23名船員隨即出現頭痛欲裂、嘔吐、皮膚紅腫和掉發等癥狀。9月23日，通訊長久保山愛吉（四十歲）死亡。

后來才知道原來從比基尼環礁捕獲的鮪魚含有放射能，于是“勿食鮪魚”的消息旋即像電流般傳遍日本全國。或許加拿大人比較難以理解鮪魚的滋味，但在日本，這種食品具有獨特的意義：把生鮪魚片放在熟米飯上，是日本最高級的食物之一。因此對日本人而言，鮪魚包含著一種享受的浪漫。但現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喜好的鮪魚形象，卻讓人聯想到氫彈的恐怖。為此，許多壽司店因被懷疑使用“原子彈鮪魚”當食材，而被迫暫時關門歇業，魚市場也大受打擊。“第五福龍丸”的母港——燒津的市議會決議要求美國政府禁止試驗原子彈與氫彈。這個決議進而引起全日本的村、町、縣議會決議發布反對原子彈與氫彈宣言的運動。只有東京都、宮崎縣、鹿兒島縣和福井縣等反對通過《禁止試驗原子彈與氫彈決議》。像燒津市議會這種地方鄉鎮，率先表明反對原子彈與氫彈試驗的世界性行動意志，的確在日本的反戰運動史中寫下新頁。

雖然東京都議會沒有通過《禁止試驗原子彈與氫彈決議》，但位于東京都內的某一區卻成為日本國民規模最大的反核運動中心。這個區，就是杉并區。杉并區的住民大都是以公司職員和公務員家庭居多。在杉并區發端，并以中產階級家庭主婦為核心的反對運動，無形中創造出一種新的反戰運動的形式：主婦們選定時間站在街頭呼吁路人聯署“禁止使用原子武器運動”，或舉行小型讀書會，探討原子彈、氫彈或以戰爭為主的書籍。此種運動形式，起初受到繼承戰前無產階級運動形式的運動者所鄙視，有些馬克思主義學者甚至批判說，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沒有“聯名簽署”這種東西！然而，共產黨員和社會黨員眼看此運動在民間的影響力逐漸擴大，便主動接近參加。最后，卻因為雙方互爭運動主導權，導致運動走向分裂局面。

德川時代的東京[[7]](#_7_21)，孕育出各種由中下層階級自由參與而形成的大眾文化的樣式。但是明治時代以后，城市規模超過江戶末期五倍的東京，在文化的形式上，很長時間處于瓦解江戶時代形態后卻無法定型的局面。戰敗后的歲月就是這種不定型時代的極端事例！朝鮮戰爭結束之后，日本受到經濟繁榮之賜，像杉并區這種屬于東京的新“山之手”地區[[8]](#_8_19)，已形成新形態中產階級文化的基礎，而“原子彈鮪魚”事件作為契機，便是肇端于1954年，家庭主婦反對運動急速發展的原因。至此，日本人自己和學者都沒有發現：他們正處于掀開戰后中產階級文化革命序幕的時代；此文化革命的形態，幾年后終于以具體鮮明的形式，展現在民眾的面前。

反對原子彈與氫彈的全民運動，為何不在其他地方，而在杉并區發生？主要是源于安井郁擔任杉并區公民館[[9]](#_9_19)館長這個偶然的因素。安井郁（1907-1980）原本是東京大學的國際法教授，但占領軍以他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四處從事理論演說為由，撤去他的東大教授職位，于是他自1952年起改為擔任杉并區公民館館長。在此，他得到妻子的幫助，把住在附近的主婦們組織起來，舉行讀書會。我們可以將安井郁的戰后活動，視為他在遭到占領軍軍國主義領導者放逐的指令下，于戰后不久所進行的轉向形式之一。

反對原子彈與氫彈的聯署運動開始后不久，杉并區議會通過《禁止試驗原子彈與氫彈決議》，安井郁借此機會，設計全國性的反對原子彈與氫彈的聯署運動，并決定將這項運動和1955年1月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相結合。在同年夏天之前，原本始于杉并區，由幾個家庭主婦所組成的小型讀書會“杉之子會”，成功地取得杉并區總人口36萬人中，28萬人的聯名簽署。后來這項運動更成功地得到當時日本總人口1.1億人中，共3238萬人的聯署。1955年夏天前，來自世界各地的簽名聯署已達6.7億人。比起世界各地的情況和人口比例而言，日本之所以能獲得多數的聯名簽署，主要是源于這個特別的原因：到目前為止，全世界只有日本國民受到原子彈的摧殘，而且是“三”蒙其害！

假使日本政府在十五年戰爭期間可以自由使用原子彈的話，他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拿來對付美國吧。從十五年戰爭初期，日本發動戰爭的作風來看，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以日本政府的立場來看，他們很難對美國使用原子彈表示強烈的反對，但從生活在日本的居民立場來說，其中包括朝鮮人和來自世界各國的戰俘，他們對原子彈的使用則有不同的看法。如前所述，在這些人之中，例如像羅貝爾·吉蘭這樣的法國記者，在戰爭末期已被日本軟禁，但他對原子彈的看法就與美國人的見解稍有不同。換句話說，只要把世界看成是由國家構成的，只要把人民看成是國家的一部分，我們在批判使用原子彈之際，所言便顯得有限。杉并區的主婦們與日本的全體住民和世界各國的民眾有志一同，得以收集到反對原子彈與氫彈的聯署簽名的原因在于，她們代表的并非其所屬的國家政府，而是住在當地的多數住民。但是不久之后，政黨介入了這項運動，他們跟各國政府的力量結合，反而促使最先揭竿而起的人們所營造的統一狀態走向分裂之途。1962年8月6日，舉行了第八屆“禁止原子彈與氫彈世界大會”。日本社會黨和“總評”[[10]](#_10_19)的勞工陣線提案，要向蘇聯的核試驗表示抗議。但這個議題卻造成會場秩序大亂，日本社會黨及其贊同者因而退出了會場。禁止原子彈與氫彈大會發生分裂，未通過大會宣言，便宣告結束。后來，中國的核試驗更給這次會議帶來新的難題。因為各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每逢其國家代表遭到指責，便退出大會。這些國家代表始終站在與其政府所采行的、與當前政策不可分割的社會主義立場。也就是說，只要是社會主義國家代表視為正當的，或是由他們合理化國家使用原子彈，任何人都不準批判。正如過去反對原子彈與氫彈的運動所顯示的，社會主義已經顯現出另類的國家主義的特征了。

始于1954年，由杉并區家庭主婦發起的反原子彈運動，成為若干年后市民運動的先驅，也成為1960年以后，在顯著的經濟繁榮之下成長的中產階級，對自我滿足的想法展開自我批判的動力。根據調查，現在（指1979年）已有90%的日本人自覺屬于中產階級，他們身上也的確有著中產階級的氣氛。而這種自我批判本身，即帶有都市中產階級氣氛的印記。正如前述，反對原子彈與氫彈的主婦運動，是以鮪魚肉遭到污染事件為發端，這也可以說是最早由日本公民發起的反公害運動。“公害”是明治時代以后，日本政府工業化政策下出現的特征。由于日本是在幾個狹長的島嶼上發展高度工業化的國家，長期以來背負著嚴重的公害危險；這主要是明治時代中期以后，政府成功地蒙騙民眾甚深所致。現在，政府在戰敗之后，已經愈來愈無法保持過去的威權，反公害的抗議運動才得以發揮力量。但盡管在那樣的時代，技術者仍較傾向于政府和企業的立場。然而，就在遭受特定公害的少數市民發出抗議之聲時，技術者和科學家及時發出聲援，反公害的聲音才得以傳進廣大日本民眾的耳里。甚至在某些場合中，還能迫使政府和企業接受抗議內容。然而有些日本的跨國企業仍無視這類抗議聲音，在朝鮮和菲律賓等地設立工廠，把公害輸出到這些國家，這可說是戰爭時期大東亞共榮圈構想的戰后復制品！抗議公害的市民運動，并不因為把公害趕到國外去，就告結束，仍須收集來自國外對日本企業輸出公害的抗議聲音，并以此繼續推展運動。

反公害市民運動的理論架構，在很多方面創造出相反的做法，不同于始自東大新人會的大學生運動。在東大新人會成員看來，他們已經從理論上透視并理解文明的一般法則，也正試圖把這些法則嵌進他們眼前日本的特殊事例中。就反公害運動一事而言，則從特定運動或特定問題出發，然后再轉回尋求問題解決所需的知識性法則。東大新人會運動自始至終在本質上就是世界主義性的運動；反公害運動則從地區性的問題開始，繼續扮演著推動地區運動的角色，但是并不會只局限在地區運動，最終仍然不得不采取跨越國界的行動模式。而這種行動模式特別適合用在反原子彈與氫彈的運動。猶如地區和世界的關系，反公害運動與東大新人會的運動形成對比，在日本國內批判權力運動中出現的新方式，已由內部衍生一股力量，要與向來代表日本文化特征、此后也將留傳后世的鎖國性格戰斗下去。

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受難者，不喜歡談論他們的遭遇[[11]](#_11_19)，也沒有立即參與反對運動。所有的原子彈受難者對未來的命運都感到失望無助，每天茍延殘喘。社會學家的實態研究中已經清楚地表明這些現象；在此之前，這些現象也表現在廣島原子彈的受難者原民喜所著的短篇小說中。原民喜根據自己在廣島目睹的慘況，寫下一系列控訴戰爭暴行的短篇小說，之后卻在朝鮮戰爭方酣的1951年，臥軌自殺了。[[12]](#_12_17)短篇小說《夏天的花》（1947）生動地再現了發生在廣島的可怕情景；《心愿的國度》（1951）則描寫了遭受原子彈轟炸后，作者內心的幻想與孤獨。他在翻譯短篇小說《格列佛游記》（1951）時，這樣寫道：當我看到一匹馬垂頭喪氣地兀立在原子彈轟炸后的廣島時，我想起了在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列佛游記》（Gulliver's Travels）“第四卷慧駟國游記”中，那匹有理性而公正的馬。

原民喜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同樣的，許多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受難者，都不愿意談論他們的遭遇。在現實生活中，他們苦于找不到結婚的對象，為家有孩子而煩惱，在替親戚的子女撮合婚事時遇到困難。他們時常擔憂舊病復發的可能，也害怕疾病遺傳給下一代，還顧慮自己的有病之軀是否對健康良好的親朋好友造成困擾而惶惶度日。井伏鱒二的長篇小說《黑雨》，就揭露了整個日本社會對原子彈受難者的歧視。[[13]](#_13_17)

原子彈受難者中，有詩人峠三吉和小說家大田洋子。[[14]](#_14_15)這些作家直到去世前，對原子彈災難的書寫仍執筆不輟。事實上，在戰爭結束的1945年秋天之前，大田洋子已經完成《死尸的街道》，但直到占領下的1948年，才獲準以刪除部分內容的形式發表。大田洋子始終無法適應戰后的日本社會。她在《半人》（1959）和《滿目瘡痍的人》（1951）中，不斷地凸顯原子彈爆炸受難者生活失調的痛苦。

也有一些作家沒有直接遭受到原子彈的摧殘，例如，堀田善衛就寫了《審判》（1963）這部小說，用國際性的視野，觀照“原子彈轟炸”為世界現代史的一部分[[15]](#_15_7)；在小說中，日本人和美國人雙方都以對等的主角身份活動。飯田桃的《美國的英雄》（1965）則是一部由日本人所寫，卻罕見地沒有日本人出場的長篇小說。[[16]](#_16_5)就這點而言，以一位在廣島投下原子彈的美國人作為作品主角，可以說是日本文學史上的創舉！

[[1]](#_1_20) 應是指美、日均未把投下原子彈的事情明白告知自己的國民。

[[2]](#_2_20) 羅伯特·安東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1977）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英國外交大臣，1950年繼丘吉爾之后，接任英國首相。——編注

[[3]](#_3_20) 當時稱為江戶。

[[4]](#_4_20) “山之手”，指東京西側的臺地，范圍就是現在JR山手線圍繞的地區。古江戶城人口原先都聚集在“山手”，杉并區是“山手”地區比較晚開發的地方。所以作者說“新”山手。

[[5]](#_5_20) 公民館是公共文化設施，集公民學習班、圖書館、公眾集會廳等功能于一身，以社區居民為服務對象，開展文化和社會教育活動。——編注

[[6]](#_6_20) 全名為“日本工會總評議會”。1950年成立，是當時日本最大的全國性組織，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工會運動的中心。1989年11月因與成立于1987年的全日本民間工會聯合會合并而宣告解散。

[[7]](#_7_20)松浦總三，《占領時期的言論鎮壓》（1969）。

[[8]](#_8_18)赫伯特·費斯，《原子彈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1966）。

[[9]](#_9_18)李德·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1970）。

[[10]](#_10_18)羅貝爾·吉蘭，《戰爭中的日本：從珍珠港到廣島》（1979）；日譯本由根本長兵衛、天野恒雄譯，《日本人與戰爭》（1979）。

[[11]](#_11_18)加藤周一、邁克爾·賴克、羅伯特·利夫頓，《日本人的死生觀》（1977）。大江健三郎，《廣島札記》（1965）。長岡弘芳，《原爆文學史》（1973）、《原爆民眾史》（1977）。

[[12]](#_12_16)原民喜（1905-1951）的作品，二度被編成全集出版：《原民喜作品集》全2卷（1953）、《原民喜全集》全3卷（1965-1969）。

[[13]](#_13_16)井伏鱒二，《黑雨》（1966）。

[[14]](#_14_14)峠三吉（1917-1953）在廣島遭到原子彈轟炸，戰爭期間信奉基督教，但戰后加入日本共產黨，在占領期間寫反戰詩作。1951年，在《新日本文學》雜志上發表《原爆詩集》，1952年由青木書店出版。大田洋子（1903-1963）在廣島遭遇原子彈轟炸后，即開始書寫有關原爆〔原子彈〕的作品。她完成長篇小說《死尸的街道》，但沒能通過占領軍的審查，無法出版。1948年11月，在刪除了部分內容后，才由中央公論社出版。完整版于1950年由冬華書房出版。

[[15]](#_15_6)堀田善衛的《審判》（1963）描寫投下原子彈的美國人保羅·里博（Paul Ribaut），和向中國人施虐的日本人高木恭助，兩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苦悶的人生。

[[16]](#_16_4)飯田桃，《美國的英雄》（1965）。小說中的“美國英雄”就是投下原子彈的飛機駕駛員克勞德爾·伊瑟利（Claude Eatherly）。他一再犯罪，又自殺未遂，最后被關進精神病院。

# 十二 戰爭的終結

1979年11月29日

1945年8月14日，在天皇面前召開的“御前會議”中決定向盟軍投降。陸軍和海軍雙方的參謀總長主張繼續作戰，最后他們把決定權交與天皇。天皇表示，他將接受7月26日的《波茨坦宣言》。戰爭終于結束。這場戰爭造成許多國家人民的傷亡，其中包括300萬日本人及1000多萬中國人。1945年8月15日正午，天皇灌錄的“玉音”播放到日本全國。

當時，羅貝爾·吉蘭被軟禁在長野縣的輕井澤市，使得他有機會看見村民們聚集在附近一處民房前的情景。那間民房正是鄰組組長的家。村民們低垂著頭恭聽天皇從收音機播出的聲音，此前他們從未聽過天皇的聲音。天皇講話的方式及其內容，村民們似乎都不大懂，更不知道這次廣播的目的何在。廣播結束之后，經過普通日語解釋天皇的演說，村民們才了解演說內容意味著日本投降。吉蘭覺得，天皇講話的方式很像能劇演員，單調而又缺乏情感。不過，聽廣播的群眾也以日本傳統戲劇常見的表演形式，回應天皇的演說。他們用最少的肢體動作來表達內心涌動的情感，把深刻的感情隱藏在無動于衷的偽裝之下。但廣播結束以后，傳來了陣陣的啜泣聲。村民們紛紛回家，不再出現，整個村落陷入完全的沉寂。

這時候，最讓吉蘭驚訝的是，留在日本本土的7500萬日本人在此之前寧死也不愿投降，現在卻跟著天皇的演說“向后轉”了。第二天起，他們居然用親切的笑容向吉蘭和其他白人打招呼。

根據當時的資料指出，日本宣布投降之后，有527名軍職人員自殺身亡。其中陸軍394人，海軍126人，有3名護士，其余4名的所屬單位待查。此外，也有39名非陸軍、海軍的人員在東京自殺，他們都是信奉超國家主義的成員，也就是尊皇攘夷軍[[1]](#_1_23)、明朗會[[2]](#_2_23)、大東塾[[3]](#_3_23)的會員，其中也包括一轉念間便加入集體自殺行動的青少年。他們是在1945年8月28日麥克阿瑟的軍隊登陸日本本州之前自殺的。整體而言，美軍是在平靜中占領日本的，其間并未遭到來自日本方面的武力抵抗。至此，奪走300萬日本人生命的戰爭終告結束。

構成日本全國四個大島上的住民們在美軍登陸之際，都決意進行“本土決戰”以保衛祖國。然而，真正進行決戰的并非這四個島嶼，而是遠離本土的沖繩群島。

1951年，在中國和蘇聯沒有參加的情況下，對日和平會議在舊金山召開。在會議上，當時日本首相吉田茂答應由盟軍（其實是美軍）繼續占領沖繩群島（琉球）。1952年，在付出同意美軍繼續占領沖繩的代價后，美國才結束對日本本土的占領。但這件事并沒有對當時日本國民的意識造成任何壓力，因為沖繩群島不僅位于日本群島的南端，在文化傳承上，也與本州的各島嶼有些不同。根據傳說[[4]](#_4_23)，沖繩群島是由阿摩美久[[5]](#_5_23)這個地域之神創造出來的。天神派遣自己的一子一女降臨到沖繩群島上，建立最早的王朝。這個王朝據說維持了二十五代；在這一點上，沖繩與大和王朝的傳說頗為相似。在此之后，發生了反王室的叛亂。平亂之后，又建立起新的王室。1609年，日本南端的薩摩藩[[6]](#_6_23)出兵入侵沖繩，沖繩自此成為薩摩藩的殖民地。但是薩摩藩生怕攻打沖繩（當時與中國有朝貢關系）一事觸怒中國政府，因而讓沖繩居民保有中國傳來的習俗。薩摩藩把沖繩作為自己與中國貿易往來時的轉運站，然后再通過這個轉運站與美國和歐洲進行間接貿易。薩摩藩用這種方式獲得殖民地，并掌握豐富的砂糖產業，不但得以富強自己，也蓄積了日后推翻德川中央政府、展現革命勢力所需的國際視野和洞察力。

1879年，明治維新后十二年，東京的中央政府改變過去由沖繩群島世襲君王擔任知事來維持其支配地位的制度，而改由東京直接派人出任知事職務。沖繩的王朝至此終告瓦解。不過，沖繩的文化特色并沒有遭到翻天覆地的改變。換句話說，受到中國強烈影響的沖繩，其據說為日本文化原型的傳統，依舊保持至今。因此，沖繩雖然被納入日本的版圖，仍能維系其獨特的文化。這就是美軍結束日本本土的占領時，沖繩雖為例外，但日本人卻無切膚之痛的背景。

20世紀50年代以后，日本本土進入急速恢復經濟的階段，有個叫劉連仁的勞工，曾對當時的情況留下見證。[[7]](#_7_23)劉連仁是戰爭時期從中國被強制帶到日本的勞工，他在逃離工地后，孤身躲藏了十三年。類似劉連仁這樣的勞工，還有38939人，他們都在1942年11月27日的內閣指示下，從中國被帶到日本從事繁重的勞役。約占這些人數六分之一的6872人，兩年間即告死亡。有850名中國勞工在秋田縣花岡山抗議這種殘酷的對待，其中420人遭到殺害。劉連仁趁在北海道的工地勞役時，于1945年7月30日逃入山中，直到1958年2月9日才被發現。當時的日本首相岸信介擔任東條英機內閣的商工大臣，也是訂立強制中國勞工勞役的決策者。岸信介政府原本打算把被發現的劉連仁視為非法居留者而加以懲罰，但這個決議隨即遭到日本輿論的反對，因而作罷。當劉連仁被問到“為什么躲藏如此之久”時，他回答說：“我時常在深夜出來偵察村民的生活情況，有時從窗外窺探屋內發現，村民們的生活和戰爭期間的匱乏狀態比起來，顯然富裕快樂得多，往往讓我以為日本已經打了勝仗。”

1966年6月，一名美籍的和平運動者嘗試在日本全國進行反越戰的演講旅行，當他游歷從北至南的島嶼之后，說出了以下的感想：同一時期，住在沖繩群島的日本人，卻不能獲得像包括北海道在內的日本本土同樣的繁榮。[[8]](#_8_21)這位名叫拉爾夫·費瑟斯通（Ralph Featherstone）的黑人回到美國以后，被反對撤銷歧視黑人條款的右翼激進分子預埋的炸藥炸死。[[9]](#_9_21)他簡約概括地描述環繞日本全國的印象：就和平問題而言，日本人可分為沖繩和沖繩以外的日本人。當時，沖繩的美軍基地已被作為開打越戰之用，因此，住在沖繩的日本人對戰爭的感受，遠比住在日本本土的日本人來得深刻許多。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因為和平憲法中不準日本政府和國民參與戰爭的保障，而有安心之感，并且極力贊美這種狀態；但對于住在沖繩的日本人而言，他們卻有一種正在支持越戰的現實體認。

民俗學家柳田國男指出：“日本文化的祖先是從南方經沖繩到日本的。”這是他在最后的著作《海上之路》（1960）提出的假設，同時也是他畢生研究日本風俗習慣的結論。在日本本土，各種傳承[[10]](#_10_21)都被巧妙地糅合成莊嚴化國家制度的一部分，但在沖繩則因為沒有結合國家的操控技術，而留存為民眾儀式的一部分。傳承和祭典已深入沖繩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因此，至今仍具有比日本本土更旺盛的生命力。[[11]](#_11_21)

投降后不久，有段期間日本國民曾強烈主張用科學的法則，代替現有的神話和故事傳說。這種科學主義一方面得到占領軍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得到以蘇聯政府權威為背景的日本共產黨支持。盡管這兩支科學主義流派在日本投降后的短期內看似新穎，似乎也不容置疑，但隨著時間推移，雙方都露出了破綻。傳說和儀式所表現的日本舊有傳統，現在已被認為不應該全部舍棄。這些傳說和儀式在過去始終被當成工具，用來正當化現存政府的政策。但一般認為，這種舊式招數，已經不是詮釋傳統的唯一方法。在沖繩文化形態中，女性在宗教儀式中擔負重要的角色，在社會生活中也參與基本價值的開拓，而這種力量對于改變日本本土男性至上的社會生活，也帶來了啟示作用。日本戰后的知識氛圍就在這種情境中變易。沖繩的傳承和儀式，以明治以后日本史上未曾經歷的方式，攫住日本人的想象力；而它也提供了找出日本古老文化形態的線索，因為這些線索是無法從近代日本官僚性或殖民地依附文化中發現的。

沖繩人對明治以來中央政府的百年統治發出不平之鳴；他們站在十五年戰爭犧牲者的立場，也站在戰后被割離本土，繼續被美國占領的立場，對戰爭時期和戰后的日本中央政府發出批判之聲。換句話說，這就是現代日本內部的第三世界發出的吶喊！和柳田國男一樣，柳宗悅很早就開始關注沖繩的文化了。他對沖繩民藝的探索研究，也刺激了日本本土的工藝家。戰前，柳宗悅及其友伴曾數度前往沖繩旅行，當時中央政府強制沖繩住民使用東京腔標準日語，他曾因此政策與中央政府爆發沖突。在1940年旅居沖繩期間，他也曾因為提倡保護沖繩的語言而被警察帶走。從戰時日本政府的標準來看，他的意見顯然是危險思想！柳宗悅當時說，一國的文化力量來自該國內部地域文化的匯聚；相反，地域文化一旦變得薄弱，國民全體的文化也會失去特色。每個國民若不能充分掌握各地孕育的語言，豈能找到適合自身的表述方式呢？詩人但丁的《神曲》，就是用當時意大利的地方語言寫成的。沖繩人學習目前東京公定的東京腔標準日語，或許有所益處，但也請各位傾盡熱情，保存你們祖先留下的語言！同時，也請各位記住，正是這種語言培養出女詩人恩納鍋[[12]](#_12_19)的優美詩作，也請你們更加維護此語言，直到沖繩的語言創造出偉大的文學來！到那時候，沖繩一定會吸引所有日本人的目光，而世界各國的人也會因為要翻譯這類文學作品，而學習沖繩的語言。[[13]](#_13_19)這席話是柳宗悅在十五年戰爭正酣時說的。以當時日本文化是被東京政府核心國策所領導的背景來看，柳宗悅對沖繩的看法，可說是十五年戰爭史中一種預言式的聲明。戰爭結束以后，許多人開始覺得柳宗悅的見解是正確的。戰爭期間，柳宗悅已經不把地方文化當成是“分銷處”，接受以東京為“總經銷”的海外世界思潮，而是將它視為創造世界文化的場所。這種觀點，可說是日本戰爭時期思想史的主要遺產之一。[[14]](#_14_17)

直到戰后，我們才了解這樣的事實：沖繩不僅為我們提供了推斷古代日本狀態的線索，也提供了構筑未來日本的重要啟示。沖繩時常自覺到自己的負面角色，因為它現在是美軍對付亞洲國家的前沿基地，同時也具有第三世界國家共同的困難。

沖繩警告日本本土的住民：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日本經濟發展若不加以抑制，勢必會侵犯到亞洲鄰國的權益。而如何建立一個對戰后世界沒有威脅的日本，這個展望便是通過日本全體國民，努力繼承沖繩經驗而表現出來。投降后不久，日本本土的住民完全忘了沖繩的存在，后來才興起和沖繩結合的希望，而這個愿望在1972年終于實現。現在，沖繩仍和日本本土不同，島嶼的絕大部分為美軍基地，住民們也和美軍士兵往來密切地生活著。然而，當違背美國政府的意思，使沖繩群島回歸日本時，至少對設置核武器設施一事，已決定了沖繩會得到和日本本土同樣的待遇。雖然這只是極其些微的形式表現，但也表現出對日本中央政府在戰爭末期讓沖繩住民背負痛苦的自覺！

1945年8月15日對日本人而言，僅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戰爭結束”這件事上。戰后不久，日本民眾并沒有立即在8月15日這一天，舉行所謂紀念集會的儀式。但是慢慢地，紀念這個日子及重新思考戰爭的集會每年都在召開。當我們把這種對戰爭的回憶方式，和后來日本在越戰中支持美國戰爭政策的事實結合起來思考十五年戰爭的時候，它便帶來一種新的意義。事實上，包括許多支持舊軍國主義的日本人在內，他們都已經察覺，美國的越戰政策和日本往昔對亞洲的戰爭政策頗為相似。因此，紀念8月15日的集會，通過與越戰的交會，便成了反戰活動的開端。[[15]](#_15_9)當這種結合國外的戰爭，并從國際視野中審視8月15日的習慣形成時，這一天對日本而言不僅是戰爭的結束，也意味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終結；進而，我們也可以視這個日子為世界史中某些戰爭的一部分，或者也包括往后可能發生的戰爭！由此看來，日本的十五年戰爭不僅不是日本的特殊現象，同時也與其他各國推動的各種戰爭有所關聯。

出現這種另類戰爭觀點的原因之一，在于戰后的日本新生代，用兒童的目光凝視著戰爭時期已成為大人的上一代日本人，其在面臨戰敗、投降和外國軍隊占領時，態度如何轉向所致。日本的孩子在占領之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成長，的確是他們形成這一觀點的重大原因。因此，為了了解占領時期兒童性格的形塑，我們必須回溯至戰爭時期，看學童是如何疏散和躲避戰火的。最近，我在蒙特婁的報紙上，看到一則在戰時英國度過孩童時代的人所寫的回憶文章。當時年紀尚小的帕特里夏·湯普森（Patricia Thompson）這樣寫道：

前一天晚上因為空襲，我沒有睡好，所以在學校的教室里睡得很沉。不過，老師并沒有因為這樣而責罵我，反而把我抱出教室，把我帶到另一個小房間去。那房間是專為像我這種在戰爭中疲累的孩子準備的。我覺得很不好意思，但也沒什么辦法。[[16]](#_16_7)

這個故事恰巧與戰時日本小學生所寫的回憶文章形成明顯的對比。1941年1月陸軍省[[17]](#_17_5)編纂的《戰陣訓》[[18]](#_18_3)和1941年7月文部省編纂的《臣民之道》，均被視為軍國臣民應具備的德目，不但受到大肆贊揚，甚至還強迫灌輸，把它當成小學生理想教育的根本。《戰陣訓》是在當時陸軍大臣東條英機的監督下編纂的，他提出明顯不同于明治初期發表的《軍人敕諭》的觀念：士兵要絕對服從天皇，不可被活捉；同時暗示士兵的家屬，必須要有覺悟，有時候因某種狀況，戰歿者的尸體仍無法送回家中。教師們將這種觀念作為軍國國民的德目，強迫灌輸給小學的少年男女，正好扮演著相當于軍隊組織的上級角色。在學童們于戰后發表的疏散感言中，適時保護兒童的慈祥老師僅占少數。這類扮演上級角色的教師們，在1945年8月15日這天突然“見風轉舵”的舉動，無形中讓這些學童對叛離目標的教師們留下難忘的印象。[[19]](#_19_1)有趣的是，學童們過去使用的教科書，不只教導修身的，連歷史、地理、自然科學的教科書，也必須把贊揚日本國家體制的內容全部涂黑之后，才準予使用。除此之外，先前教導學生為了維護國家體制隨時要有“玉碎”覺悟，并且在背誦敕語時稍有差錯便加以痛毆的教師們，現在卻把確實可靠的科學理念當成占領軍直接傳授的真理，灌輸給學童們。日本投降時，六歲至十五歲的兒童和少年，大都不信任上述的成年領導者，其后這種觀念也用來質疑這些領導者。他們強烈質疑占領軍的聲音也值得我們注意。1960年，戰時領導者岸信介出任首相，重新締結《新日美安保條約》時，他們便組織起體制外的主要抗議團體。5月19日，岸信介及其帶領的自由民主黨，在眾議院以多數表決通過日美軍事同盟的議案，這是合法的法定程序。在野黨強烈要求再三討論這個議案，但岸信介首相卻認為不能再等，因為他準備配合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Dwight David Eisenhower）訪問日本的行程，把通過的日美軍事同盟當成禮物送給艾森豪威爾。岸信介采取的手續雖然合法，但是由戰時的內閣大臣，也就是現在的首相，以多數黨為恃而強行通過的軍事協定，終于喚起民眾史無前例、自發而廣泛的憤怒。抗議的群眾包圍國會長達一個月之久。根據報道，事態達至頂點的6月4日，在日本全國舉行抗議示威的群眾有560萬人。眾議院通過此案生效的6月18日，有33萬人包圍東京的國會。這可以說是日本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抗議國會行動。在這場抗議運動中，學生團體在三天前的6月15日闖進國會，東大女學生樺美智子（1937-1960）在學生團體與警察機動隊爆發的沖突中死亡。當時艾森豪威爾總統已在訪日途中，并已抵達菲律賓，當他得知樺美智子的死引發強烈的抗議運動之后，遂取消訪問日本的計劃。岸信介首相也因而被迫下臺辭職，但是《新日美安保條約》已通過立法，日本牢固地被置于美國的核保護傘之下。

那時候，日本和中國的“戰爭狀態”尚未結束，也沒有簽訂和平條約。在這種狀態下，又在沖繩設置美軍基地，從當時中國的立場來看，整個日本正隱藏在沖繩的背后，無疑對中國形成軍事威脅。這個事實的認定，導致日本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抗議政府行動。我們要問，當時都是些什么樣的人士參與抗議行動的？粗略而言，在抗議運動風起云涌的1960年，過半數的日本國民都有經歷十五年戰爭的記憶，而這些記憶從日常的沉睡狀態中重新被喚醒。[[20]](#_20_1)整體來說，參加抗議的學生和市民，并不是回應國會里面左翼政黨的呼吁，才參與抗議行動的。在學生中，最激進的團體當屬“共產主義者同盟”，這是一個獨立于日本共產黨之外，并與之持批判態度的組織。在這場叛亂中，無論是共產黨還是社會黨，他們對抗議行動的影響力可說是微乎其微。反對運動的高潮，隨著岸信介辭職，池田勇人出任首相之后，漸趨平緩下來。眾所周知，池田勇人向來以身段柔軟著稱，他的主要政策在于如何提高日本國民的所得。反對運動至此偃旗息鼓，顯示出大眾的抗議并非基于意識形態，而主要是源于岸信介首相必須負起十五年戰爭的責任，以及日本人愧對中國人的罪惡感，撕破了舊日傷痛所致。這個抗議運動最具象征的女性——樺美智子，去世時才二十二歲，是東京大學日本歷史研究所的學生。戰爭結束的時候，她僅是七歲的小學二年級學生。[[21]](#_21_1)

另一個同屬于共產主義者同盟，代表當時激進主義學生的是柴田道子（1934-1975），她寫出了日本第一部以學童疏散為主題的小說《來自谷底》（1959）。當時，有讀者寫信告訴她“被歧視部落”[[22]](#_22_1)長期以來在日本遭受歧視的慘境。她在查訪和記錄被歧視部落民眾的心聲以后，寫成《被歧視部落的傳承與生活》（1972）一書。當發生“被歧視部落”出身的青年，被控涉及強奸殺人案的“狹山事件”[[23]](#_23_1)時，她傾盡全力營救這名青年，動員組織向有關當局抗議，但卻在1975年因舊疾氣喘復發而死。當1960年的抗議運動走向式微，整個日本沉浸在經濟繁榮的氛圍里，許多早年參與抗議運動的人，都被埋進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了。但是柴田道子仍在自己的道路上前進，持續支援少數團體的運動。占日本社會壓倒性多數，并具有中產階級意識者，始終排擠著這些勢單力薄的團體。柴田道子婚前是一名公司職員，后來成為律師的妻子。戰爭結束的時候，她僅是十一歲的小學六年級學生。確切地說，樺美智子和柴田道子無論在其所屬的激進派團體內，或就領導整個戰后日本的年長領袖而言，她們已經從服從男性領導的制約中超脫出來了。[[24]](#_24_1)

今天，新的一代已經出現，比那些在日本投降及戰后不久讀過涂黑教科書內容的人，還更加年輕。在戰爭期間長大成人和戰后成長的世代間，約有十年左右的世代差異；這些年輕的世代，今后仍會對年長的領導者抱持不信任的態度吧。其實，這些年齡層的人無關乎是無黨派或激進派，不信任感已成為他們的心理特征，而且在今后數年的日本社會里，這個年齡層將扮演重要的角色。[[25]](#_25_1)

根據曾參與勞工運動組織的大野力指出，逃出都市空襲的日本人有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的人，因為強烈感受過戰爭的殘酷，在戰后對反戰運動都抱持強烈的道德意識；第二種類型的人，則因為目睹自己的家屋輕易地被戰火燒個精光，以至衍生出今后要培養興建不易燒毀住房的技術之動機。戰后成長的世代在這兩種類型中，比較接近戰爭時期成長者之中的第二種類型，換句話說，他們較具“技術心性”。[[26]](#_26_1)

1977年，文學評論家江藤淳（1933-1999）一再主張，1945年8月15日發生的事，對日本這個國家并非是無條件投降[[27]](#_27_1)，因為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所以日本政府的決定是有條件的投降。在江藤淳看來，那些把日本無條件投降當成前提而展開所謂日本戰后文學的主流作品，全是贗品，它們將在現今明顯事實的強光照耀之下逐一潰散！對出生在戰后的60年代以后，并在經濟繁榮中度過安定生活的年輕一代來說，江藤淳是一個極富魅力的文學評論家。他欲極力批判的是，以《近代文學》為首的作家們所寫的，代表日本戰后文學主流的作品。江藤淳選定的主要論敵就是撰寫《轉向文學論》（1957）和《簡明戰后文學史》（1966）的本多秋五（1908-2001）。江藤淳逐一點出戰敗后許多評論家沒能看出的若干細微事實，并認為無論是勝者或敗者，都應該把《波茨坦宣言》的條件當成基準并加以遵守。可是如國際法學者高野雄一所指出的，《波茨坦宣言》中約定的日本民主化，是同盟國對日本提出的不可克減的條件，而不是日本和同盟國談判的結果。[[28]](#_28_1)因此，日本無條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所定的投降條件，以及承諾陸軍和海軍的無條件投降，正是這個事實的留存。進一步說，同盟國和日本都意圖把1945年8月15日發生的事實，當成日本的無條件投降。后者，也就是日本政府方面對8月15日的事實認定，已清楚表現在1945年8月至1946年間，日本報紙雜志刊載的各類意見上。其中，有些文章使用“無條件投降”一詞，占領軍當局也未予否定。正因為同盟國領導者執著于“無條件投降”，所以從軍事觀點來看，才使得戰歿者的人數增加到不必要的地步，這個事實正是李德·哈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中強烈主張并視為整體的結論。他在該書最后一節這樣寫道：

于是這場“不需要的戰爭”，被不必要地延長，更有數百萬計的生命做了不必要的犧牲。而最后的和平僅足以產生新的威脅，和對于另一次戰爭的恐懼。為了迫使對方“無條件投降”，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戰做了不必要的延長，其結果只是使斯大林坐享其利——開辟道路好讓共產黨支配中歐。

江藤淳的論點目標，主要著眼于那些沒有戰爭記憶的日本新生代讀者，比起戰后活躍的文學評論家，他能夠用更高的敬意看待明治以后的日本遺產。仔細分析戰爭期間的事件，剛好可以凸顯明治以后的傳統及其未竟之處。針對本多秋五的批評，江藤淳已借由否定日本無條件投降，引起了雙方支持者的論戰。依我看來，他的論點今后將會通過世代間的對話被延續下去。最后一提，以上的論述純屬我個人的見解。

[[1]](#_1_22) 日本的右翼團體。1945年8月22日，有10名成員用手榴彈自盡，5天后，3名該成員的妻子舉刀自刎。

[[2]](#_2_22) 日本的右翼團體，1945年8月22日，有12名成員遵照日本傳統切腹自殺。

[[3]](#_3_22) 現今鹿兒島縣。

[[4]](#_4_22) 1939年4月3日，以影山正治為首組成的右翼團體，1945年8月22日，有14名成員切腹自殺。

[[5]](#_5_22) 指琉球的古老傳說。1879年日本正式并吞琉球王國改置沖繩縣。以下相關段落的翻譯仍保留作者原語，請讀者留意。

[[6]](#_6_22) 阿摩美久（アマミク，又作アマミキヨ），女神，受天帝之命下凡至人間后創造了沖繩的島嶼。后天帝后又派自己的一子一女至沖繩，此二人生三男二女，長男天孫氏建立了天孫王朝。——編注

[[7]](#_7_22) 拉爾夫·費瑟斯通是“學生非暴力調整委員會”（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簡稱SNCC）的核心成員，于1970年遭炸藥攻擊而死。——編注

[[8]](#_8_20) 各種制度、信仰、習俗、口碑、傳說等。

[[9]](#_9_20) 相傳生于18世紀中期的恩納村，但生卒年無從查考。作品有用琉球方言寫成的短歌《琉歌》，采用八、八、八、六形式。

[[10]](#_10_20)戰前日本不是陸海空三軍制，而是陸海二軍制，軍隊由陸軍省和海軍省統管。

[[11]](#_11_20) 指戰場訓示。

[[12]](#_12_18) 指過去受迫害、歧視的特殊部落，受封建社會遺留偏見的影響而無故遭歧視的地區。

[[13]](#_13_18)1963年5月1日，埼玉縣狹山市發生了川越高中高一女生遭綁架殺害的命案。同年5月23日，出身“被歧視部落”的青年石川一雄（當時二十四歲）被控涉嫌遭到逮捕。一審被判死刑，被告律師團堅稱被告無辜，要求重審，但后來仍被判處無期徒刑。被告于1977年入獄服刑，1994年假釋出獄。這事件又被稱為“狹山歧視性審判”。

[[14]](#_14_16)上田廣，《與原始森林的野獸一起——劉連仁日本潛伏記》（1959）。1977年，劉連仁擔任中共高密縣井溝人民公社草泊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歐陽文彬根據劉連仁口述（被強行帶走）寫成的《隱藏于山洞的十四年：中國俘虜劉連仁的記錄》已出版問世（《現代人物事典》，朝日新聞社，1977）。“花岡事件”的相關資料有：野添憲治《花岡事件的人們》（1975）。補注：野添憲治，《中國人強制連行·花岡事件關系文獻目錄》（2000）。

[[15]](#_15_8)有關拉爾夫·費瑟斯通，“縱貫日本之旅”的感想收錄在鶴見俊輔、小田實、開高健合編的《反戰的邏輯》（1967）。

[[16]](#_16_6)住谷一彥，《赤面·黑面——八重山印象記〈南海的秘密結社〉》（《みすず》1964年1月號）、《南西諸島的Geheimkult——新城島的赤面·黑面備忘錄》（《南西諸島的神明觀》，1977）。沖繩的祭典給住在東京的學者深刻印象，可參閱住在沖繩的研究者新川明撰寫的《新南島風土記》（1978）一書。

[[17]](#_17_4)柳宗悅《就國語問題回復沖繩縣學務部》（《沖繩朝日新聞》《沖繩日報》《琉球新報》同時刊載，1940年1月14日；僅《琉球新報》分14、15日兩天刊載）。這篇文章是針對沖繩學務部發表在上述各報的《勇于告訴縣民，被民藝運動迷惑者》的反駁。《柳宗悅全集》第15卷（1981）。

[[18]](#_18_2)大江健三郎，《沖繩札記》（1970）。

[[19]](#_19)1965年8月14日至15日東京第12頻道播放節目“徹夜長談——思考戰爭與和平”（戦爭と平和を考える徹夜ティーチ·イン）。一到深夜，就在主持人說“假使天皇說還要戰斗下去，你們覺得會戰斗下去嗎？”的同時，電視臺制作單位沒有預警地停止節目的播放，但討論會仍持續到清晨，隔天由其他團體召開各類“重新思考戰爭的會議”接續下去，形成了二十四小時的馬拉松聚會。這時候，向來把8月15日這一天當成國內經驗的日本人，又多了一種國際經驗，他們終于勇于從日本加害亞洲各國的立場重新看待日本政府間接支持越戰的事實，這種動向已在8月15日紀念集會上表現出來。往后的8月15日紀念集會，便由“還越南和平！市民聯合”（越平聯）、海神會、國民文化會議等團體擔綱領導。有關禁播“徹夜長談”節目的經緯，請參見“越平聯”編的《越南，和平！》，收錄在《資料“越平聯”運動》上卷（1974）。

[[20]](#_20)帕特里夏·湯普森，《戰時英國的故事》，刊于加拿大地方性報紙《憲報》，1979年11月10日。

[[21]](#_21)山中恒從這個經驗出發，并翻印同時代的相關資料，寫成《我們是少年國民》全5集：《我們是少年國民》《我是御民》《不要停止射擊》《直到勝利為止無欲無求》《直到勝利之日》（1974─1979），還把三十年后會見當時少年男女的采訪稿寫成《戰中教育的后窗》（1979）。戰爭時期學童疏散的相關著作有：中根美寶子《疏散學童的日記》（1965）、月光原小學編《學童疏散的記錄》（1960）。另外，根據當事者的經歷寫成的長篇小說，最早的首推柴田道子的《來自谷底》（1959、1976）。

[[22]](#_22)美國的報紙沒有掌握到這方面的動態。日高六郎編，《1960年5月19日》（1960）。

[[23]](#_23)樺美智子（1937-1960）的遺稿，由樺光子編成《在人們不知道時微笑》一書（1960）。

[[24]](#_24)柴田道子（1934-1975）的遺稿集《一束光》（1976）。

[[25]](#_25)北川修（1946—）就讀京都府立醫科大學時，即組織民歌改革會，1967年，以唱片歌曲《歸來的醉鬼》（“帰って來たヨッパライ”）走紅整個日本，成為戰無派〔指未經歷二次大戰者〕的代表性人物。著有《不知道戰爭的孩子們》（1971）。

[[26]](#_26)大野力，《關于戰爭責任的座談會》（在“思想的科學研究會”1959年夏季大會上的發言）。

[[27]](#_27)江藤淳把他和戰敗時擔任日本政府重要官職者的對談內容，以連載的形式刊載在1977年《現代》雜志上，將近一年。他在對談中說：“無條件投降的是陸軍和海軍，而不是日本國。所以我堅信，日本是接受《波茨坦宣言》明示的七個條件而投降的。”江藤淳，《另一個戰后史》（1978）。他根據這個論點，反駁戰后文學最具代表性的評論家本多秋五。江藤淳，《被遺忘的與被迫遺忘的》（1979）。本多秋五的反駁文章，參見《“無條件投降”的意義》（《文藝》1978年9月號）和《回應江藤淳氏》（《毎日新聞》1978年9月7日、8日晚報）。

[[28]](#_28)國際法學者高野雄一批判江藤淳的推斷，見于《無條件投降論爭的問題點》一文（《朝日新聞》1978年10月2日、3日晚報）。國際法學者批判江藤淳的文章，還有松井芳郎寫的《喪失的戰后史與戰后史的喪失》（《科學與思想》38，1980年10月）。

# 十三 回顧

1979年12月6日

我在接觸日本戰爭時期精神史的時候，都把重點集中在“轉向”的范疇，或許這可說是我研究“轉向論”的方法吧。有個學者曾試圖對學術方法的過度煩瑣提出警告，并故意提倡所謂“松果學”[[1]](#_1_25)的創新之見，也就是對各種類型的松果，進行嚴密分析與分類的方法。也許在各位看來，“轉向論”和“松果學”同樣是毫無益處、令人煩瑣的論述。不過對我而言，所謂“轉向論”，或者更簡單地說，研究轉向，是了解自我所處的位置之后，在嘗試探察周遭知識環境時，對我幫助甚大的方法。這不僅有助于我論述和評價戰后的日本，也同樣幫助我論述和評定明治以后的日本。尤其在理解日本以外的各國文化思潮發展過程中的事件時，這種方法對我而言更是一種指引。

這也可以把它擴展為比較轉向論。姑且不論好壞，只要國家強制力的運作和個人的自發行為并存時，在這兩種力量的交互作用下，自然而然就會產生各種形態的“轉向”。

有時候我也覺得自己的方法是失敗的，但我仍盡全力把“轉向研究”限定在用記錄的方式，以此來對照國家權力的動向和個人選擇的軌跡。這種實例研究，有助于預測和厘清我們即將面對的各種困難。

這里有一本莉蓮·赫爾曼（Lillian Hellman）在1976年出版，《題為無法安眠的時代》的書。[[2]](#_2_25)這本書主要描寫當時的美國參議員麥卡錫，在戰后整肅共產黨分子的行徑。1952年，莉蓮·赫爾曼收到必須向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3]](#_3_25)報到的命令，同樣遭到傳喚的有劇作家克利福德·奧德茲（Clifford Odets）。去眾議院之前，他邀請赫爾曼在一家叫巴爾貝塔的餐廳用餐，他說：“仔細聽好，我教你怎么應付委員會那些家伙，最好讓那些家伙看清楚：什么樣的人才是激進主義者。”奧德茲是20世紀30年代以《醒來歌唱》（Awake and Sing）這出戲劇聞名的左翼作家，也是鼎鼎大名的德裔電影女星路易絲·賴納（Luise Rainer）的丈夫。后來，他寫了一出叫《金童》（Golden）的戲劇，由威廉·霍爾登（William Holden）主演，并搬上銀幕，在我學生時代是一部非常有名的電影。[[4]](#_4_25)但是在莉蓮·赫爾曼應訊的前一天，奧德茲卻已現身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里，在會中他為自己過去的錯誤信念致歉，并做證指出他的許多朋友都是共產黨員。莉蓮說：“所以，我愈來愈搞不懂他在巴爾貝塔餐廳講的一席話。那天晚上，他也許相信自己對我說的話。可是幾個星期過后，在面對可能犧牲自己在好萊塢的前途時，他只好改變自己的決定。我忍不住要說，陳腔濫調現在愈來愈大行其道了！電影制片廠的主管們都知道，對許多人來說，要舍棄自家庭院的游泳池、網球場、收藏的名畫，以及面臨即將到來的貧困，無非是極其痛苦之事，所以他們就拿它充當有力的武器。”

幾個星期之后，導演伊利亞·卡贊（Elia Kazan）向赫爾曼表示，他打算到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充當“合作的證人”，因為若不這樣做，他就沒辦法繼續在好萊塢拍電影。

1952年5月21日早上，莉蓮·赫爾曼到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應訊。應訊時，她只回答有關自身問題的詢問，凡涉及他人的詢問，她一概保持沉默。在麥卡錫掀起獵共風潮的時代里，赫爾曼是第一個有所堅持的證人，因為她回答委員會的詢問時，拒絕構陷他人入罪。在赫爾曼之后，也出現了像劇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那樣采取同樣立場的人。[[5]](#_5_25)另外，更有像達爾頓·特朗勃（Dalton Trumbo）那樣決不妥協的硬骨頭，由于當時他掛名所寫的劇本已被好萊塢的高級主管拒用，只好借用他人之名繼續撰寫劇本。[[6]](#_6_25)總之，在麥卡錫的獵共狂潮中，赫爾曼是第一個敢與之對抗的女性，因此可說是意義非凡。

赫爾曼在應訊做證之后，無論在個人生活或財務上，都蒙受巨大的損失。因此她必須賣掉持有的農場，在沒有現金收入的情況下，過了中年，仍得在百貨公司打工維生。當時，達希爾·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和她住在一起，他就是《馬耳他之鷹》（The Maltese Falcon）和《瘦子》（The Thin Man）等偵探小說的作者。[[7]](#_7_25)哈米特因為拒絕做證舉出“人權會議”等組織在籌募保釋公積金時捐款者的姓名，而獲罪入獄。

回顧麥卡錫獵共的時代，赫爾曼說出這樣的感想：“自從我第一次踏進國會的大門，以及后來在這時代發生的種種事情，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我對自由主義抱持的信念幾乎喪失殆盡了，但相對的，我也得到了某種微妙的啟示。我很難說清楚這種感受，姑且稱它是一種‘正直’吧。”赫爾曼還說，其他國家并沒有像美國那樣掀起所謂的獵共運動。她說到其他國家的時候，主要是指英國，但在她的腦海中，日本顯然榜上無名。

在此，我想起大學時代的一個同學，在日本戰敗不久以占領軍的身份到日本來，他告訴我：“美國最惡劣的時代來臨了。美國歷史上即將出現第一個‘大政翼贊會’。”當時，他們應該可以從日本的經驗中學到教訓。在這一點上，我這位朋友是頗具洞察力的，至少當時美國培養的所謂日本專家和日本學者智囊團，尚未培養出具有如此敏銳與氣度的日本專家來！

話題再回到莉蓮·赫爾曼。她最早的重要戲劇《孩子的時間》（The Children's Hour，1934）處理的就是何謂“正直”的主題。后來，作者卻在現實生活中上演了這部戲劇。這是一出以同性戀為主題的戲劇，劇中描寫兩個大學時代為同學的女性經營一所私立學校，但她們卻為學生人數的減少而發愁。因為有惡劣的謠言攻擊說，學校的兩名老師是同性戀者，使得學校不得不關門大吉，最后甚至導致一名老師自殺身亡。那名老師在自殺前，告訴她的朋友，自己有同性戀的傾向。在活著的女老師為死去的朋友舉行葬禮時，此前因聽信謠言而遠走的未婚夫，突然出現在這名女老師的面前，安慰她說，現在已證明那件事只不過是謠言云云。但只見這名女老師未理睬未婚夫便轉身離去。對劇中的女主角而言，只聽到同性戀的流言就一走了之的未婚夫，根本不是一個正直的人，也不值得她繼續關注。這出戲劇的結構和它在劇中所展現的“正直感”，與作者身處麥卡錫獵共風潮中的處世之道極為吻合。

麥卡錫的獵共風潮也波及加拿大的犧牲者——E.H.諾曼。查理·泰勒（Charles Taylor）所寫的《六個旅程——加拿大的形態》對諾曼的一生有精辟的分析。[[8]](#_8_23)

諾曼是加拿大傳教士的兒子，生于日本的農業地區。20世紀30年代，他赴英國的劍橋大學研讀，成為共產黨研究會的一員。那是西班牙爆發內戰的年代（1936-1939）。當時，在諾曼看來，共產主義是防堵法西斯主義唯一的道路。離開劍橋大學之后，他去哈佛大學攻讀博士課程。他的博士論文《日本近代國家的形成》被選入太平洋問題調查會的專門論文叢書，并出版問世。這個時期，他的觀點從共產主義轉為自由主義的立場，他是抱持這種思想立場進入加拿大外交部的。日本投降之后，他旋即被派往日本協助占領軍的工作。占領后不久，他在日本監獄和十五年戰爭期間貫徹“非轉向”的共產黨員會面。麥克阿瑟根據諾曼直接提供的資料，越級批判當時日本政府的政策，并下令釋放所有戰前即被日本拘禁的政治犯。在占領的最早階段，E.H.諾曼在同盟國的管理中，是精通日語的少數人才，且能充分運用那些可作為判斷基礎的調查資料，當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是他的所有建言，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并非照單全收。例如，諾曼反對在東京大審中判決死刑。他認為對那些在這次野蠻戰爭中，必須負起責任的領導者所處的最重刑罰，以褫奪公職最適當。這種詩人般的正義感充分展現出諾曼的價值意識。

占領時期展現巨大影響力的諾曼，在往后的時代逆流中遭到了報復。在他擔任加拿大駐日大使不久后，受到占領軍內部左翼分子的流言中傷，而被加拿大皇家騎馬警察訊問。獲得清白之后，他被任命為新西蘭的高等事務官。后來，加拿大政府得知諾曼的經歷沒有瑕疵，于1956年任命他為加拿大駐埃及大使。當時，正處于英、法為了蘇伊士運河，對埃及大舉進攻[[9]](#_9_23)所引起的混亂局面。加拿大總理萊斯特·皮爾遜（Lester Pearson）[[10]](#_10_23)采取讓聯合國軍隊介入交戰雙方陣營，以維持和平的外交政策，諾曼為此成功地說服埃及總統納瑟（Gamal Abdel Nasser）[[11]](#_11_23)，達成了任務。諾曼并未失去對埃及的理想之共鳴與支持。而加拿大登上世界的外交舞臺，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的。不過，在麥卡錫影響下的美國，又有了另一個理由搬出舊日流言。當時，美國參議院國內治安小委員會召開了一系列公聽會。參議員們意有所指地認為，諾曼于過去盟軍占領日本時，在獄中會晤過日本共產黨領導者，是基于他和蘇聯政府之間的秘密協定。該委員會傳喚諾曼的舊友們在公聽會上做證，主要目的是給他的舊識和朋友造成一種印象，認為諾曼就是協助蘇聯惡毒秘密計劃的爪牙！我們可以看出，召開這樣的公聽會，是為了抹殺諾曼在埃及所做的努力。1957年4月4日清晨，諾曼從位于開羅的九層公寓樓頂躍身而下。他在留給哥哥霍華德（Howard）的信中寫道：

我正被目前的處境所壓垮，覺得已經生活在幻影中太久了。我自覺基督教是唯一的真理之路。請原諒我，因為事情并不像表面那么糟糕。神知道那些事情太糟糕了。不過，我從不曾違背我自己的忠誠誓約。可是因為交往而加在我頭上的罪，現在把我壓碎了。

或許已太遲了，但我仍祈愿能得到神的寬恕。

諾曼在寫給哥哥霍華德和兄嫂格溫（Gwen）的第二項備注中，再次為他的無辜補上一句：

很遺憾，我對基督的信仰不夠強大，但這信仰在最后的日子里，一直支撐著我。

我們從莉蓮·赫爾曼和E.H.諾曼的例子可以得知，其實轉向的問題不只發生在戰時的日本境內，也發生在資本主義的國家，像蘇聯的布哈林、索忍尼辛和中國的老舍的遭遇就是最好的明證。在這之前，我很少引用日本以外的例子，但我認為通過與國際實例的比較，將來較能帶來具體成果。在我們探討日本現代史的短暫時間里，日本戰后轉向的現象，比起20世紀30年代德國共產黨員的轉向，更接近于同年代的法國和意大利共產黨員轉向的軌跡。在戰后的日本，激進派學生并沒有從一個極端跳向另一極端的傾向。這種分類是根據加布里埃爾·亞伯拉罕·阿爾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在《共產主義的魅惑》中所整理的分類法。[[12]](#_12_21)之所以有這種變化，是因為日本的社會結構在日本投降后，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整個社會對那些極力批判現存秩序的激進者，不再長期監視或在意識形態上予以歧視，而是采取更柔性寬容的態度。

要探知是否有“轉向”之實，有許多種方法。一種就是日本共產黨在面對黨員轉向時所采取的方法。在他們看來，凡是脫離本黨思維邏輯的黨員，就是轉向和背叛，亦即沒有運用科學的觀點來掌握社會現狀。日本共產黨只把“轉向”限定在20世紀30年代發生在日本的特有現象，他們認為：這是絕對主義式半封建主義的天皇制與共產黨員在斗爭中發生的事態。這時候，所謂的轉向，是指激進主義者屈從于天皇的權力，沒有成功地運用科學的觀點掌握30年代的日本狀況，同時又偏離基于日本共產黨方針，應明確指示普羅大眾的階級觀點。吉本隆明試圖對既定的轉向觀點提出反論，在他看來，所謂的“轉向”，就是知識分子投身現代日本社會結構中，進行思考失敗后，在知識分子間造成的觀點轉移。吉本隆明通過這個定義，把無法有效解決30年代的所有狀況，都納入轉向的范疇。這時候，“轉向”便成為一切非有效思考的另一代稱，其中還包含共產黨員在獄中進行的“非轉向”。我則把“轉向”看成國家行使強制力的結果——在個人或某團體中造成的思想變化。這可作為一種指引，以便記述各種狀況下發生的不同形態的“轉向”。為了找出“轉向”的特征，我們可以記述國家權力的特質及其如何行使強制力，和個人回應國家暴力時的思想變化。至于“轉向”本身在本質上是好是壞，不以這種定義來判斷。然而，在我記述戰時的“轉向”時，我一直希望能夠從轉向后出現的各種思想中，看到意義豐碩的事物。而指引我思想的，就是孔子《論語》中的那句話：“觀過，斯知仁矣。”

現在，我再歸納一下上述的話，我們探討的問題是1931年至1945年戰爭時期日本的思想歷程。在這十五年期間，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支配著日本。日本政府不努力在日本內部進行社會改革解決困難，卻選擇了用軍事向外擴張的道路。這是政府采行的國策，而配合這些國策使其理論和正當化的任務，便落在日本知識分子的肩上。為了達此目的，日本政府甚至動用包括下獄在內的各種強制力。方法上，下獄之所以奏效，在于政府領導者巧妙地利用長期成為日本傳統的鎖國性格。這種傳統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實施近代化之前的德川時代。“鄰組”制度的引進便是其開端，流言和思想的自由表現從此受到鉗制，大眾輿論也逐漸被規格化。在這種“舞臺裝置”中，先前的激進派和以進步思想自居的東大新人會輕易地屈服了，甚至改變自己的思想，為軍國主義和超國家主義的國策宣傳。這就是20世紀30年代“轉向”最普遍的形態。

十五年戰爭期間，持續的抗議和抵抗仍可見諸其他地方。在此，鎖國性格的傳統以另一種方式復活。眾所周知，北一輝和權藤成卿都是日本超國家主義的理論家。[[13]](#_13_21)北一輝提倡利用天皇的軍隊促使國民的收入平等化，并在天皇的名義下，使日本走向社會主義化。正因為主張這種思想，使他于1936年2月26日，被套上與改革派軍官謀反事件勾結的罪名，而遭到處死。就權藤成卿而言，他所主張的傳統式國家主義在于恢復舊有的習俗，以便使衣、食、住得到確保。他把基于徹底農業化的自治，當成超國家主義的思想基礎。權藤成卿的理論不僅和被視為保守學者的柳田國男的理論有密切關聯，也跟明治后期最早的社會主義幸存者——同時也是無政府主義思想家石川三四郎淵源頗深。在東大新人會方興未艾之際，石川三四郎用不同的方式來詮釋新人會成員高喊的“民主主義”口號。他把“democracy”翻譯成漢字的“土民主義”，意思就是依土地生活的自治。他對“民主主義”的解釋，和當時的學生運動形成對立。由于石川租了600坪的土地種菜，才得以在漫長的戰爭時期維持自己的生活，一直活到八十歲。甚至在七十歲那年，自己還爬上高處修理屋頂。因為這種自給自足的生活，使得他不必只靠寫作來確保自己的生活所需，也不必在戰時的著作中附和政府的國策。他勸私下前來向他求教的訪客，采取逃離軍隊或非暴力怠工的方法。[[14]](#_14_19)柏木義圓也是明治時代社會主義的幸存者之一，他當牧師維持生計，通過他主編的小型刊物《上毛[[15]](#_15_11)教界月報》持續批判中日戰爭。[[16]](#_16_9)這份雜志時常遭到查禁。不過，由于他敦親睦鄰和親切待人，直到死前仍受到鎮民們的愛戴，這并不是因為他的非戰思想，而是來自他溫和的品格。出身律師的正木旲[[17]](#_17_7)持續出版個人雜志《接近》[[18]](#_18_5) [[19]](#_19_3)，他在雜志中徹底追查戰時一名嫌犯被警察拷問致死的經過，最后證實警方確有刑求之實。[[20]](#_20_3)他的批評時常集中在特定的焦點，用實證的方法加以檢證。因此，他才能持續出版《接近》直到戰后的歲月。桐生悠悠也是在死前通過一份小刊物持續批判戰爭的獨立新聞記者之一。[[21]](#_21_3)另外，辻潤這位大正時代僅存的達達主義者也值得注意。他公開表示，從不相信大正時代以來的政治口號，更不相信任何政治上的意識形態。外來的各種進步思想就像頭垢般從他的頭上掉落下來，可是政府強迫灌輸的軍國主義也沒有占據他的腦海。他手拿洞簫過著乞丐般的生活，在戰爭末期因饑餓而死。[[22]](#_22_3)

上述的例證也可作為無效的社會主義和無效的自由主義的例子。但這時候，我們必須記住，正是這種試圖對狀況發揮作用的欲望，才使得眾多大正時代的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代表性評論家，變成十五年戰爭期間軍國主義和超國家主義的領袖。這些無效的抗議和抵抗的各種方法，都是試圖恢復明治以前鎖國時代文化傳統所做的嘗試，而這個傳統始終留存在東條英機政權無法鏟除的思想和感情深層里。因此，這些方法才得以在戰時的鎖國狀態中，以另一種鎖國狀態保存下來。而且這種鎖國狀態的傳統，在日本投降及被盟軍占領后的和戰時截然不同的狀況下，仍顯示出一條可以充實獲致發展下去的道路。

日本只有小得無法與美、俄超級大國相比的軍備，絕不能仰賴軍事的強制手段，必須尋求和其他國家進行貿易。這種展望可以避免戰時利用鎖國狀態，走向軍國主義的凝聚和向外擴張的道路。但無論是留在日本的大批朝鮮人、戰爭期間比本土居民遭受更大災難打擊的沖繩住民，或身受原子彈貽害的受難者，他們對作為精神遺產的十五年戰爭，都持否定的態度，而這種戰前日本人不敢想象的態度卻有助于改造鎖國狀態的傳統。戰爭期間高倡的思想方式，在獲致足以與源自西方思想的體系較量的自信后，進而把日本的傳統美化成絕對的普遍原理。這是扭曲日本傳統導致的結果。事實上，日本傳統有一種特征：無論在任何地方或任何時代，都避免用同一種方法去結合或束縛他人。這種消極的特性也是日本思想的長處。不勉強的、以普遍的原理看待事物，在日本的村落培育出一種傳統：只要對方是村中的住民，就不會因其思想有異而排斥他。經由集中解決目前的具體問題，面對地球上不同民族間的思想互動時，我們用日本人的作風——沿襲日本傳統的方法，或許可以發揮作用。這是在西方各國知識傳統的基準下，不大受到尊敬的另一種知性狀態。

莉蓮·赫爾曼受到參議員麥卡錫的攻擊后發現，美國知識分子間的自由主義傳統是何等薄弱。毋寧說，她姑且不管對方是知識分子與否，某些人和她身上具有的那種“正直感”更值得她去信任倚靠。現在，說不定她跟我有相同的感受。我認為，通過生活方式互動所得的正直感，遠比知識分子操弄的意識形態更具重要的精神意義！

[[1]](#_1_24) 松果，意指學術。

[[2]](#_2_24) 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是美國眾議院的調查委員會。1938年成立時，是為了監察美國的納粹地下活動。戰后轉為調查并整肅與共產主義活動有關的個人和組織。20世紀50年代通過查禁書籍、雜志、電影、戲劇等，以及剝奪許多娛樂業人士的工作權，進行意識形態審查。——編注

[[3]](#_3_24) 指發生于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戰爭，是由英國、法國、以色列聯軍對埃及發動的戰爭。

[[4]](#_4_24) 萊斯特·皮爾遜，加拿大第十四任總理，因調停蘇伊士運河戰爭，而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5]](#_5_24) 納瑟（1918-1970），埃及第二任總統，倡導阿拉伯民族主義。

[[6]](#_6_24) 上毛為“上毛野”地名的略語，即上野國的古稱，現今的群馬縣，也就是該刊物的創辦地，該刊物由“上毛教界月報社”出版。

[[7]](#_7_24) 正木旲（1896-1975），律師，二戰前批判軍國主義，戰時以1944年的告發警方暴力辦案的《無頭事件》一案知名，戰后致力于反權力的審判和冤案。為方便，署名多用名字“旲”的讀音HIROSHI之平假名——正木ひろし。——編注

[[8]](#_8_22) 批判時局的雜志。1937年創刊，1949年10月停刊，共出版98期。

[[9]](#_9_22) 指著名的“八海事件”。1951年，山口縣有個老婦人慘遭殺害，一名青年遭警方逮捕后旋即被刑訊逼供，該青年因不堪拷問，供出四名無辜的童年玩伴。正木旲見義勇為擔任其辯護律師，他們四人終于1968年10月獲判無罪。另外，為了證明警方確有刑求導致該名青年嫌犯致死，正木旲帶著醫生至墓地開棺，斷其頭顱化驗（被稱為“斷頭驗尸案”）后，警方敗訴。

[[10]](#_10_22)莉蓮·赫爾曼，《無法安眠的時代》（1976）；日譯本由小池美佐子譯，1979年出版。

[[11]](#_11_22)克利福德·奧德茲（1906-1963），《醒來歌唱》（1935）、《金童》（1937）。

[[12]](#_12_20)阿瑟·米勒（1915-2005）著有戲劇《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1949）；《薩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1953），取自17世紀獵逐女巫的故事，描寫置身在美國獵共運動中的感受。

[[13]](#_13_20)達爾頓·特朗勃（1905-1976），在1947年麥卡錫獵共運動中，他被指名為美國電影界十個不合作者之一，由于他拒絕在聽證會上做證而遭到判刑。后來，他易名撰寫劇本，以羅伯特·利奇（Robert Rich）之名所寫的《勇敢的人》（The Brave One）獲得1956年第29屆奧斯卡編劇獎。20世紀60年代以后，開始用本名寫作。1971年，他把自己的小說《無語問蒼天》（Johnny Got His Gun）改編成電影劇本，自任導演，榮獲坎城影展最佳評審獎和國際評審團獎。

[[14]](#_14_18)達希爾·哈米特（1894-1961），十四歲起開始工作，當過報童、鐵路雜工、碼頭工人等。1929年出版長篇偵探小說《血色收獲》（Red Harvest）。隨著《馬耳他之鷹》（1930）和《瘦子》（1934）被改拍成電影之后，成為美國最受歡迎的作家。為冷硬派（Hard boiled）的先驅者。出獄以后，未再發表作品，最后酒精中毒而死。

[[15]](#_15_10)E.H.諾曼（1909-1957），僅在日本有出版全集。大洼愿二編譯，《赫伯特·諾曼全集》全4卷（1977─1978）。第4卷末附有大洼愿二的《附錄：赫伯特·諾曼的生平》。對諾曼因為承受政治重壓，進行分析的有：馬場伸也，《在兩種身份之間——占領與諾曼》，收入《身份的國際政治學》（1980）。英語版的《諾曼傳》似乎仍在準備中，至今可信的是查爾斯·泰勒，《六個旅程——加拿大的形態》（1977）。后來又出版R.W.鮑恩·埃迪蒂（R.W.Bowen Edity）的《E.H.諾曼：他的一生與學術成就》（1984），此書的日譯本《H.諾曼：某個民主主義者的命運》由中野利子翻譯，于1990年出版。

[[16]](#_16_8)加布里埃爾·亞伯拉罕·阿爾蒙德（1911-2002），《共產主義的魅惑》（1954）。“比較轉向論”在學術上能發展到什么程度，我不得而知，但我們仍可以繼續努力，把日本十五戰爭期間發生的事件，參讀以下：比如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記：日中戰爭時期的周作人》（1978）、益井康一《漢奸裁判史：1946─1948年》（1977）、戴維·喬爾·斯坦伯格《二戰時期菲律賓的通敵行為》（1967）等著作。雖然我不認為從這些著作可以得出根本意義的判斷，但仍希望借此辟出共同論述的場域。

[[17]](#_17_6)北一輝（1883-1937）違反統治階層的意圖，故意用字義“一君萬民思想”來解釋明治以后的天皇制，借此突破中央強權，開啟邁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權藤成卿（1866-1937）提示日本自古以來統治階層即有體恤百姓的思想，試圖借此打開現存制度的改革之路。《北一輝著作集》全3卷（1959、1972）。五十嵐曉郎編著，《“北一輝”論集》（1979）。有關北一輝的事跡，我先受教于久野收先生。久野收、鶴見俊輔《現代日本的思想》（1956）。傳記方面有：田中惣五郎撰寫的《日本法西斯的源流——北一輝的思想與生平》（1949）和《增補版·北一輝——日本的法西斯象征》（1971）、渡邊京二《北一輝》（1978）、松本健一《年輕的北一輝》（1975）。《權藤成卿著作集》自1972年起已出版至第7卷（編按：1991年又出了一冊《別卷》）。另有瀧澤誠撰寫的《權藤成卿》（1971）、《近代日本右派社會思想研究》（1980）等傳記。

[[18]](#_18_4)石川三四郎（1876-1956）。《石川三四郎著作集》全8卷（1978-1978），未收錄其中的文章可參閱《石川三四郎選集》全10卷（1976-1978）。傳記可見：北澤文武的《石川三四郎的生平與思想》全3卷（1974-1976）。（補注：大原綠峰，《石川三四郎：靈魂的導師》，1987。）

[[19]](#_19_2)柏木義圓（1860-1938）的著作方面，見《柏木義圓集》1-2卷（1970）。傳記見伊谷隆一《反戰的思想》（1967）。柏木持續出版的雜志叫《上毛教界月報》。

[[20]](#_20_2)正木旲（1896-1975）于十五年戰爭期間持續出刊的個人雜志《接近》全5卷（1979）已重印出版。正木旲的傳記，見家永三郎《與權力之惡奮戰——正木旲的思想活動》（1971）。

[[21]](#_21_2)桐生悠悠（1873-1941）的著作包括：個人雜志《他山之石》（1934─1941）、《畜生道的地球》（1952）、《桐生悠悠反軍論集》（1969）、《桐生悠悠自傳》（1973）。傳記：太田雅夫《桐生悠悠》（1970）、井出孫六《抵抗的新聞人桐生悠悠》（1980）。清澤洌（1890-1945）不像柏木義圓、桐生悠悠和正木旲那樣在戰爭時期不斷地通過個人通訊批判軍方，他雖然受到軍方壓迫失去發表的園地，但仍持續通過日記批判戰爭，在戰爭期間去世，并留有《暗黑日記》全3卷（1970─1973）。補注：北岡伸一，《清沢洌——外交評論的命運》（1987）。

[[22]](#_22_2)辻潤（1884-1944）的作品見《辻潤著作集》（1970）。傳記見三島寬《辻潤：藝術與病理》（1970）、玉川信明《評傳·辻潤》（1971）。折原修三在《“年老”的構造》（1981）一書中，述及辻潤及其兒辻誠之間的思想傳承。后來，福島鑄郎、大久保久雄合編的《大東亞戰爭書志》全3卷（1981）、《戰爭時期的言論》全2卷（1982）出版問世。今后的研究可運用這些戰爭時期的雜志、論文、單行本的總索引。可惜，這本講義〔在時間上〕未能得其教益。

# 后記

1979年9月至1980年4月，我得到日本國際交流基金的贊助，前往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爾市的麥吉爾大學講課。我把前半的英文講義譯成日語，用口述的方式錄成卡帶，再請稻垣壽美子整理出來，便成了這本書。

原講義的內容并未更動，現在覺得該補充的，都以注釋的形式加上。

講課自然會受到聽課者的影響。聽課者雖然只有十人左右，但面對這些反應熱烈的聽眾，是我過去在大學授課時未有的經驗。因此，我努力讓授課內容符合他們的要求。

在此，我要感謝這一年來教室的人：借給我場地的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林達光、薩姆·諾莫夫、沃爾德·格迪斯，英文系約翰·隆茲利諸位教授，讓我享受蒙特利爾快樂生活的麥吉爾大學歷史系太田雄三教授，以及蒙特利爾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圖書管理員加藤典洋先生。

我是在美國度過十五歲至十九歲這段時光的。那時遇上美日爆發戰爭，我經由俘虜營，搭乘交換船回到日本時，已經滿二十歲。戰爭時期的日本對我沖擊非常之大。戰后在日本生活，我曾一度放棄英語，但后來興起借由英文追述當時的沖擊，再試著把它譯成日文的念頭。我由此獲致了日文和英文在我心中對立和互助的經驗。

從十六歲到十八歲，我寄居在美國的楊格先生的家里。無論是在戰爭期間或在戰后，我一直惦記著那段時光。這次我來加拿大短期講學期間，楊格夫人和次子查爾斯·楊格（我的老同學）造訪蒙特利爾，這是我們暌違四十年后的重逢。這四十年來，我希望能由這本書表現出來。

在我寄居時期，楊格先生一家共有五人，現在只剩下楊格夫人和查爾斯二人。在此，我要將這本書獻給：包括逝者（漢特夫人、克尼斯、南希）在內的楊格先生全家。

感謝稻垣壽美子和高村幸治先生在制作本書時的辛勞。

本書由“滿屋書香”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讀什么書或者想獲得更多免費電子書請加小編微信：sisijuan2012或QQ：151680600 小編也可以結交一些喜歡讀書的朋友。或者關注小編個人微信公眾號名稱：滿屋書香。 公眾號中可以獲得書香君所有分享的免費電子書！

1982年4月15日

鶴見俊輔

# 參考書目

（參考書目皆以原文表示）

一 向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趨近

Neumann, Sigmund.The Future in Perspective.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946；日譯本：ジークムント·ノイマン，『現代史：未來への道標』，曽村保信訳，東京：巖波書店，1956年。

オーテス·ケーリ（Otis Cary）、エドウィン·O·ライシャワー（Edwin O.Reischauer）、豬木正道、坂田吉雄、鶴見俊輔，『日本の民主主義——過去·現在·未來』，『日米フォーラム』1963年6月。

本多秋五，『転向文學論』，東京：未來社，1957。

辻信一，『転向論の新しい地平』上、下，『思想の科學』1981年5、6月號。

吉本隆明，『転向論』，『蕓術的抵抗と挫折』，東京：未來社，1959年。

思想の科學研究會編，『共同研究·転向』上、中、下，東京：平凡社，1959-1962。改訂増補版，平凡社，1978。

家永三郎，『太平洋戦爭』，東京：巖波書店，1968年。

遠山茂樹、今井清一、藤原彰，『昭和史』，東京：巖波書店，1955。

鶴見俊輔，『知識人の戦爭責任』，『中央公論』1956年1月號。

——，『日本知識人のアメリカ像』，『中央公論』1956年7月號。

二 關于轉向

Dore, Ronald Philip.Education in Tokugawa Japan.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65；日譯本：R.P.ドーア，『江戸時代時代の教育』，東京：巖波書店，1970年。

——.The Diploma Disease.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6;日譯本：R.P.ドーア，『學歴社會―新しい文明病』松居弘道譯，東京：巖波書店，1978年。

Smith, Henry Dewitt（ヘンリ·ディウィット·スミス），『資料のJungle——新人會を追跡する』，『労働資料』1968年1月號。

——.Japan's First Student Radical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日譯本：ヘンリ·ディウィット·スミス，『新人會の研究―日本學生運動の源流』，松尾尊兌、森史子訳，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8年。

本多秋五，『書評思想の科學研究會編 共同研究〈転向〉上』，『思想』1959年7月號。

山川均，『無産階級運動の方向転換』，『前衛』1922年7、8月合并號。

內務省警保局編，『昭和九年度に於ける社會運動の狀況』，1935年。

司法省保護局，『思想犯保護対象者に関する諸調査』，『司法保護資料』33，1943年3月。

石堂清倫、竪山利忠編『東京帝大新人會の記録』，東京：經濟往來社，1976年。

交詢社編，『日本紳士録』，東京：交詢社，1955年。

池田克，『左翼犯罪の覚書』，中央公論社編，池田克、毛利基，『防犯科學全集』第6巻『思想犯篇』，1936年。

辻信一，『転向論の新しい地平』上、下，『思想の科學』1981年5、6月號。

松本健一，『転向論の基軸とは何か——鶴見理論之吉本理論にふれて』，『現代の眼』1981年3月號。

菅孝行、松本健一、岡庭昇、中島誠、飯田桃、笠井潔、高橋敏夫等，『現代転向論は可能か』，『現代の眼』1981年3月號。

朝日新聞社編，『現代人物事典』，東京：朝日新聞社，1977年。

葦津珍彥，『尊王攘夷とは？』，鶴見俊輔編，『語りつぐ戦後史2』，東京：思想の科學社，1969年。

——，『講和発効後の難問題、憲法全面改定論の予想』，『時の流れ戦後三十有余年時評集』，東京：神社新報社，1981年。

藤田省三，『昭和八年を中心とする転向の狀況』，『共同研究·転向』上巻，東京：平凡社，1959年。

——，『昭和十五年を中心とする転向の狀況』，『共同研究·転向』中巻，東京：平凡社，1960年。

鶴見俊輔，『後期新人會員』，思想の科學研究會編，『共同研究·転向』上巻，東京：平凡社，1959年。

三 鎖國

小泉信三，『海軍主計大尉小泉信吉』，私家版：1946年；東京：文藝春秋，1966年。

中野重治，『村の家』，1935年。

——，『五勺の酒』，1947年。

——，『むらぎも』，東京：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1954年。

加藤周一，『日本文學史序説』，『加藤周一著作集』第5巻，東京：平凡社，1980年。

加藤周一、M·ライシュ（Michael R.Reich）、ロバート·J·リフトン（Robert J.Lifton），『日本人の死生觀』，東京：巖波新書，1977年。

伊藤整，『新心理主義文學』，東京：厚生閣書店，1932年。

——，『典子の生きかた』，東京：河出書房，1941年。

——，『我が知識階級——この感動萎えざらんが為に』，『都新聞』，1941年12月14日。

——，『戦爭の文學』，『都新聞』，1942年。

——，『裁判』，東京：筑摩書房，1952年。

——，『氾濫』，東京：新潮社，1958年。

伊藤整、瀬沼茂樹，『日本文壇史』，東京：大日本雄弁會講談社／講談社，1953-1973年。

池田彌三郎，『日本蕓能伝承論』，東京：中央公論社，1962年。

守田志郎，『日本の村』，東京：朝日新聞社，1978年。舊版：『小さい部落』，朝日新聞社，1973年。

折口信夫，『日本文學啓蒙』，東京：朝日新聞社，1950年；『折口信夫全集』第12巻，東京：中公文庫，1976年。

佐藤忠男，『裸の日本人』，東京：光文社，カッパブックス，1958年。

——，『忠臣藏——意地の系譜』，東京：朝日選書，1976年。

長部謹吾，『思想犯の保護に就て』，『司法研究』21:10，司法省調査課，1937年3月。

四 關于國體

丸山真男，『軍國支配者の精神形態』，『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東京：未來社，1957年。

井上清，『天皇の戦爭責任』，東京：現代評論社，1975年。

木戸日記研究會校訂，『木戸幸一日記』，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年。

木戸幸一研究會編，『木戸幸一関係文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年。

太安萬侶編纂，『古事記』。

竹山道雄，『昭和の精神史』，東京：新潮社，1956年。

杉浦幸雄，『米英頭方追放』，『漫畫』1942年5月號。

尾崎士郎，『天皇機關説』，東京：文藝春秋新社，1951年。

原田熊雄，『西園寺公と政局』（原田文書）全8巻，東京：巖波書店，1950-1956年；1982年再版。

高橋甫、林三郎，『舊軍人の場合』，『芽』1953年8月號。

勝田龍夫，『重臣たちの昭和史』上下，東京：文藝春秋，1981年。

蓑田胸喜，『學術維新原理日本』，東京：原理日本社，1933年。

橋川文三，『國體論の連想』，『展望』1975年9月號。

五 大亞細亞

Ba Maw.Breakthrough in Burm: Memoirs of a Revolution, 1939–1946.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Steinberg, David Joel.Philippine Collaboration in World War II.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67.

大岡昇平，『俘虜記』，東京：のち新潮文庫，1949年。

——，『野火』，東京：創元社，1952年。

——，『ミンドロ島ふたたび』，東京：中央公論社，1969年。

——，『レイテ戦記』，東京：中央公論社，1971年。

——，『幼年』，東京：のち文春文庫，1973年。

——，『わが文學生活』，東京：中央公論社，1975年。

——，『少年』，東京：筑摩書房，1975年。

石垣綾子，『回想のスメドレー』，東京：みすず書房，1967年。

竹內好，『大東亜戦爭と吾等の決意（宣言）』，『中國文學』80，1942年1月。

竹內好編，『アジア主義』，『現代日本思想大系』第9巻，東京：筑摩書房，1963年。

尾崎秀実，『“東亜協同體”の理念とその成立の客観的基礎』，『中央公論』54-1，1939年1月1日。

——，『愛情はふる星のごとく』，東京：世界評論社，1946年。

——，『尾崎秀実著作集』全4巻，東京：勁草書房，1977年。

松本健一，『“アジア”から“西歐”へ』，『思想の科學』1979年9月號。

——，『戦後世代の風景——1964年以後』，東京：第三文明社，1980年。

——，『竹內好“日本のアジア主義”精読』，東京：巖波現代文庫，2000年。

昭和同人會編著，後藤隆之助監修，『昭和研究會』，東京：経済往來社，1968年。

風間道太郎，『尾崎秀実伝』，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初版1968年，版1976年。

酒井三郎，『昭和研究會―ある知識人集団の軌跡』，東京：T B Sブリタニカ，1979年。

菅孝行，『天皇制の最高形態とは何か』，『天皇論ノート』，東京：田畑書店，1975年。

鶴見俊輔編著，『日本の百年』第10巻，東京：筑摩書房，1978年改訂版。

六 非轉向的形式

Ellis, Havelock.Psychology of Sex.London, 1933.

Watchtower Bible and Tract Society of Pennsylvania.Jehovah's Witnesses in the Divine Purpose.New York: Watchtower Bible and Tract Society of New York, Inc., 1959.

ぬやまひろし（西沢隆二），『編笠詩集』，東京：日本民主主義文化連盟，1946年。

大本七十年史編纂會編，『大本七十年史』全2巻，京都：宗教法人大本，1964年。

中村元，『東洋人の思惟方法』上下，東京：みすず書房，1948-1949年。

太田雄三，『內村鑑三』，東京：研究社，1977年。

司馬遼太郎，『ひとびとの跫音』上下，東京：中央公論社，1981年。

田北耕也，『昭和時代の潛伏キリシタン』，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1954年；東京：國書刋行會，1978年再刊。

吉本隆明，『転向論』，『蕓術的抵抗と挫折』，東京：未來社，1959年。

同志社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戦時下抵抗の研究』全2巻，東京：みすず書房，1968-1969年。

池田昭編，『ひとのみち敎団不敬事件関係資料集成』，東京：三一書房，1977年。

米田豊、高山慶喜，『昭和の宗教弾圧―戦時ホーリネス受難記』，東京：いのちのことば社，1964年。

坂本幸四郎，『小山宗祐牧師補の自殺』，『思想の科學』1969年12月號、1970年1月號。

村上重良，『ほんみち不敬事件―天皇制と対決した民衆宗教』，東京：講談社，1974年。

妹尾鉄太郎、稲垣真美編，中濃教篤解說，『妹尾義郎日記』全7巻，東京：國書刋行會，1974-1975年。

明石順三，『浄土真宗門』，未発表。

林霊法，『戦える新興仏教青年同盟』，『現代思想と仏教の立場』，京都：百華苑，1962年。

牧口常三郎，『牧口常三郎全集』全8巻，東京：第三文明社，1981-1982年。

阿伊染德美，『わがかくし念佛』，東京：思想の科學社，1977年。

阿部知二，『良心的兵役拒否の思想』，東京：巖波新書，1969年。

柳宗悅，『柳宗悅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80-1982年。

柳宗悅編，『工藝』，1931-1943年、1946-1951年。

柳宗悅、壽岳文章編，『ブレイクとホヰットマン』，1931-1933年。

高阪薫，『明石順三と須磨浦聖書講堂——燈臺社創設前後の謎を探る』，『思想の科學』1973年2月號。

笠原芳光，『兵役を拒否したキリスト者——明石真人の場合』，『思想の科學』1970年10月號；思想の科學研究會編，『埋もれた精神』，東京：思想の科學社，1981年。

嶋根清（署名：しまねきよし），『新興仏教青年同盟——妹尾義郎』，思想の科學研究會編，『共同研究·転向』上巻，東京：平凡社，1959年。

稻垣真美，『仏陀を背負いて街頭へ―妹尾義郎と新興仏教青年同盟』，東京：巖波新書，1974年。

七 日本之中的朝鮮

Wagner, Edward Willet.The Korean Minority in Japan, 1904——1950.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51；日譯本：エドワード·W·ワグナー著，外務省アジア局北東アジア課譯，『日本における朝鮮少數民族：1904年——1950年』，東京：湖北社，1975年。

千家元麿，『昔の家長篇敘事詩』，東京：木星社書院，1929年。

木佐木勝，『木佐木日記』，東京：図書新聞社，1965年。

田山花袋，『蒲團』，『新小説』1907年9月號。

田中英光，『オリンポスの果実』，『文學界』1940年9月號；東京：高山書院，1940年。

——，『酔いどれ船』，東京：小山書店，1949年。

石川啄木，『時代閉塞の現狀』，1910年。

樸春日，『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朝鮮像』，東京：未來社，1969年。

樸慶植，『在日朝鮮人運動史』，東京：三一書房，1979年。

——，『朝鮮人強制連行の記録』，東京：未來社，1965年。

尾崎秀樹，『大東亜文學者大會』，『舊植民地文學の研究』，東京：勁草書房，1971年。

李進熙，『李朝の美と柳宗悅』，『三千里』13，1975年2月。

金達壽，『朝鮮文化について』，『巖波講座——哲學』第13巻『文化』，東京：巖波書店，1968年8月。

金時鐘，『豬飼野詩集』，東京：東京新聞出版局，1978年。

——，『新潟長篇詩』，東京：構造社，1970年。

金達壽，『樸達の裁判』，東京：筑摩書房，1959年。

姜德相，『關東大震災』，東京：中公新書，1975年。

高史明，『生きることの意味』，東京：筑摩書房，1974年。

高崎宗司，『柳宗悅と朝鮮』，『朝鮮史叢』1，1979年6月。

高崎隆治，『文學にみる日本人の朝鮮人像——『朝鮮歌集』の貧困』，『三千里』25，1981年2月。

崔夏林，『柳宗悅の韓國美術観』，柳宗悅著，李大源訳，『韓國とその蕓術』（韓國과그藝術），首爾：知識産業社，1974年。

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私家版，1893年。（初版署名：森本藤吉）

八 以“非斯大林化”為目標

大河內一男，『勞働保護立法の理論に就て』，『経済學論集』（新巻）3:11，1933年11月。

——，『概念構成を通じて見たる社會政策の變遷（一）』，『経済學論集』（新巻）1:9，1931年12月。

山川均，『山川均自伝ある凡人の記録』，東京：巖波書店，1961年；舊版：『ある凡人の記録』，東京：朝日新聞社，1951年。

——，『転向常習者の手記——うづら飼ひになるまで』，『経済往來』1935年8月號。

山川菊栄、山川振作編，『山川均全集』全20巻，東京：勁草書房，1966年。

中島誠，『転向論序説―戦中と戦後をつなぐもの』，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1980年。

內村剛介，『生き急ぐ』，東京：三省堂新書，1967年。

平野謙，『“リンチ共産黨事件”の思い出』，東京：三一書房，1976年。

石原吉郎，『日常への強制―石原吉郎全詩全評論』，東京：構造社，1970年。

——，『望郷と海』，東京：筑摩書房，1972年。

立花隆，『日本共産黨の研究』，東京：講談社，1978年。

伊藤登志夫，『白きアンガラ河——イ兒クーツク第一捕虜収容所の記錄』，東京：思想の科學社，1979年。

吉本隆明，『〈乞食論語〉執筆をお勧めする‐バカの一つおばえ“前衛黨なくして”』，『日本読書新聞』，1959年2月2日。

——，『不許蕓人山門‐花田清輝老への買いコトバ』，『日本読書新聞』，1959年1月12日。

——，『六·一五事件と私―花田清輝氏に一言』，『週刊読書人』1960年11月號。

——，『転向ファシストの詭弁』，『近代文學』1959年10月號。

花田清輝，『ヤンガー·ジェネレーションへ』，『文學』25:7，1957年7月。

——，『ノーチラス號反応あり』，『季刊現代蕓術』3，1959年6月。

——，『風の方向』，『現代蕓術』1960年10月號（創刊號）。

——，『罪と罰』，『錯亂の論理』，東京：真善美社，1947年。

長谷川四郎，『シベリヤ物語』，東京：筑摩書房，1952年；『長谷川四郎全集』，東京：晶文社，1977年。

——，『鶴』，東京：みすず書房1953年。

宮內勇，『1930年代日本共産黨私史』，東京：三一書房，1976年。

高杉一郎，『極光のかげに』，東京：目黒書店，1950年；東京：冨山房百科文庫，1977年；東京：巖波文庫，1991年。

高畠通敏，『生産力理論——大河內一男·風早八十二』，思想の科學研究會編，『共同研究．轉向』中巻，東京：平凡社，1960年。

高畠通敏編，『山川均集』，『近代日本思想大系』第19巻，東京：筑摩書房，1976年。

埴谷雄高，『洞窟』，『構想』1-2號，1939年。

——，『Credo Quia Absurdum——不合理ゆえに吾信ず』，『構想』1-7，1939-1940年。

——，『死靈』，『近代文學』創刊號，1946年1月號；『死靈定本』（1-5章），東京：講談社，1976年；『死靈六章』，講談社，1981年；『死靈七章』，講談社，1984年；『死靈八章』，講談社，1986年；『死靈九章』，講談社，1995年。

埴谷雄高、荒正人編著，『“近代文學”創刊のころ』，東京：深夜叢書社，1977年。

埴谷雄高、荒正人、平野謙、佐々木基一、本多秋五、山室靜、小田切秀雄編，『近代文學』，1946年1月號——1964年8月號。

菅季治，『語られざる真実：菅季治遺稿』，東京：筑摩書房，1950年。

——，『人生の論理一文蕓的心理學への試み』，東京：草美社，1950年。

——，『哲學の論理』，東京：弘文堂，1950年。

菅原克己，『遠い城—ある時代之人の思い出のために』，東京：創樹社，1977年。

九 玉碎的思想

Ike, Nobutaka.Japan's Decision for War: Records of the 1941 Policy Conferences.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Neumann, Sigmund.The Future in Perspective.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946；日譯本：ジークムント·ノイマン著，曽村保信訳，『現代史：未來への道標』，東京：巖波書店，1956年。

Lenin, Vladimir.The State and Revolution.1917.

小田実，『難死の思想』，『展望』1965年1月號。

五味川純平，『御前會議』，東京：文藝春秋，1978年。

日本戦沒學生記念會編，『きけわだつみのこえ』，東京：東京大學協同組合出版部，1949年；新版：東京：光文社，1959年；東京：巖波文庫，1982年，新版1995年。

吉田満，『戦艦大和ノ最期』，東京：北洋社，1974年；『鎮魂戦艦大和』，東京：講談社文庫，1978年；『戦艦大和ノ最期』，東京：講談社，1981年。

——，『提督伊藤整一の生涯』，東京：文藝春秋，1977年。

——，『戦中派の死生觀』，東京：文藝春秋，1980年。

池重高編，『日本の戦爭への決斷』），東京：

參謀本部編，『杉山メモ』，東京：原書房，1969年。

林尹夫，『わがいのち月明に燃ゆ』，東京：筑摩書房，1967年。

家永三郎，『太平洋戦爭』，東京：巖波書店，1968年。

黃春明，『莎喲娜拉·再見』，『文季』1，1973年8月。日譯本：田中宏、福田桂二訳，『さよなら·再見アジアの現代文學——臺灣』，東京：めこん，1979年。

森島守人，『陰謀·暗殺·軍刀一外交官の回想』，東京：巖波書店，1950年。

渡辺清，『海の城―海軍少年兵の手記』，東京：朝日新聞社，1969年。

——，『戦艦武藏の最期』，東京：朝日新聞社，1971年。

——，『砕かれた神―ある復員兵の手記―』，東京：評論社，1977年。

——，『私の天皇観』，友部町（茨城県）：辺境社，1981年。

鶴見俊輔，『日本知識人のアメリカ像』，『中央公論』1956年7月號。

鶴見俊輔，『知識人の戦爭責任』，『中央公論』1956年1月號。

十 戦爭時期的日常生活

Longmate, Norman.How We Lived Then: A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 Arrow Books, 1971.

茨木のり子，『わたしが一番きれいだった之き』，『茨木のり子詩集』，東京：思潮社，1969年。

牧瀨菊枝編，『九津見房子の暦：明治社會主義からゾルゲ事件へ』，東京：思想の科學社，1975年。

守田志郎，『日本の村』，東京：朝日新聞社，1978年。

美作太郎、藤田親昌、渡辺潔，『言論の敗北：橫浜事件の真実』，東京：三一新書，1959年；新版：『橫浜事件』，東京：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1977年。

細川嘉六，『世界史の動向と日本』，『改造』1942年8、9月號。

——，『植民史』，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41年。

永井荷風，『斷腸亭日乗』全7巻，東京：巖波書店，1980-1981年。

中村智子，『橫浜事件の人びと』，東京：田畑書店，1979年；增補版，1980年。

十一 原子彈的犧牲者

Churchill, Winston.The Second World War.Vol.6.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3.

Feis, Herbert.The Atomic Bomb and the End of World War II.Revised edition.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Guillain, Robert.Le Japon en guerre: de Pearl Harbour à Hiroshima.Paris: Editions de Stock, 1979；日譯本：ロベール·ギラン著，根本長兵衛、天野恒雄訳，『日本人と戦爭』，東京：朝日新聞社，1979年。

Liddell-Hart, B.H.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Cassell,1970.

Swift, Jonathan.Gulliver's Travels；日譯本：ジョナサン·スウィフト著，原民喜訳，『ガリバー旅行記』，東京：主婦之友社，1951年。

いいだもも（飯田桃），『アメリカの英雄』，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65年。

大田洋子，『屍の街』，東京：中央公論社，1948年。完本：冬華書房，1950年。

——，『人間襤褸』，東京：河出書房，1951年。

——，『半人間』，東京：大日本雄弁會講談社，1954年。

大江健三郎，『ヒロシマ·ノート』，東京：巖波書店，1965年。

井伏鱒二，『黒い雨』東京：新潮社，1966年。

加藤周一、M·ライシュ（Michael R.Reich）、ロバート·J·リフトン（Robert J.Lifton），『日本人の死生觀』，東京：巖波新書，1977年。

松浦総三著，『占領下の言論弾圧』，東京：現代ジャーナリズム出版會，1969年。

長岡弘芳，『原爆文學史』，東京：風媒社，1973年。

——，『原爆民衆史』，東京：未來社，1977年。

峠三吉，『原爆詩集』，私家版，1951年；東京：青木書店，1952年。

原民喜，『夏の花』，東京：能楽書林，1947年。

——，『心願の國』，遺稿，1951年。

——，『原民喜作品集』全2巻，東京：角川書店，1953年。

——，『原民喜全集』全3巻，東京：芳賀書店，1965-1969年。

堀田善衛，『審判』，東京：巖波書店，1963年。

朝日新聞社編，『アサヒグラフ特集』1952年8月6日號『特別増刷原爆被害の初公開』。

十二 戦爭的終結

Thompson, Patricia.“A Story of England at War.” The Gazette.Montreal, Canada: November 10th, 1979.

上田広，『原始林の野獣と共に：劉連仁日本潛伏記』，東京：穂高書房，1959年。

大江健三郎，『沖繩ノート』，東京：巖波書店，1970年。

大野力，『戦爭責任についてのシムポジウム』，思想の科學研究會1959年夏季大會。

山中恒，『ボクラ少國民』全5部：『ボクラ少國民』『御民ワレ』『擊チテシ止マム』『欲シガリマセン勝ツマデハ』『勝利ノ日マデ』，東京：辺境社，1974─1979年。

——，『戦中教育の裏窓：子どもが<少國民>といわれたころ』，東京：朝日新聞社，1979年。

中根美寶子，『疎開學童の日記：九歳の少女がとらえた終戦前後』，東京：中公新書，1965年。

文部省制定，『臣民の道』，1941年7月。

日高六郎編，『1960年5月19日』，東京：巖波書店，1960年。

月光原小學編，『學童疎開の記録』，東京：未來社，1960年。

北川修，『戦爭を知らない子供たち』，東京：ブロンズ社，1971年；東京：のち角川文庫，1971年。

市民連合編，『ベトナムに平和を』，收錄在『資料·“ベ平連”運動』上巻，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4年。

本多秋五，『転向論文學論』，東京：未來社，1957。

——，『物語戦後文學史』，東京：新潮社，1966年。

——，『“無條件降伏”の意味』，『文蕓』17:9，1978年9月。

——，『江藤淳氏に答える』，『毎日新聞』1978年9月7日、8日夕刊。

江藤淳，『もう一つの戦后史』，東京：講談社，1978年。

——，『忘れたことと忘れさせられたこと』，東京：文藝春秋，1979年。

住谷一彥，『アカマタ·クロマタ—八重山印象記〈南島の秘密結社〉』，『みすず』56，1964年1月。

住谷一彥，『南西諸島のGeheimkult―新城島のアカマタ·クロマタ覚え書―』，『南西諸島の神観念』，東京：未來社，1977年。

沖縄県學務部，『敢て県民に訴ふ民蕓運動に迷ふな』，『沖縄朝日新聞』『沖縄日報』『琉球新報』，1940年1月11日；『柳宗悅全集』第15巻，東京：筑摩書房，1981年。

松井芳郎，『喪失の戦后史と戦后史の喪失』，『科學と思想』38，1980年10月。

歐陽文彬著，三好一訳，『穴にかくれて十四年：中國人俘虜劉連仁の記録』，東京：新読書社出版部，1959年。

柳田國男，『海上の道』，東京：筑摩書房，1961年。

柳宗悅，『國語問題に関し沖縄県學務部に答ふるの書』，『沖縄朝日新聞』『沖縄日報』『琉球新報』，1940年1月14日；『柳宗悅全集』第15巻，東京：筑摩書房，1981年。

柴田道子，『谷間の底から』，東京：東都書房，1959年；東京：“巖波少年文庫”，1976年。

——，『被差別部落の伝承と生活：信州の部落·古老聞き書き』，東京：三一書房，1972年。

——，『ひとすじの光』，東京：朝日新聞社，1976年。

高野雄一，『無條件降伏論爭の問題點』，『朝日新聞』1978年10月2日、3日夕刊。

野添憲治，『花岡事件の人たち』，東京：評論社，1975年。

——，『中國人強制連行·花岡事件関係文獻目錄』，東京：能代文化出版社，2000年。

陸軍省制定，『戦陣訓』，1941年1月8日。

新川明，『新南島風土記』，東京：大和書房，1978年。

樺美智子著，由樺光子編，『人知れず微笑まん』東京：三一書房，1960年。

鶴見俊輔、小田実、開高健編，『反戦の論理』，東京：河出書房，1967年。

十三 回顧

Almond, Gabriel Abraham.The Appeals of Communism.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Edity, R.W.Bowen.E.H.Norman: His Life and Scholarship.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4；日譯本：由中野利子譯，『H.ノーマン：あるデモクラットのたどった運命』，東京：リブロポート，1990年。

Hellman, Lillian.Scoundrel Time.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1976；日譯本：リリアン·ヘルマン小池美佐子譯，『眠れない時代』，東京：サンリオ，1979年。

Norman, E.H.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Meiji Period.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0；日譯本：大窪愿二訳，『日本における近代國家の成立』東京：時事通信社，1947年。

——.大洼愿二編訳，『ハーバート·ノーマン全集』全4巻，東京：巖波書店，1977─1978年；増補版1989年。

Steinberg, David Joel.Philippine Collaboration in World War II.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67.

Taylor, Charles.Six Journeys: A Canadian Pattern.Toronto: House of Anusi Press, 1977.

三島寬，『辻潤：蕓術と病理』，東京：金剛出版社，1970年。

久野收、鶴見俊輔，『現代日本の思想』，東京：巖波書店，1956年。

大原綠峯，『石川三四郎魂の導師』，東京：リブロポート，1987年。

五十嵐暁郎編著，『“北一輝”論集』，東京：三一書房，1979年。

井出孫六，『抵抗の新聞人桐生悠々』，東京：巖波書店，1980年。

太田雅夫，『桐生悠々』，東京：紀伊國屋新書，1970年。

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記：日中戦爭時代の周作人』，東京：筑摩書房，1978年。

北一輝，『北一輝著作集』全3巻，東京：みすず書房，1959、1972年。

北沢文武，『石川三四郎の生涯と思想』全3巻，東京：鳩の森書房，1974-1976年。

北岡伸一，『清沢洌――外交評論の運命』，東京：中公新書，1987年；増補版2004年。

正木ひろし（本名：正木旲），『近きより』全5巻，東京：旺文社文庫，1979年（重印出版）。

玉川信明，『評伝·辻潤』，東京：三一書房，1971年。

田中惣五郎，『日本ファッシズムの源流北一輝の思想と生涯』，東京：白揚社，1949年。——，『增補版北一輝―日本的ファシスト象徴』，東京：三一書房，1971年。

石川三四郎，『石川三四郎選集』全10巻，東京：黒色戦線社，1976-1978年。

——，『石川三四郎著作集』全8巻，東京：青土社，1978-1978年。

伊谷隆一，『非戦の思想』，東京：紀伊國屋新書，1967年。

辻潤，『辻潤著作集』，東京：オリオン出版社，1970年。

折原脩三，『“老いる”の構造』，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1981年。

松本健一，『若き北一輝』，東京：現代評論社，1975年。

柏木義円，『柏木義円集』1-2巻，東京：未來社，1970年。

家永三郎，『権力悪とのたたかい——正木ひろしの思想活動』（三省堂，1971年。

桐生悠々，『他山の石』，1934-1941年。

——，『畜生道の地球』，東京：三啓社，1952年。

——，『桐生悠々反軍論集』，東京：新泉社，1969年。

——，『桐生悠々自伝』，東京：現代ジャーナリズム出版會，1973年。

益井康一，『漢奸裁判史：1946-1948』，東京：みすず書房，1977年。

馬場伸也，『ニつ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狹間で—占領とノーマン〉』，『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國際政治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年。

清沢洌，『暗黒日記』全3巻，東京：評論社，1970-1973年。

渡辺京二，『北一輝』，東京：朝日新聞社，1978年。

——，『近代日本右派社會思想研究』，東京：論創社，1980年。

滝沢誠，『権藤成卿』，東京：紀伊國屋新書，1971年。

福島鋳郎、大久保久雄編，『大東亜戦爭書誌』全3巻，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1981年。

——編，『戦時下の言論』全2巻，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1982年。

権藤成卿，『権藤成卿著作集』1-7巻、別巻，伊勢崎：黒色戦線社，1972年—1991年。

如果你不知道讀什么書，

就關注這個微信號。

微信公眾號名稱：滿屋書香

關注即免費贈送“滿屋書香”整理收集的

羅輯思維 精品推薦 100本 書單

加小編微信一起讀書

小編微信號：sisijuan2012

【滿屋書香】已提供200個不同類型的書單

1、 歷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

2、 每年豆瓣，當當，亞馬遜年度圖書銷售排行榜

3、 25歲前一定要讀的25本書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國純文學名著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國現當代名著

6、 美國亞馬遜編輯推薦的一生必讀書單100本

7、 30個領域30本不容錯過的入門書

8、 這20本書，是各領域的巔峰之作

9、 這7本書，教你如何高效讀書

10、 80萬書蟲力薦的“給五星都不夠”的30本書

……

關注“滿屋書香”微信公眾號，即可查看對應書單和得到所有分享的電子書！

